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薛国安 吴胜兴 常本春 朱毅民

吴建坤 米其智 蒯建华 陈京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瞿超

副主任 魏晓蕾 朱杰 唐旭明 彭慧 陈童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任世红 陈思 吴元庆 张吉林

张刚强 张美云 张思东 傅佩丽

主编 魏晓蕾

副主编 任世红

目 录

2020 年 第 1 期 总第 123 期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 辑 出 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王 芳
责 任 编 辑:鲍跃华 王 芳 龚万达 郭晓东
王天海 蒋建忠 徐晓婷 宋 好

本刊特稿

论团结 / 陈喜庆 04

统战理论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逻辑脉络
和实践展开研究 / 张兴奎 张佩栋 张纵横 12
试论习近平关于新时代统战工作的互联网思维 / 吉 强 19

政党制度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传统文化基因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 江苏省委统战部 南京财经大学联合课题组 24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执政党的建设 / 高 静 宋凌晨 30
浅议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方法 / 强亦忠 许 红 36

新社会阶层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研究
——基于江苏的实证分析 / 江苏省委统战部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联合课题组 41
网络人士思想政治引领与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 / 江苏省委统战部 南京师范大学联合课题组 48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网 址: <http://JSYB.chinajournal.ner.cn>

电子邮箱: jssyxb@163.com

电 话:025-84287236

传 真:025-84287236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艺中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 年 2 月 28 日

定 价:8.00 元

民族与宗教

外来宗教中国化比较研究初探

——以佛教中国化和伊斯兰教中国化为例 / 王彦明

54

推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创新探索

——以青岛为例 / 姜丽华

59

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以南京市为例 / 华 静

64

当前营商环境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以徐州市鼓楼区为例 / 毕凤霞 杨 潇 秦继民

71

学习与思考

融媒体时代大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机制研究 / 刘小杰

77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3 * 2020 - 02

论 团 结

陈喜庆

摘 要:人是以群体方式生存发展的,生存发展任务繁重与生存发展力量相对不足的矛盾是人类面临的永恒矛盾,团结合作是破解这一矛盾的永恒选择,并且人类社会实践的时间和空间延伸到哪里,团结合作的历史和范围就拓展到哪里,团结合作影响着人类生存发展的方方面面,此即“团结影响一切”。本文分析了利益、领导、批评或斗争与团结合作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这当中无论哪个问题处理不好,都会对团结合作产生影响,总之,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影响着团结,此即“一切影响团结”。

关键词:团结;统一战线;影响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1-00004-08

我们都知道,“团结”作为名词是和睦、友好的意思,作为动词是联合的意思,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鲜为人知的是,“团结”一词古时是军事组织的称谓。据《资治通鉴》载,唐代大历十二年,“定诸州兵,其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差点土人,春夏归农,秋冬追集,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结’”。这是唐代初期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军事制度。所谓“官健”,就是由官府负责吃穿,犹如官府所养健儿。而“团结”则是古代居住在本地的土人,春夏时在家务农,秋冬闲时招募到军队中,发给军粮,类似于后世的民兵。由此可见,“团结”一词最早指临时招募而来的民兵,后引申为集结、联合,再引申为同一组织之内的和睦、友好。

我们又知道,所谓统一战线,就是不同的社会

力量,为实现共同目标而结成的联盟,其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其工作就是团结工作。显然,这里的“统一战线”与“团结”虽然是两个词,但意义是一致的。因此,“团结”与“统一战线”这两个词的联系是极为密切的,有时常常互相作为代名词。这也决定了,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的道理与实现和发展团结的道理是相通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讲,如果说统一战线是一门学问,实际上就是“团结学”,如果说统一战线是一种理论,实际上就是“力量论”。

谈论团结,有几个问题是必须回答的,即人类为什么要团结,为什么能够实现团结,为什么团结合作中要有领导者,为什么团结中有批评或斗争。

一、团结是人类解决力量不足问题的必然选择
很多人都读过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符的小说

收稿日期:2020-01-02

作者简介:陈喜庆,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

《鲁滨逊漂流记》，但未必知道鲁滨逊确有生活原型，他就是亚历山大·塞尔柯克。塞尔柯克 1676 年出生于苏格兰，青年时当过海员。1704 年塞尔柯克担任英国“五港同盟”号领航员时，由于担忧在同西班牙舰队海战时被击沉，于是在同船长激烈争吵后，留在了荒无人烟的叫做马斯蒂拉的小岛上。塞尔柯克在这个距离智利西海岸 675 公里的小岛上野人般地生活了 4 年之久，直到 1709 年才被路过的英国船只救起。据说获救后，塞尔柯克同他人语言交流时都发生了困难。这也难怪，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工具，荒岛上无人交流，语言功能自然退化了。这印证了马克思的一个科学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如果说塞尔柯克作为成年人，其故事还不够典型的话，印度狼孩的故事则更能说明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了。1920 年，印度加尔各答辛格夫妇所办的孤儿院，收养了两个女性狼孩，他们给七八岁大的取名卡玛拉，两岁大的取名阿玛拉。不幸的是，阿玛拉第二年夭折，卡玛拉也于 9 年后的 1929 年死亡。辛格夫妇根据抚养狼孩的经历，写出了《狼孩与野人》一书，于 1947 年出版和 1966 年再版，曾经轰动一时。书中记述了狼孩刚刚收养时的情况，不会直立而是用四肢行走，不吃素食只吃肉，不会说话只会引颈长嚎。辛格花了很大气力都无法使她们很快适应正常人的生活，卡玛拉直到两年后才学会直立，7 年后才学会了 45 个词，死亡时已是十六七岁了，其智力水平仅相当于三四岁的孩子。这个故事进一步说明，人是社会的人，是以群体方式生存和发展的。一旦脱离社会，则人将不人，至于发展进步、实现价值等等，更是无从谈起。

人类为什么必须组成社会，以群体的方式生存和发展呢？考察人类社会史不难发现，这是由人类生存发展任务繁重而生存发展力量相对不足的矛盾决定的。原始人出现后便面临着安全与生存两大课题，不过这两大课题主要是自然界方面的罢了，而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

作为个体的原始人是无能为力的。就安全方面而言，且不说地震、火山、洪水、火灾等重大自然灾害，就是面对凶狠的狮虎等猛兽，原始人个体也是无法抵御的。再从生存方面来看，原始人的食物来源相对匮乏，而在狩猎过程中，人的气力、奔跑速度等方面远远逊于一些动物，故而仅靠原始人个体是很难捕获猎物的。

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自然界，还来自人类社会本身。而作为个体的人，甚至单个的社会组织，也是力不从心的。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逐渐增多，由氏族形成胞族、部落，部落与部落在交往过程中，为扩展势力范围，或者掠夺其他部落的财富，或者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地，常常导致武力冲突或大规模战争，而无论对于哪个部落特别是弱小的部落来说，要想取胜，经常会感到势单力薄。

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一部分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进程中，无论作为单个人，还是作为单个社会组织的家庭、社区、地区、集团、阶层、阶级、政党、民族、国家等等，依然会感到力量不足。即便当今世界富翁比尔·盖茨十分热衷慈善事业，但仅靠自身力量也解决不了全球的贫困问题。即便当今超级大国美国，也不能为所欲为，常常陷入左支右绌的境地。至于像解决生态环境等全球性问题，更是单个国家做不到的。因此，完全可以说，力量相对不足是人类面临的永恒课题。

如何有效破解人类生存发展任务繁重与生存发展力量相对不足的矛盾呢？人类长期社会实践给出的唯一答案就是两个字：“团结”。当原始人面对猛兽威胁生命时，就“以群的联合力量和群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恩格斯语）；当原始人个体狩猎困难时，就采取群体团结的方式来克服；当弱小部落取胜无望时，就联合其他部落，炎黄两个部落结盟打败强大蚩尤部落就是明证；当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强大秦国的吞并威胁时，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实行“合纵”团结策略，推迟了秦

国扩张步伐,而六国最终未逃脱被吞并命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秦国采取“联横”策略,成功瓦解了六国的团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苏美英法等国团结而成同盟国,打败了强大的德意日法西斯;今天,世界各国成立了联合国,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总之,惟有团结才能凝聚力量,惟有团结才能改变力量对比,惟有团结才能取得胜利。正如那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所唱:“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十分重视团结、善于团结的政党。党成立以来近百年的历史,就是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奋斗胜利的历史,进一步诠释了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的真理。党 1921 年成立时只有 50 多名党员,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1936 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员仅剩三四万人,面对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力量明显是不足的,于是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与苏美英法等国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6 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后,党员数量尽管已发展到 100 多万人,但相较推翻三座大山的艰巨任务,力量也是不及的,因而建立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团结起来,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党员由 400 多万发展到几千万,现在已达近亿人,但在全中国 14 亿人民中仍属少数,相对于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繁重任务,力量仍然是不足的,因而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都团结起来,使我国迎来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因为如此,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再到

习近平总书记,都反复强调,统一战线是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

二、共同利益是实现团结的决定因素

生存发展任务繁重和生存发展力量相对不足是人类面临的永恒课题,加强团结是人类破解这一课题的永恒选择,这是无条件的。但是,人类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一次具体的团结时,又是有条件的,其中最为关键的条件是具有共同利益。周恩来同志指出,所谓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各方统一起来。这里的“共同点”,最主要的就是共同利益。

什么是共同利益?这首先需要搞清什么是利益。有人一讲到“利益”,总以为就是吃穿住行之类,这种理解窄了。利益是在需要基础上产生的,凡是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可以构成“利益”,因而马斯洛需求理论中所涉及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严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等,总括地说,就是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都属于利益范畴的内容。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利益可以区分为多种类型,其中从利益实现范围划分,可以区别为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从利益实现时间划分,可以区分为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从利益主体划分,可以区别为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等。而个体利益就是不同个体所特有的利益,也就是特殊利益;群体利益就是多个个体利益重合的部分,也就是共同利益。这里的“个体”与“群体”都是相对的,如家庭对每个家庭成员而言是群体,但每个家庭对其所属社区而言又是个体;政党对其所属党员而言是群体,但每个政党对其所属国家而言又是个体;国家对其所属国民而言是群体,但每个国家对世界而言又是个体等。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同样,人们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则同他们所具有的共同利益直接相关。共同利益是实现团结的基础,它不仅决定着团结的达成与破裂,而且决定着团结的范围大小和时间长短等。这就是说,人类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团结不是随心所欲的,总是依共同利益的变动而变动,当具有

共同利益时才有可能实现团结,而没有共同利益则绝无可能实现团结;当共同利益属于局部利益时,绝无可能实现全局团结;当共同利益属于短期利益时,绝无可能实现长期团结;当共同利益不复存在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团结的破裂。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同大土地所有者阶级实现团结,结成联盟,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利益。对此,马克思曾做过具体分析:“这个和资产阶级联系的大土地所有者阶级……与1789年法国封建地主不同,它对于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不但不加反对,反而完全抱有容忍的态度。这个阶级的地产事实上不是封建性的财产,而是资产阶级性的财产。这些土地所有者一方面供给工业资产阶级以手工工场所必须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能使农业的发展与工商业状况相适应。这就使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有共同利益,这就使土地所有者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亨利·巴麦斯顿在解释资产阶级这种做法时说:“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和永久的敌人,我们只有经常的、永久的利益,我们应当以这种利益为指针。”

我们还可以看看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例子,共同利益在加强团结中的独特地位作用就更清楚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就是因为全国人民在抗日救国这一点上是有共同利益的,这才形成了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局面。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还能与此前积极剿共的敌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实现团结,就是因为阶级矛盾下降,民族矛盾上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成为国共双方的共同利益,这才有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起空前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尽管有分歧、有摩擦、有斗争,甚至国民党曾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国共双方团结合作的局面仍能维持,这就是因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共同利益长期存在,这才有了长达14年之久的全民族抗战。为什么抗战胜利后第

二次国共合作破裂,就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已经被赶出中国,双方在这点上的共同利益不复存在,不仅如此,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独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建立独裁政权,并且不惜发动内战,使阶级矛盾再次上升,双方也再次成为敌人。由此可见,团结背后的根本问题是利益问题,共同利益是实现团结的决定因素。

没有共同利益就没有团结,更谈不上巩固发展团结,但有了共同利益是否就一定能够实现团结、巩固发展团结呢?回答是:“不一定。”即共同利益是实现、巩固、发展团结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中国有个“三个和尚”的民间谚语,后来还被改编成了儿歌,其中的一段歌词是:“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你说这是为什么?”人们的回答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认为这里的团结合作出现了问题。三个和尚是有共同利益的,就是都要喝水,具备了实现团结合作的基础,但为什么没有实现团结合作呢?其中一种合理的解释是,没有建立与团结合作相适应的共同利益共享机制,这才出现了人多反而没水喝,或者说人多力量不大的怪现象。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无数事实表明,就是合作共赢,这应当作为实现、巩固和发展团结的重要原则。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参加团结合作的一方不能合理分享共同利益,势必会影响合作的积极性,甚至会退出合作,从而削弱团结,或者导致团结破裂。

三、加强领导是实现团结的根本保障

为了解决生存发展任务繁重与生存发展力量相对不足的矛盾,不同社会力量必须在具有共同利益基础上加强团结合作。同时,人类在长期团结合作实践中意识到,要使团结合作有序有效进行必须要有领导。所谓“领导”,顾名思义,就是领而导之,其中“领”即统领,“导”即引导。领导是一种普遍现象,大雁高飞头雁领,羊群走路头羊导,就是其在自然界中的具体体现。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就是在团结合作的群体活动中,领导意识更强,领导行为更自觉,领导作用更突出。比如,原始人群

在团结合作、共同围猎时,就需要有人进行指挥,这就自然产生了领导。尤其在部落之间发生战争,不同部落结成联盟时,更需要产生军事首领进行协调和指挥。至于人类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团结合作范围日益扩大,更加需要加强领导。可以说,人类要生存发展,社会要团结合作,都要建立某种领导关系,都要进行某种领导活动。没有领导,就不能始终保持正确共同奋斗方向,就不能有效分工合作,就不能协调一致行动,就不能实现共同利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他还进一步用乐队为例解释说:“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

团结合作中的领导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那么,什么人或群体能够成为领导者呢?这实际上是个领导资格问题。纵观人类团结合作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我们可以发现在团结合作中成为各方拥护的领导者,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关键条件,即特质、实力和贡献。所谓“特质”,就是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殊品质,如坚定的信仰、坚强的意志、宽广的胸怀、奉献的精神、巨大的魄力、卓越的才能等等。所谓“实力”,就是所具有的实实在在的力量,包括看得见的有形的硬实力和看不见的无形的软实力。所谓“贡献”,就是在团结合作中所承担的责任和做出的业绩。团结合作中的领导者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谁具备了这三个关键条件,谁就具备了领导资格,获得领导地位,反之就会丧失领导资格和领导地位。

我们都知道,我国是多党派国家,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结成的政治联盟中,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处于被领导地位。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政党,为什么是共产党领导民主党派,而不是民主党派领导共产党呢?按照上面提出的领导

资格三个条件来分析,就很容易理解了。

先从特质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具有不同于民主党派的特质,就是具有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先进性具体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具有先进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自觉以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并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反映革命、建设、改革规律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比如具有先进的阶级基础,以最先进、最有觉悟、最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由优秀分子所组成;比如具有先进的组织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结合起来,切实保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党始终具有凝聚力、战斗力。

后从实力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始于抗日战争时期,而各民主党派正式宣布接受中共的领导,则是在 1948 年中共提出“五一口号”之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共与国民党战略决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实力空前强大了。这种强大实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硬实力,中国共产党目前拥有近亿名党员,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党,是执政党,并掌握着全国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是软实力,具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

再从贡献方面来看。按照合作博弈理论,合作收益分配是按合作各方的贡献来决定的。这也是确定在多党合作中政党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团结合作中居于领导地位,也是与中共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一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和带领全国人

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其中仅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就有2.6万名共产党员献身,几乎占当时共产党员的半数,终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使中国站起来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入侵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们在长时间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起任何政党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二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征途中虽然经历了曲折,但经过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40年的艰苦奋斗,已经根本改变了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农民贫困人口即将实现全部脱贫,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国富起来了。三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强盛中国。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产品产量都位居全球第一,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实力和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1944年6月5日,美国艾森豪威尔上将指挥美、英、加等同盟国的36个师,近300万士兵,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在法国诺曼底成功抢滩登陆,拉开了盟军反攻的序幕,为二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6月6日,作为诺曼底登陆行动总指挥的艾森豪威尔在电台发表获胜演讲后,工作人员在收拾讲演稿时,无意中发现了艾森豪威尔为此登陆行动准备的另一份演讲稿,内容却截然相反:“我悲伤地宣布,我们登陆失败。这次失败完全是我个人决策和指挥失误造成的,我愿意为此承担全部责任。”艾森豪威尔的两份讲话稿,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领导者在团结合作中的领导,既可能是正确的、成功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失败的。怎样实施正确的领导,避免错误的领导,是领导者面临的重大课题。总结团结合作领导实

践,必须努力做到以下几条。

要发挥率先垂范作用。在团结合作中,领导者要履行领导职能,创造好的领导效能,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就是以领导者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激励和感召被领导者,它是领导者的一种无形力量,能够使领导者的意志潜移默化地为被领导者所接受,使之成为双方的共同意志,起到同心协力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坚持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时所说的:“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求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领导者的模范带头作用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要求合作者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合作者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

要坚持民主协商。1975年5月,周恩来同志病重期间,还对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组织爱国人士外出参观的请示报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此类参观人员,如尚未与他们协商,就突然宣布,(不妥),似仍应分别约他们座谈一次,取得他们的同意后再定,以示我们历来主张的民主协商精神。”周恩来同志和我们党为什么如此重视和强调民主协商呢?就是因为坚持民主协商既是团结合作中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领导的基本方式。因为领导者与参加团结合作的各方面进行民主协商的过程,既是沟通听取意见的过程,又是被领导者了解领导者主张的过程,从而更有助于形成共识,并自觉地贯彻实施。这种领导方式,就是寓领导于协商之中。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颁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协商建设的意见》,完善了政党协商、政协协商等民主协商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每年亲自主持召开的党外人士协商座谈会就有四次之多,有力地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领导。

要照顾同盟者利益。共同利益是建立统一战线、实现团结合作的基础,照顾同盟者利益是领导者实现领导的重要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共享共同利益,就是建立合理的合作收益分享机制,使参加团结合作的各方,都能够根据自己职责和贡献,分享共同利益。二是照顾特殊利益,就是充分认识参加团结合作各方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特殊利益(如在我国爱国统一战线中,信教群众同其他统一战线成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方面有共同利益,在宗教信仰方面又有其特殊利益),必须尊重、维护、照顾其合理的特殊利益,这有利于激发其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奋斗的积极性。三是舍得自身利益,就是领导者要有奉献精神,特别是在同团结合作各方利益发生矛盾时,要舍弃一部分自身利益,这样更能提高领导者的威望。正如美国著名领导学专家马克斯韦尔所说:“当领导一定得牺牲,而这种牺牲是一种持续的过程,并非只是一次的付出而已。”“越伟大的领袖,需要付出的也越多。”

四、批评或斗争是实现团结的必要手段

先看一个故事。柳亚子先生是国民党左派元老,一贯同情革命、赞助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有长期合作的历史。1948年与宋庆龄等一起,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49年3月,柳亚子先生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受中国共产党邀请,来到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建工作,但对自己的安排感到不满,于是于3月28日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七律·感事呈毛主席》,表示要回家乡隐居。毛泽东同志4月19日写了《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对他的消极态度和情绪进行批评和规劝,特别写道:“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接到毛泽东同志和诗后,柳亚子先生深受感动,打消了回乡隐居的念头,积极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和建设工作。这个故事说明,团结不是没有批评,团结离不开批评,批评是实现团结的必要手段。

为什么团结中有批评或斗争呢?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在人类社会,不同的社会力量因具有共同利益而团结起来,但在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奋斗过程中,围绕如何实现共同利益、如何分享共同利益,会面临一系列具体问题,如合作各方所处地

位、所承担任务是什么,实现共同利益的道路、步骤是什么?分享共同利益的原则、办法是什么,等等。同时,参与团结合作各方除了共同利益,还有各自的特殊利益,这些特殊利益有的是合理的,有的是不尽合理的,有的甚至与共同利益是矛盾的。由此,决定了合作各方在回答和处理这些问题时,不可避免会产生分歧、摩擦、冲突,对团结合作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导致团结合作的破裂。如何有效弥合分歧、减少摩擦、化解冲突呢?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开展必要的批评或斗争。团结合作中的批评或斗争,态度做法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效果作用有积极与消极之别。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正确有效地开展批评或斗争,要注意把握好以下几点。

首先,正确把握批评或斗争的目的:维护团结。共同利益是实现团结的决定因素,团结合作是实现共同利益的可靠保障。团结合作与共同利益的这种相辅相成关系,意味着维护团结就是维护共同利益,巩固团结就是巩固共同利益,发展团结就是发展共同利益。因此,团结合作中开展批评或斗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维护团结。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总结党成立以来加强党内团结、统一战线团结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开展批评或斗争的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从这个公式可以清楚地看出,一方面,团结是批评或斗争的出发点,就像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另一方面,团结是批评或斗争的落脚点,就是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这也是检验批评或斗争是否正确有效的标准。总之,在这里,团结是目的,批评或斗争是手段。切不可混淆了,更不能弄颠倒,把批评或斗争当成目的,为批评而批评,为斗争而斗争,那样只会损害团结,最终损害

共同利益。

其次,自觉拿起批评或斗争的武器:敢于批评或斗争。团结合作中会有这种情况,有的合作方为了维护团结,对出现的分歧、摩擦、冲突等采取和稀泥的态度,甚至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不敢表态,更不敢批评或斗争,这是一种无原则的团结,从最后的实际效果看,不仅难以维护团结,还会损害共同利益、根本利益。这方面,我们党有过惨痛的教训。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开展了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国民革命运动,但在后期犯了以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主义错误,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的叛变行为无原则妥协退让,担心坚决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结果不仅没有阻止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而且直接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及至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党吸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同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不仅维护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且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只有斗争,不要团结,是‘左’倾错误;只有团结,不要斗争,是右倾错误。这两种错误我们党都犯过,经验很惨痛。”“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并强调,这是一条真理。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我们党近百年团结合作历史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所以,在团结合作中必须自觉拿起批评或斗争的武器,对损害团结和共同利益的现象,该提醒的提醒,该批评的批评,该斗争的斗争。

再次,努力掌握批评或斗争的艺术:善于批评或斗争。团结合作中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有批评或斗争的勇气,不讲批评或斗争的方法,发现问题瞎批一气,乱斗一番,其结果很可能不是维护团结,而是损害团结,进而损害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这

说明仅敢于批评或斗争是不够的,还要善于批评或斗争。所谓善于批评或斗争,就是区别不同合作对象,区别不同性质矛盾,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做到批而不破,斗而不裂。这里面,特别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所谓“有理有利有节”,用毛泽东同志的解释,“就是斗争要有道理,要有胜利的把握,取得适当胜利的时候要有节制”。我们党抗日战争时期对皖南事变的处理,就是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的经典范例,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围攻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其中大部分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压。面对如此严重局势,我们党仍以抗日大局为重,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斗争,及时公布事实真相,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提出惩办祸首、释放叶挺等十二条解决办法,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和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迫使蒋介石公开表态,“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从而维护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团结影响一切,一切影响团结。本文所论述的第一个问题,集中分析了人是以群体方式生存发展的,生存发展任务繁重与生存发展力量相对不足的矛盾是人类面临的永恒矛盾,团结合作是破解这一矛盾的永恒选择,并且人类社会实践的时间和空间延伸到哪里,团结合作的历史和范围就拓展到哪里,包括从氏族、部落、民族、阶级、政党到国家,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到生态文明建设,团结合作影响着人类生存发展的方方面面,此即“团结影响一切”。后三个问题,集中分析了利益、领导、批评或斗争与团结合作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这当中无论哪个问题处理不好,都会对团结合作产生影响,此外还有许多未及论述的或大或小的问题,也都对团结合作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总之,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影响着团结,此即“一切影响团结”。

责任编辑:王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逻辑脉络和实践展开研究

张兴奎 张佩栋 张纵横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统一战线领域的具体运用和实践验证的辩证统一。本文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逻辑脉络和实践展开进行了深入研究。

关键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哲学基础;逻辑脉络;实践展开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1-00012-07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统一战线领域的具体运用和实践验证的辩证统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必须立足于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本质,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逻辑脉络和实践展开,把握贯穿其中的主脉,知其根本、晓其由来、见其演进,以深悟引领落实。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指导思想,其强

大真理力量的根源在于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方法的深刻把握和灵活运用。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悟得深与浅,用得成与否,行得远与近,都在于对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解得是否深刻。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根本立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民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究其本源就在于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人民立场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而作为这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

收稿日期:2020-01-20

作者简介:张兴奎,中共辽宁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张佩栋,中共辽宁省委统战部政研室主任;张纵横,中共辽宁省委统战部政研室一级主任科员。

想的根本立场也同样是坚定的人民立场。首先,人民立场的最大公约数是中国梦,包容的半径最长。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高度契合。以中国梦为共同目标,是统一战线强大生命力的根本之所在,使我们党与时俱进,始终做到超越其他所有政党,真正找到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使统一战线理论植根于人民之中,也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这一政治联盟,不同于任何其他政治联盟,能够整合不同政党、阶层,甚至不同信仰、民族的力量,真正实现求同存异,始终做到团结和谐。其次,坚持人民立场最能做到原则性和广泛性相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统一战线工作对象、范围、具体政策的发展呈现一种空前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据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党外知识分子的力量、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自己人”、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发挥作用、港澳台侨务工作的重点是争取人心,宗教问题是信教群众问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等。这些要求都是基于为实现中国梦而最大限度地拉长统一战线包容多样性的半径,画出最大同心圆。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旗帜鲜明地画出了政治底线,即“对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危害国家制度和法治、损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反对,不能让其以多样性的名义大行其道”,这揭示了人民立场的原则性。如果说广泛性使统一战线体现的人民立场具有更强的包容性,那么原则性则为统一战线体现的人民立场固定了圆心。第三,坚持人民立场决定了统一战线是争取人心的工作,决定了思想政治引领是统一战线首要的政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战工作的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是人心和力量的问题。只有彻底的人民立场,才能最广泛地争取人心,这是统战工作是争取人心工作的最根本的依据。统战工作虽然千头万绪,但归之于—就是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说到底就是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

造者和社会发展决定力量这一根本观点出发,道出了统一战线的真谛。悟透了这一点,我们在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安排人士、增进共识、加强团结的过程中,才有坚强的定力,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和实践途径都来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但其基本观点都是源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什么是统一战线、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统一战线这个根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比如,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重要法宝地位的论述,是在正确认识新时代我国发展内外环境“三个更加多样”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对解决“人心向背、力量对比”问题的哲学思考。这一论断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物质统一性这一最基本、最核心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规律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创造者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统战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其实践途径都来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实践途径基于基本方法,这一重要思想的实践途径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民主党派工作的有关论述中,既强调民主党派要加强自身建设,又强调我们要为其加强自身建设创造条件。在加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工作的论述中,既强调要加强同他们的接触,团结他们,引导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都能同我们一条心,又指出对他们中干了违法事情的人,要依法处理。在民族宗教工作中,既强调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防范“三股势力”制造事端,需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同时又指出要把握好政策,避免过犹不及。在论述统一战线做特殊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过程中,既强调对党外人士多接触、多谈心、多帮助,交一些能说心里话的挚友诤友,又强调要在交朋友过程中讲原则、讲纪

律、讲规矩,出于公心为党交肝胆相照的党外朋友等等。这些都体现出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以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解决统一战线实际问题的高度自觉。综上,我们在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去把握其哲学基础,才能把握这一思想真正的“源”,才能真正掌握这一思想认识统一战线的视角,才能真正激发这一思想释放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伟力。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统战篇”,二者统一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通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这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其人民立场,这点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人民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鲜明的理论品格,那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统战篇”的形成过程上来看,这种理论品格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就体现为其动态性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契合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首先,贯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的基本逻辑,都源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在习近平总书记对统战工作的重要论述中,无论是关于统一战线基本问题的重要论述,还是对于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具体的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都是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大逻辑展开的,一以贯之地把统战工作放到党治国理政的全局和战略层面去思考。比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框架下,强调民族工作中民族地区要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受益者,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就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中思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在宗教工作中强调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思路;关于加强参政党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提出了“四新”“三好”的要求,中央还先后下发了三个文件,对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自身建设进行了系统的顶层设计,这也可以看做是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在参政党建设领域的一种思路延续等等,这些都是习近平总书记从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准确判断和新时代统一战线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以中国梦的实现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统战工作为原色,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为底色而绘就的壮丽蓝图。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统一战线领域的具体展开。从宏观上看,以人心向背、力量对比为逻辑起点,统一战线三个法宝地位作用确立、三个服务主要任务的明确都立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总目标,体现了对新时代统战工作在党和国家大局中战略定位的深刻理解,揭示了新时代统战工作与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内在关联。从微观上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统一战线明确的重点工作,也都是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统一战线领域进行的具体展开。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强调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第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着统一战线工作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在对党的全局工作的论述中统战思维和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也是浸润其中的,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互联系的系统性,二者是一脉相承的,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是基于人民立场对人心向背的论述。比如在谈宣传工作、作风建设、群众路线、反腐败等许多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都把人心向背作为根本问题加以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领域不同场合的重要会议上多次强调人心,特别指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可见对人心向背的认识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谋划统战工作的逻辑起点,也是他思考全局工作的逻辑起点,是在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体现出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最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动态性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契合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这种逻辑性和系统性沿袭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呈现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高度契合。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成体系的高度契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一种动态性、系统性的因时因地的变化,既是结果也是过程,并通过这种变化不断被实践检验,不断反作用于理论发展,最终实现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要求高度契合,统一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最具特色的方面是贯穿着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强调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强调统一战线是特殊的群众工作,其哲学根源就在于此。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不是随随便便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而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是经过实践检验的不断运动着的理论体系,同时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认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使得这一思想始终坚持着人民立场、贯穿着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实现了真理和价值的统一,这也是党的初心和使命在统一战线领域的体现。

综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

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呈现出极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高度契合,这是因为这一思想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实践途径皆源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统一战线领域的生动体现和实践展开。更重要的是,这种成体系的高度契合是不断运动着的、贯穿着群众史观,统一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强大生命力和强大真理力量、价值力量的根源。

二、习近平总书记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的逻辑脉络

贯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逻辑主脉是人心,使这一思想实现了真理逻辑和价值逻辑的统一,也决定了争取人心是贯穿统一战线全部工作的大逻辑,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思想的“金钥匙”,而剖开哲学理论的内核,亦可体会出一名共产党人基于人心而生的初心。

(一)统一战线确立的基本原则源自人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的问题。人心作为统战工作的核心问题首次被明确指出,是从根子上解决了为什么需要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统战工作是因为其不可替代的、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而存在的;其重要地位的确立,是其在解决人心和力量问题过程中发挥出的作用为依托的。因此,作为我们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统一战线的根基一定是来自人心,其确立的基本原则也只能是基于人心向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大团结大联合。

(二)统一战线的重大方针政策基于人心。在论述新时代如何做好统战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将掌握规律放在第一位,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是统一战线领域的基本规律,可以说,统战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都是在尊重这个规律的基础上形成

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关键在求同存异。求同就是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意在汇聚人心,存异就是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也是为了赢得人心。一致性多样性规律是在固守政治底线圆心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扩大包容多样性的半径,找到最大公约数,赢得更多的人心,从而画出更大同心圆。从本质上说,正确处理一致性多样性关系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解决人心向背、力量对比的问题,是唯物辩证法在统战工作中的运用和实践验证,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统一战线理论的重大创新成果。那么基于一致性多样性规律而产生的统战工作的主题、任务、政策、措施,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必然以人心为根基。特别是面对“四个前所未有”叠加的客观现实,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方位和使命发生重大变化,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凝聚智慧、凝聚共识的工作更加艰巨。更需要我们认清这“四个凝聚”中,凝聚人心是其他三个凝聚的基础,“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只有把广大统战成员的人心凝聚起来,才能真正把党中央对统一战线的决策部署落实下去,服务好“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

(三)推动统一战线发展的方式方法基于人心。统一战线是团结学,是力量论。如果说前面两点的论述揭示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重要思想以人心为基础,以不断扩大团结面为重点所取得的创新成果,那么基于人心的方式方法选择,则体现出这一思想以力量汇聚为着眼点,在实践层面的创新。从宏观上来看,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强调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利益,强调要善于联谊交友、广交深交党外朋友。这些在统战工作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工作方法,都有着鲜明的人心指向。从各领域统战工作的具体方式方法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也是基于如何更好地把握人心。比如在论述政治协商过程中,强调协商就要诚心诚意、认认真

真、满腔热情听取意见和建议;在论述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时,强调要学会同党外知识分子打交道,特别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这样才能把党外知识分子这个阵地守好;在论述民族宗教工作过程中,强调要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强调要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在论述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过程中,强调要发挥统一战线争取人心的作用。在这些推动统一战线发展的具体举措和方式方法中,人心也同样是其出发点和立足点。

(四)加强统战工作的根本保障基于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一方面实行的政策、采取的措施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另一方面,必须明确,在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还要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的利益,这是我们党的职责,也是实现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重要条件。可见,加强党的领导,其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凝聚人心,只有党的领导加强了,人心才不会散。这是唯物辩证法在统战工作领导权领域的具体运用,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为了更好地加强党委对统战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强调了加强大统战工作格局,使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的哲学思考在实践层面有了具体举措,体现的是从“为什么做”到“谁来做”再到“如何做”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这一思想的起点是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落脚点是更好地赢得人心,具体举措是通过不断优化党委的资源配置,实现实践层面的落实落地。理清了这一思想脉络,我们也就体会出加强党对统一战线领导这一论述背后的战略思考和全局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在具体的工作中把握分寸,使统一战线的政治性、政策性得到恰如其分的贯彻。

综上所述,在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和如何保障的逻辑思维过程中,人心都是破题的题眼,是贯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

重要思想的逻辑主脉,这也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最根本的逻辑和最鲜明的特色。体现出符合人类社会发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的实践展开

前文在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和逻辑主脉的论述中,得出了两个基本结论:一是人民立场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基本立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实现了其哲学基础价值逻辑和真理逻辑的统一;二是人心是贯穿这一思想的逻辑主脉。据此,我们对人心的理解不应只停留在对人心向背、力量对比重要性的认识上,而是要把它当做一种思维方式融入统战思维之中,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实践展开中,人心既是基础,也是评价标准。

(一)多党合作应着眼发挥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凝聚人心。任何一种政党制度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存在的,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代表谁的利益,决定了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走向,也是其制度特色、制度自信的来源。而我们的制度特色,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三个“新就新在”,归之于一体现了在解决人心问题过程中的人民立场。发挥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有利于体现我们的制度特色、树立制度自信,有利于在多党合作过程中凝聚人心,同时,是否处理好人心问题也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发挥的重要评价标准。因此,要发挥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提高其制度效能,要把握既解决问题又凝聚人心的原则,时刻着眼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一要坚持民主的原则,二要坚持协商的原则。特别是我们在协商有效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一致性意见的取得不仅仅是要一个集中统一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要树立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的观念,使民主的实现贯穿过程和结果的各个方面,让参与者不仅享受到民主的成果,更在参

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切实体会到民主的主观感受,而这种民主感受对于人心的凝聚往往意义重大。

(二)非公经济领域统战工作应着眼支持其改革发展凝聚人心。解决一切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发展本身。在非公经济领域统战工作中,要从根本上实现团结联合,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应是中心思想,因为这样是真正将他们当做“自己人”,这样才能发挥他们重要作用,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不断扩大同心圆半径的重要方法,一致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发掘一致性以及使一致性实现最大化的过程中,沟通交往的方式方法至关重要,因此,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对非公经济领域统战工作一致性包容主导多样性的实现程度有着重要的作用。支持改革发展、优化政商关系,要有共同的圆心,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价值引领就是瞄着一致性包容主导多样性同心圆的圆心的,而规范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安排是为了以点扩面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的。以上几个方面环环相扣,互为前提和基础,为我们明确了这一领域统战工作争取人心的中心思想、方法、原则和抓手。

(三)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应着眼创造其发挥作用的条件凝聚人心。知识分子最关心的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最希望的是充分施展才华、发挥作用,因此,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应着眼为其发挥作用创造条件,这是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中实现一致性的重要现实基础,既有利于凝聚人心,也有利于凝聚力量,要积极创造条件,针对党外知识分子干事创业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主动同有关部门沟通配合,畅通建言献策渠道,营造创新创业环境。在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中争取人心的重要方法,是注重加强思想引导,这是党外知识分子自身特点决定的,一方面,党外知识分子是统一战线领域思想活跃的群体,特别是对于有影响有个性的党外知识分子,要及时了解掌握思想动态,另一方面,发挥党外知识分子的作用,更多的也是发挥他

们在思想领域的作用,他们发挥能量的重要阵地也是思想领域,特别是党外知识分子是党外代表人士的源头,加强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关键是让这些有理想、有见地的党外人士能够心甘情愿跟党走、为党建言。

(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应着眼创新组织起来的方式来凝聚人心。根据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组织起来”的总的工作要求,如何真正地把这部分统一战线各领域中最“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在强化原有工作方式方法的基础上,以人心为着眼点进行创新将是一种有益的探索。首先,要从关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出发去凝聚人心。一方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呈现出“多”的特点。与传统的统战工作领域相比,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去单位化”,所以传统的以单位为依托的工作方式很难满足新的工作的需要,“去单位化”也使其标志性人物在所在领域的认同度、权威性和影响力很难具有整体的代表性,影响了“一根头发”抓“一把头发”的效果,因此,要实现既有工作目标不得不对更“多”的工作对象。另一方面,这一群体呈现出一种“杂”的特点,表现在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多元化。面对“多而杂”的现状,从人的基本需求出发,将政治组织的目的隐化在不同的平台和载体(比如针对作家的剧社、网络代表人士的微信群、热心公益群体的公益性组织等)中,重点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推动他们的政治参与,实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其次,要做到合之有方。如果说从关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出发去凝聚人心,体现了一种分众化的工作思路,根据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不同特点,搭建不同的平台,以关注其需求为着眼点,实现其归属感,形成了一种“亚单位”,那么合就是把这些“亚”单位组织起来,比如纳入到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中,纳入到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纳入到统一的综合评价机制中等。

(五)港澳台统战工作和侨务工作应着眼中国梦的实现来凝聚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港澳工作、对台工作、侨务工作中,要发挥统一战线争取人心的作用。首先,争取人心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以中国梦引领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现和价值追求,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最大公约数。其次,争取人心的重点要把握“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做好青年的工作;在方法上要明确争取人心是全方位的,既要巩固爱国力量,争取中间力量,还要分化敌对力量。

(六)民族和宗教工作应立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来实现凝聚人心。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因此,要时刻从全局角度出发,通过凝聚人心做好民族和宗教工作,通过做好民族和宗教工作来凝聚更广泛的人心。民族工作方面,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宗教工作方面,要把“导”的核心理念吃透、用好。

责任编辑:王芳

试论习近平关于新时代统战工作的互联网思维

吉 强

摘 要:当前,互联网已成为凝聚共识的“最大变量”。针对这个“最大变量”的深刻影响,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强调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对此,需要以什么样的互联网思维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是新时代统战工作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就互联网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其中为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所提供的互联网视角及其观点,构成了新时代统战工作的互联网思维。这一新思维是由互联互通观、网上网下一体观、虚拟人现实人统一观、学网懂网用网观所构成的“四位一体”的思维体系。新时代统战工作运用这一新思维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需着重处理好三种关系——网上与网下的关系、虚拟人与现实人的关系、现代与传统的关系。

关键词:习近平;统战工作;互联网思维;网上网下同心圆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1-00019-05

随着人类进入信息革命阶段,互联网已成为凝聚共识的“最大变量”。针对由此而来的深刻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1],并提出,要“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2]。对此,需要以什么样的互联网思维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进而助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顺利实现?这是新时代统战工作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就互联网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其中,为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所提供的互联网视角及其观点,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统战工作的互联网思维。这一新思维是新时代统战工作应对互联网“最大变量”,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所需牢固树立并充

分运用的思维方式。

一、形成背景:互联网成为凝聚共识的“最大变量”

当今时代,“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国正处在这个大潮之中,受到的影响越来越深。”^[3]对于统一战线而言,互联网造成凝聚共识的客观因素发生重大变化,给凝聚共识带来巨大挑战,因而成为凝聚共识的“最大变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统战工作的互联网思维。

(一)凝聚共识的客观因素发生重大变化

互联网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从空间形态、人的特性、技术手段等维度,使凝聚共识的客观因素

收稿日期:2019-12-30

作者简介:吉强,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一级主任科员。

发生了重大变化。

互联网不仅推动了信息传播革命,还“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4]——网络空间。这一空间已成为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对他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他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工作、对人生的看法产生重要影响”^[5]。同时,网络空间与网下空间并不是两个并行的完全独立的空间。互联网“再造我们的世界,同时保留这个世界的物理与社会维度”^[6],“网络空间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各个地方之间的通道”^[7]。网络空间与网下空间构成了社会空间的两个维度,深刻改变了共识存在空间的形态。其次,人总是依存于一定的空间。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使得人从单一的现实性演化出现实虚拟双重性。这对如何做人的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此外,互联网已由计算机及有线网络技术,发展出移动通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技术,对工作方式手段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凝聚共识面临巨大挑战

马克思在谈及科技异化时指出,“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8]。互联网造成的空间、人、技术等客观因素的重大变化,为凝聚共识提供了重要机遇,有利于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有助于形成并巩固社会的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共同价值观,但同时,也给凝聚共识带来了巨大挑战。

当前,网络空间为鼓吹西方式民主,散布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裂国家等敌对思想提供了全新环境,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网络空间还成为各种信息的集散地,为舆论的异质化、分散化提供了新土壤,易引发社会整体舆论的分化、分裂。网络技术与人的虚拟性相结合,使得网络空间的话语权生态形成了“去中心化”和“多中心化”交织的格局。同时,网络空间的上述状况又会通过技术手段和人的现实虚拟双重性,作用于网下空间,引发网上网下的同频共振,进而在整个社会空间造成更大的不利影响。可以说,因互联网的“减量”效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不断受到冲

击,社会舆论的一致性时常面临被消解的巨大风险,话语权掌控的难度大为增加,“凝聚共识工作不容易做”^[9]。

面对上述新变化、新挑战,新时代统战工作需要顺应互联网发展大势,不断强化互联网新思维,努力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

二、科学内涵:“四位一体”的思维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统战工作的互联网思维,其内涵体现为互联网视角下四个维度的观点:网络规律维度的互联互通观、工作空间维度的网上网下一体观、工作对象维度的虚拟人现实人统一观和工作本领维度的学网懂网用网观。其中,互联互通观是这一新思维的基石和贯穿主线,解决的是如何认识互联网规律的问题;网上网下一体观是这一新思维的主体内容,解决的是如何把握社会空间新形态的问题;虚拟人现实人统一观是网上网下一体观的逻辑延伸,解决的是应对社会空间新形态,如何把握人的新特点的问题;学网懂网用网观是这一新思维的落脚点,解决的是怎样运用互联网的问题。上述四个维度的观点相互关联、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思维体系,是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所需牢固树立并充分运用的思维方式。

(一)网络规律维度的互联互通观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洞察互联网规律,指出,“网络的本质在于互联,信息的价值在于互通”^[10]。这为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提供了网络规律维度的互联互通观。

互联互通观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联系的观点。根据普遍联系观点,我们所处世界的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联系不仅存在于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也存在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对于事物的存在与发展,既是内在属性,也是外在条件。互联网的互联互通正是基于普遍联系而产生的,又是普遍联系在信息革命阶段的最新体现,它将世界的普遍联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互联互通观是互联网规律的集中体现。互联网的互联是多维多层多向交互的跨界互联。它由

终端、线路等设备的互联,演进为设备互联、内容互联、人的互联、物的互联交织一体的“物—信息—人”互联;它由信息传播领域的互联延伸至对社会方方面面的互联;它在横向上,从地域性互联扩大到“地球村”的互联,在纵向上,从线上互联拓展到“线上线下一体”互联。其中,信息互通是互联网互联的核心所在。在互联网互联的各要素中,信息处于关键地位,一切互联均是以信息为媒介、以信息为内容,均是建立在信息互通的基础上。缺少硬件设备的互联、人的互联,信息难以畅通流动;但缺少信息的互通,设备、人及其他要素的互联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可以说,网络互联与信息互通互为条件而嵌于一体,构成了互联网的内在基因,也集中体现了互联网的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11]。对此,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不仅要认真遵循统一战线发展规律,也要深刻把握互联网规律,学会运用互联互通观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二)工作空间维度的网上网下一体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上网下要同心聚力、齐抓共管,形成共同防范社会风险、共同构筑同心圆的良好局面”,并指出“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12]这为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提供了工作空间维度的网上网下一体观。

“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网络空间”^[13]并非网下空间的“原生态”映射,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为凝聚共识提供了不同于网下空间的全新社会环境,特别是它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14],又强调“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15],要求“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16]。

同时,网络空间又与网下空间互联、互动而交融,共同构成了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空间。对此,习

近平总书记不仅重视网络空间的社会共识,要求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更是强调凝聚共识的网上网下一体性,要求“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17]。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空间具有互联互通性,而网下空间具有分化区隔性。因此,不仅存在基于网下空间的对应式“网上一网下”的对立统一,也存在基于网络空间的跨界而整体式“无界性网上一有界性网下”的对立统一。需要从这两个对立统一中把握网上网下一体观。

(三)工作对象维度的虚拟人现实人统一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虽然是无形的,但运用互联网的人们都是有形的”,“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18]这为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提供了工作对象维度的虚拟人现实人统一观。

虚拟人现实人统一观是网上网下一体观的逻辑延伸,即人在什么样的空间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在什么样的空间做什么样人的工作。网络空间是人的精神交往空间,因而人在网络空间具有精神交往的非实体的虚拟性。由于网络空间相对独立于网下空间,虚拟人与现实人并非完全对等,而是有其固有的特性。这就需要面对网络空间的虚拟人做好工作。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19];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20]。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虚拟人不是技术手段“无中生有”构造出的“虚拟人”,而是网下空间现实人的精神交往层面的“人”,人的虚拟性与现实性统一于人的个体。对此,习近平在谈及做好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工作时指出,要“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21],这一要求表明,做人的工作是做虚拟人和现实人工作的统一。

(四)工作本领维度的学网懂网用网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

是高级干部,如果不懂互联网、不善于运用互联网,就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学网、懂网、用网”。^[23]这为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提供了工作本领维度的学网懂网用网观。

互联网诞生以来,各种新技术、“黑科技”层出不穷,持续造成凝聚共识客观因素的新变化,不断给凝聚共识带来新挑战。面对这些新变化、新挑战,如果不熟悉、不了解、不懂得互联网,存在互联网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那么就很容易“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23],就容易导致“不是不对路子,就是事与愿违,甚至搞出一些南辕北辙的事情来”^[24]。因此,要学网懂网用网,“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25],“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提高通过互联网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26]。

三、实践指向:处理好三种关系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27]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钥匙”。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统战工作的互联网思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强化这一新思维,用好这一“方法钥匙”,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需要在遵循互联网规律的基础上处理好三种关系。

(一)处理好网上与网下的关系

统战工作要把网络空间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认清它与网下空间的重要差异,重视它的意识形态斗争主战场地位,积极向网络空间延伸,努力构建网上同心圆。

另一方面,统战工作要在网上网下深度融合的社会空间中一体化推进,以做好网下工作打牢网上同心圆的现实基础,以加强网上工作巩固、扩大网下同心圆。在此过程中,可按照传统工作格局,依据行政区域、大陆内外的地理划分,或依据统一战线“五大关系”及社会阶层的类别区分,在

网上网下空间的对应式互联中开展工作。但更要突破传统工作格局,在无界性网上空间与区隔性网下空间的跨界式整体性互联中开展工作,更好地促进网上网下两个同心圆互联互动而为一体。

(二)处理好虚拟人与现实人的关系

依循互联网规律加强线上互动,做好虚拟人的工作。引导统战工作对象在网络空间积极发声、正确发声。就强化正面宣传、扩大主流舆论、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发挥他们构建网上同心圆的正能量。由于网络空间“去中心化”、“多中心化”交织并存的话语权格局,正能量的声音越多,就越有利于巩固亿万网民的共同思想基础。因此,不仅要重视新媒体中代表性人士的网上作用,也要加快推动传统统战工作对象,特别是其中的党外知识分子,在网络空间发声。

同时,通过现实中的团结、服务、引导、教育加强线下沟通,做好现实人的工作。既要进一步发挥他们在各自网下空间中的作用,又要为发挥他们虚拟人的作用提供现实条件。在此过程中,依靠人的现实虚拟双重性互联线上与线下,把网上形成的“以一带片”效应扩散至网下,巩固、扩大网下同心圆;把网下“以一带片”的人际互动延伸至网上,助推网上同心圆的形成。

(三)处理好现代与传统的关系

互联网既是信息传播工具,又是人际关系重塑、社会结构重构、生产力要素重整的建构力量。因此,统战工作在充分运用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同时,要注重借助互联网的建构力量,以此推动“互联网+”统战,为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提供坚实保障。

上述过程,不仅是在传统方式手段之外采用新的方式手段,更是以互联网的方式手段融合、改造传统方式手段,促进“互联网+”创新。这要不断加强统战新媒体平台矩阵建设,并善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更好地了解情况,掌握动态,分析趋势,传播信息。要把互联网尤其是网络社交媒体作为“联谊交友”及“组织起来”、宣传引导的新空间、新载体、新工具,并推动“联谊交友”及“组织

起来”、宣传引导等实现网上网下一体化联动。要基于人的现实虚拟双重性,推动线上互动与线下沟通相融合。要借助互联网在条块区隔的科层制工作架构中,嵌入互联互通的扁平化、一体化工作网络。

参考文献:

- [1][2][26] 习近平. 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 [EB/OL]. (2018-4-21).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4/21/c_1122719810.htm.
- [3][23][2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97,404,403.
- [4][10][18] 习近平. 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EB/OL]. (2015-12-16).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16/c_1117481089.htm.
- [5][9][11][14][15][1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35,335,303,325,336,336.
- [6][7][美] 曼纽尔·卡斯特,马汀·殷斯. 对话卡斯特[M]. 徐培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41,38.
- [8]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6.
- [12][22] 新华社.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 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N]. 人民日报,2016-10-10(1).
- [13] 习近平.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EB/OL]. (2017-12-09). http://www.xinhuanet.com/2017-12/09/c_1122084706.htm.
- [16][25] 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4,55.
- [17] 习近平.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EB/OL]. (2019-01-25). http://www.cac.gov.cn/2019-01/25/c_1124044176.htm.
- [20][21]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著.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解答[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17.
- [27]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4.

责任编辑:宋好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传统文化基因 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江苏省委统战部 南京财经大学联合课题组

摘要: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几千年传承发展的传统文化基因是其发展的历史依托和动力源泉。它所蕴涵的丰富民族文化精神可在激发当代新型政党制度潜能方面具有巨大价值优势,在推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善于吸取其养分,又赋予其新时代内涵,有效提升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价值及其国际话语权功能。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传统文化基因;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1-00024-0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我们从执政党主导性与各政治主体协商多样性相统一的立体动态思维和总体视角出发,着眼于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和目标导向,积极探索基于传统文化基因的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重要价值。以南京、苏州、淮安三市为典型地区,利用互联网和全省统一战线工作网络,对江苏全省范围进行问卷调查、个别采访和集体座谈,收到网络有效问卷答案 2420 份,调查对象从年龄层次看,18-29 岁占 2.27%,30-39 岁占 22.4%,40-49 岁占 38.64%,50 岁以上占 36.69%,以已经工作的成年人作为调研对象,意见和观点相对成熟,反映社会相对真实的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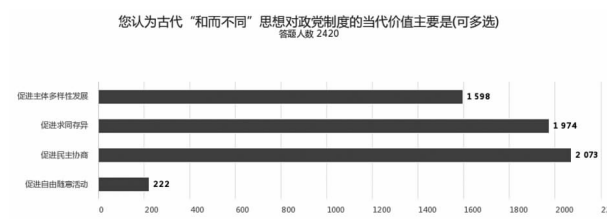
况;从政治身份看,中共党员占 5.7%,民主党派成员占 92.64%,工商联会员和无党派人士(一般群众)占 1.28%,共青团员占 0.37%,调研主要对象为民主党派成员。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涵丰富的传统文化基因

当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几千年传承发展的传统文化基因是其发展的历史依托和动力源泉。它所蕴涵的丰富民族文化精神可在激发当代新型政党制度潜能方面发挥巨大的价值优势。

(一)传统“和合文化”是新型政党制度凝心聚力的精神灵魂。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内涵丰富。一方面,强调“和谐统一”“大一统”“大同”等,注重集中性、主导性、一致性、合作性,弘扬礼节、弘扬报

“和合文化”的核心要义和首要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强调多样性、差异性、个性化,主张兼容并蓄“和合共生”。《国语·郑语》中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不同的事物之间实现和谐可以促进事物创造、创生,而强求一致则不利于事物发展和创新。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允许“多样”存在,主张对不同的意见和事物持宽容的态度,追求多样化的和谐。和合文化从本质上即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强调对立面之间包含差别性的统一,注重“贵和执中”“致中和”“兼容并蓄”“宁静致远”“忠恕宽容”等包容适当思想,内蕴着多样性物质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价值旨趣。这些思想精髓恰恰论证了多党合作制度长期共存、荣辱与共,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际间互相平等、尊重、合作,实现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历史必然性。当代多党合作正是基于“和合文化”而形成发展起来的,成为新型政党制度凝心聚力的精神灵魂。在问及“您认为古代‘和而不同’思想对政党制度的当代价值主要是”调查时,认为促进主体多样性发展的占 66.03%,促进求同存异的占 81.57%,促进民主协商的占 85.66%,这三项均超过 4/5,表明已为大多数人达成共识;认为促进自由随意活动的占 9.17%,表明有近 1/10 的极少数人存在思想误区,觉悟较低,有待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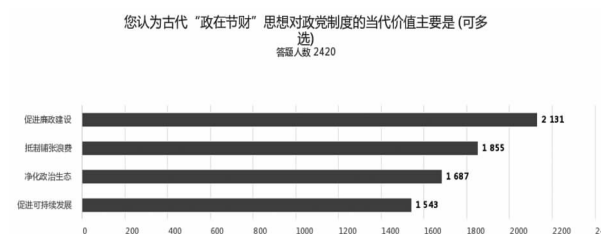


(二)传统民本思想是新型政党制度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传统民本思想是新型政党制度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民本思想是传统文化中注重社会主体力量的根本反映和文化主线。孟子提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指出了得民心、得其民、得天下的深层逻辑;战国时代孟轲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著名比喻,集中反映了争取民心的政治指向。汉唐时期,“民为邦本”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成为历代王朝的共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是因为党认识到人民是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保持先进性的根本所在。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到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思想的转变是协商民主在中国实现的价值支持,同时也成为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问及“您认为古代‘民为邦本’思想对政党制度的当代价值主要是”时,认为增强民众的民主权利的占 72.98%,推进民主协商的占 70.62%,增强为民服务的共识的占 86.78%,这三项均超过 3/4,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

(三)传统廉政文化是新型政党制度发挥政治功效的关键要素。春秋战国时期,齐景公问孔子如何为政,孔子回复:“为政在于节财。”“节用爱民”为主题的“政在节财”“政在得民”“政在去私”等思想,成为以往各个朝代政府推进政治清明的要略。不管是“廉能生威,廉能聚人,廉能聚心”,还是“从政以民为本,倡廉以慎为要”,抑或是“清正以德,廉洁在志”等,都指明政府官员廉政修养之德性。既有“勿以官小而不廉,勿以事小而不勤”的劝勉之语,又有“千里金堤溃于蚁穴,万恶腐败来自贪心”的警示之言,更有“处事要公,公生明;律己要廉,廉生威;待人要诚,诚生信;工作要勤,勤生效”等做人之道,均体现传统廉政文化的精髓要义和价值旨趣。显然,通过发挥各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作用,推进干部廉洁奉公、政府清正廉明是新时代新型政党制度题中应有之义。在“您认为古代‘政在节财’思想对政党制度的当代价值主要是”调查中,认为促进廉政建设的占 88.06%,抵制铺张浪费的占 76.65%,净化政治生态的占 69.71%,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占 63.76%,均占大多数,表明传统的廉政文化对当代新型政党制度建立、端正党政干部

作风仍具有重要意义。



(四)传统协商共治思想是提升新型政党制度实践价值的基本保证。传统协商共治强调统治集团内部协商能力与外部协商监管的统一。中国尧、舜时期的“禅让制”、两汉时期选拔人才的“察举制”、监察御史制度,唐朝谏官制度,都能在制度层面体现政治的协商共治、规范有序,注重提高制度设计和实施的民主性、规范性及执行力;中国传统所崇尚的仁政善治,其本质上蕴含协商共治的精神。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仁,崇尚“仁义”“礼乐”“仁者爱人”“仁政”“德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推崇“礼贤下士”“为政以德”“德主刑辅”“重义轻利”“崇德明法”“守信重义”等治理思想,注重以德服众、善待众生,在仁政基础上建立善治政府。仁的深层含义为相互尊重、体恤,相商、相容才可为“仁”,中国的“仁”的精神和理念经千年的积淀和光大,奠定了由实践仁治、仁政而达到善政的思想根脉。要实现仁治、仁政乃至仁政共治,必须坚持协商精神,“每有大事,必相咨访”“用人之言,若自己出”,以充分体现仁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这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仁政共治精神。

当问及“您认为古代‘协商共治’、‘崇德明法’思想对政党制度的当代价值主要是”时,认为促进仁政、建立善治型政府的占 74.42%,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占 69.63%,推进法治型政府的占 79.21%,促进干部提高政治素质的占 68.8%,促进协商共治的占 75.29%,均超过 2/3 以上,受到大多数人认可;认为可强化德治、弱化法治的占 14.67%,不足 1/7,虽强调德治的重要性,然在效果上不一定就弱化法治,而应推进德治法治并举,说

明尚需正确引导。

选项	回复人数 (单位: 人)	百分比 (单位: %)
促进仁政、建立善治型政府	1801	74.42
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1685	69.63
推进法治型政府	1917	79.21
促进干部提高政治素质	1665	68.8
促进协商共治	1822	75.29
可强化德治、弱化法治	355	14.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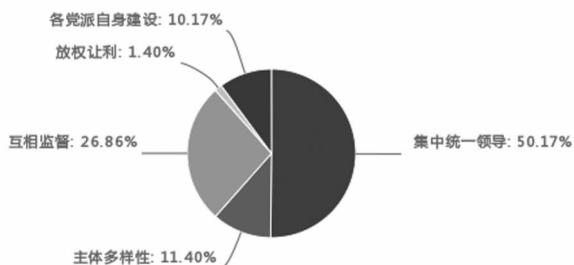
二、传统文化基因对完善新型政党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

传统文化基因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会与时俱进,不断得到新的滋养。需要我们在推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既善于吸取其养分,又赋予其新时代内涵,充分发挥其潜在价值和显性价值。综合许多民主党派人士的建议及调研数据分析,结合我们的认知体会,觉得近期欲进一步弘扬新型政党制度的传统文化基因,充分发挥其时代价值,应着力做好如下工作。

(一)秉承传统“大一统”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进国家统一。传统“大一统”思想在新时代意味着维护执政党的领导核心,集中力量办大事,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政权,对不同声音、不同力量、不同政见者要在道德容许的范围内加以包容、宽容,维护多样性统一。为此,要把落实“两个维护”作为根本政治任务,一方面,推进党对统一战线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多党合作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充分激发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的爱国主义热情,积极为维护各民族团结、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贡献智慧和力量。在问及“您认为在近期我国政党制度中最应加强的是”,认为是集中统一领导的占 50.17%,认为是主体多样性的占 11.4%,认为是互相监督的占 26.86%,认为是放权让利的占 1.4%,认为是各党派自身建设 10.17%,表明最应加强的是集中统一领导,其次,也要统筹兼顾互相监督,发挥主体多样性积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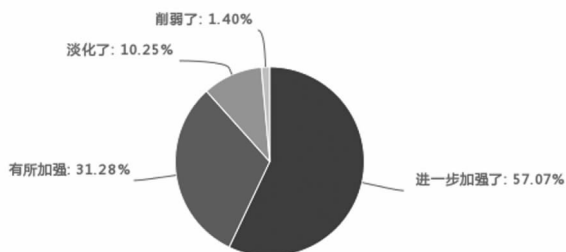
以及加强各党派自身建设。

您认为在近期我国政党制度中最应加强的是
答题人数 2420



(二)发扬传统“和衷共济”精神,进一步发挥政党合作文化对实现中国梦的凝心聚力功能。传统“和衷共济”思想在当代意味着同心同德、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共同追求理想。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实质内涵的中国梦,体现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价值旨趣,为此,需要进一步弘扬传统“和衷共济”精神,培育和增强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忧患意识、使命意识、风险意识、斗争意识,实行问题导向、实践导向与目标导向的统一,推进各民主党派和政治团体共同合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聚集各方力量,同甘共苦、齐心协力地共筑共圆中国梦,打造政党合作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在问及“您认为近年来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合作是”,认为进一步加强了的占 57.07%,有所加强的占 31.28%,二者相加达 88.35,表明得到广泛认同;认为淡化了的占 8.26%,太差的占 0.62%,亦表明尚有改善的空间,需要进一步完善机制和提高合作水平。

您认为近年来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合作是
答题人数 2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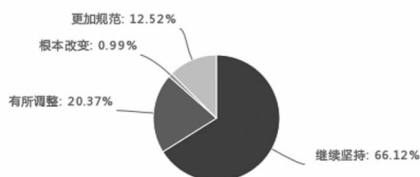
(三)推进传统“和而不同”文化,进一步发挥各参政党和知识分子特长。传统“和而不同”思想在当代意味着承认差别性、尊重多样性、培育和发挥个性特长。应进一步完善协商民主制度,以维护和激发民主党派主体能动性为中心,加大平台建设投入,进一步发挥其协商、参与、合作、监督、智囊等作用。按照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性原则以及求同存异原则,推进文化多样性繁荣,鼓励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组织在不违背国家宪法法律前提下,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繁荣文艺事业。同时,着力调动民主党派成员民主和科学的积极性,构建建言献策的激励机制,推进广大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协作攻关和提出合理化建议,推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进步繁荣。

(四)把握传统“民本”要义,进一步鼓励各政治主体为民分忧。传统“民本”思想在当代意味着以人民为中心和发挥社会主体价值,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各政治主体权为民所谋、利为民所得,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奋斗宗旨,充分调动民众的主体能动性。应强化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指向,通过完善制度和法律,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民众的民主政治权利及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的参政议政权利;进一步维护和增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为民发声意识、为民谋利意识、服从大局意识、共谋大业意识和忧国忧民意识;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桥梁纽带作用,在界别群众中多做扶贫济困、解疑释惑、化解矛盾的工作,为在更高水平上改善民生,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贡献。

(五)掌握传统“仁政善治”方略,共建共商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传统“仁政善治”思想在当代意味着领导干部应注重用和平说服教育方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善于采纳下属和他人的意见,以德服众,加强人性化服务,提高公共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不断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我们应进一步推进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议行合一”,通过完善公共治理体系和民主监督体系、民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成员、政府机关及各社会组织协商共治、平等合作、交往交流的功能,并在社会福利和政治待遇上进一步推进公平分配。随着我国社会阶层发生新变化的情况,应当适当调整和规范政党制度建设,推进顶层设计和基层共治良性互动发展。应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制定缜密周到的实施计划,努力构建上下监管配合、左右联动协作的立体治理模式,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问及“您认为在我国新型社会阶层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新型政党制度应当是”,有 66.12% 的人认为可以继续坚持,有 20.37% 的人认为应有所调整,有 12.52% 的人认为应更加规范,这些均持善意,表明新型政党制度应随着我国新型社会阶层发生新变化的情况适当调整制度,进一步加以规范。

您认为在我国新型社会阶层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新型政党制度应当是
答题人数 2420



三、发挥传统文化基因对提升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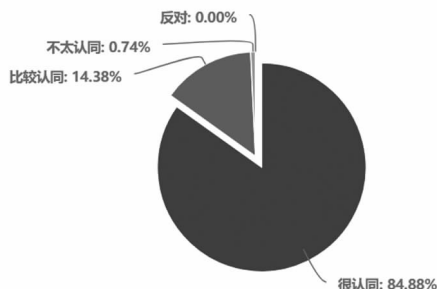
一定的话语体系是话语权建设的学理依据和生成逻辑,一定政治主体的话语权是对具有一定文化底蕴和政治立场的话语体系的实践运用。在新时代,基于中国深厚的文化根基以及新型政党制度实施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不仅需要切实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更需要在国际深度交往中发挥国际话语权的优势和张力。

(一)依据传统文化风格和意蕴全面深化新型

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内涵建设价值研究。第一,梳理新型政党制度传统文化话语体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秉承了传统哲学的深厚学养,严谨规范的话语逻辑,寓意深刻的用典和诗词歌赋,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习惯,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华民国、新中国政权的矛盾性质和历史任务不一样,所用的话语表达方式也不一样,但中华民族文明谱系、文脉及知识分子的特质没有改变,应进一步发掘和提炼新型政党制度的传统文化基因,把握传统文化话语体系的历史逻辑与时代特征。第二,完善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成功领导,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已形成相异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需要进一步总结、提炼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第三,丰富多党合作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听意见、敢听意见特别是勇于接受批评、改进工作,是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当代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已结成牢固的爱国统一战线,积累了政党合作、协商民主、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等许多方面的经验,显示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新成效,已得到中国各界人士的共认,应根据新时代发展要求,充实内容,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进一步完善多党合作话语体系。第四,构建现代新型政党制度整体话语体系。应适应新时代更加复杂的形势和更高的使命,需要将话语体系的建构与批判、战略与策略、统管与分治、坚持与改善等功能相结合,全面完整地打造体现文化底蕴深厚的文明风格、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大国大党的优势气派的新型政党制度整体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是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集中体现。在网络问卷调查中,在问及“您是否认同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时,回答很认同和比较认同的分别占 84.88%、14.38%,二者相加达 99.26%,得到普遍认同;仅有 18 人回答不太认同,占 0.74%,无人反对。

您是否认同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
与共”的方针

答题人数 2420



(二)依据传统世界大同思想及中华文明优势大力提升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价值。第一,提升传统大同世界思想资源的国际价值。中国古代即推崇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近代以来康有为著《大同书》,进一步阐发大同社会理想模式,孙中山先生强调“共产主义即大同”,毛泽东等革命领导者在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大同发展模式,在求同存异的全球视野中倡导世界大同。共产党及我国民主党派均共同追求天下大同的目标,应提升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国际价值,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立足本国又放眼世界,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用中国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好声音。第二,总结和传播中国多党合作及国际政党协作交往的经验。中国的政党关系,既不同于西方的多党竞争,也不同于前苏联及当下一些国家的一党专政,而是采用了多党合作制,具有决策效率高、易于形成统一意志、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功效;共产党长期与国际政党及其它国际组织协商交往,开展和平外交,维护世界共同利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并向国际推广。第三,突破西方自由主义话语霸权限制。应依据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同西方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作斗争,揭露西方多党制、西方民主和“普世价值”的虚伪性及其实质,重构公平正义的世界治理新秩序。第四,继续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张力。为了通向人类更美好的未来,有效克服全球日益增多的治理难题,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先进政党之间的政治协商与合作交往,进一步发挥中国共产党及民主党派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中建言献策作用,为推进全球治理和共同发展继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不断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影响力、感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责任编辑:鲍跃华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执政党的建设

高 静 宋凌晨

摘 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密不可分。党自身的建设和成长,始终对国家的建设和成长起着举足轻重的引领作用。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党面临着进一步自我提高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政府、市场、社会、法治四位一体的组成,决定了要处理党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党与政府及市场的关系、党与社会的关系、党与法治的关系。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执政党的建设;转型理论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1-00030-06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政党模式,是由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经济基础发生质变,决定着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在发展过程中寻求自身理论与实践的突破。面对世界格局日新

月异的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走出“格瓦拉困境”后,正在探索如何保持共产主义政党的生命力,增强执政能力,以适应当代世界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创新,立足党的建设,努力健全党的机制和制度,不忘初心,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又把党的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心。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党要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必须全面推进党

收稿日期:2019-12-27

作者简介:高静,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导,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政党理论、公共管理研究。宋凌晨,女,湖南科技学院教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工程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下的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研究”(16ZZD039)阶段成果。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九大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面临着长期而复杂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其中,如何应对来自市场经济的考验,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因为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而言,公对私无处不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往来的各个环节都可能因信息不公开、过度干预等原因,产生暗箱操作、寻租创租等腐败行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列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客观上要求执政党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政府亦减少和防止对市场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公开透明、长效反腐,推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转型理论视野中的政党建设研究综述

在全球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下,加强党的建设不仅是提高自身执政能力的内在需求,也是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回应。对应经济社会转型,国外研究主要基于政治学的政党调适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转型理论,国内研究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对西方理论的回应中,结合宏观背景与微观问题进行多元叙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其一,基于政党理论的研究。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主体身份,探讨其在中国乃至国际背景中的自身建设。此类研究可依学者身份背景分为两类。

一类是国外长期关注中国政党与政治问题的专家或研究机构,他们往往基于国际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治背景分析中国共产党对外界变化的应对措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约翰斯顿与罗斯主编的《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集纳各国学者探讨不同国家和世界性

组织对华接触政策和策略的相关论文,从侧面回应了国际视角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转型的看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戈尔对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内外执政环境进行分析,阐释中国共产党在转型中对改革开放后市场化的多层次回应。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理论的代表之作,他强调经济转型的实现离不开政治上的政策主导,分析中国在转型中政治变革与经济整合的整合。与这种主动进行管控的执政方式相对,沈大伟关注到中国共产党在某些领域实行一系列“收缩”措施,旨在提升执政能力,以适应国内外新的变化。杜赞奇强调政治制度的完善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性,以及此间政权扩张与瓦解并行的状态。这与沈大伟收缩与调适的描述有异曲同工之处。

另一类是具有海外背景的中国学者,他们因与中国的渊源,又身处非体制内的环境,得以借局外人身份的优势,把发生在中国的系列转型作为其理论的实验室。郑永年作为较早理论化地提出中国模式的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政治与经济交融的宏观视角。其《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整合自己历年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以纵向的中国历史演变为经,以横向的国内外比较为纬,把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置于中国乃至全球的图谱中,以新中国成立后经济转型与融入全球市场为双重牵引动力,构成中国模式总体转型的合力,由此总结出党由革命党向行政党再到用政治方法治党的两次转型。丁学良的《辩论中国模式》用政治经济学方法来定位与构建“中国模式”,把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作为中国模式的三个子系统,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于以列宁主义为核心的政党,是在内外交困的现状中努力维持并改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的控制系统。这类学者的结论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创新,及其在全球场景下积极向外界借鉴的自我认知与发展特点。

其二,基于政治经济学转型理论的视角。此类学者主要以中国共产党为例来佐证自己提出的政

党转型观点。转型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背景下的考察对象,转型难题集中表现为制度障碍造成的冲突,因而此类转型理论主要关注的是政治经济学对制度与非制度的讨论。

新制度经济学派开先河者科斯等人从制度变迁来考虑整个社会转型的动力,把政党归为推动制度创新的理性经济人之一。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对制度一词的定义中包含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层含义,且提出制度变迁有激进与渐进方式之分,但一般是渐进的而非不连续的,是缓慢的而非激烈的。就政治领域的非正式制度来说更是如此。福山在论述信任与制度的代表作《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提出“信任”这种非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乃至整个社会转型中动力。面对短期内难以建成的社会信任,以及在政党间不可移植的非正式制度,福山强调政府的力量的重要性,问题关键遂指向怎样生成力量。然而非制度因素并非全是积极的,因而有学者考虑到其固有的消极无力之处。科斯在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中提到中国的意识形态困境,并提出“思想市场”一说,认为中国历史上思想开放的传统不强是当前市场经济的内在问题,原因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解读,但好在思想市场的开放程度与民主的非直接相关仍为中国思想发展提供了可能,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改革试错和纠偏的交替中前行。

(二)国内研究现状

就国内学者而言,中国本土尤其是体制内研究的特点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着重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相比的特点,旨在兼采众长,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学理分析与建议。相关研究关注时政问题,用学术理论来分析与服务改革。中国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的界定主要依据的是2002年十六大报告,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间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对自身转型问题的认识从社会主义改造为始,以改革开放为新的转折。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学界尤其关注中国共产党如

何保持与提高执政能力。

据此,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在多元的视角中细化。有的学者采用从时间纵向上的梳理方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社会转型的地位加以确认,具有代表性的是庄福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成果的总结,他认为,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阶段为应对不同的现实需求实现了一系列理论与方针政策的重大的转型。俞可平通过回顾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期间的治理方式变革,把社会经济变量与政治发展逻辑作为影响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主要变量之一,总结出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并展望未来治理的目标。杨凤城对建党以来文化转型予以关注,分析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政治关系理论指导下的党的文化建设方针。李春峰着眼于中国共产党的调适性,梳理改革开放后,海外学者在中国共产党体制持久性的问题意识下对中共调适现象的分析。还有学者以政治学视角进行研究,如林尚立从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出发,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国家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不可分割的关系,论证两者的统一性。此外,全面从严治党、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领导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引领经济“新常态”等,都是十八大以后学界理论关注的热点。

(三)研究方向分析

从宏观的全球政治背景来看,政党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议题,因而把政党建设纳入现代性的视域,在学术研究中愈发常见。对现代性政党集体运作的本质揭示,有奥尔森的代表之作《集体行动的逻辑》,该书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集体成员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交给组织,以期由组织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如赫西曼所言,面对国家这一最大的组织,公民无从进行选择,只得反抗,所以改革势在必行。随时代变迁,当代国外学者对政党现代性问题有了新的言说方式。从哈特与奈格里的“帝国”,到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可见政党在现代化转型的激流中超越线性的演进方式。

哈特与奈格里把危机作为现代性的特质之一,认为现代政党也组成危机来源的一部分。西方谈及“政党现代化”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将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放在同一层面探讨,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实质也是现代性在政党上的体现。

在我国,学界的理论研究依据须回溯马克思原典。对比国内外学者讨论,重大分歧就在于是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相契合,抑或是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当多数学者默认经济与政治在转型中并非二元分立的关系时,如何进一步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研究的理论分殊点。重视制度在转型中的作用,这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相通之处。理论建构上,新制度学派中的制度因素可对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上层建筑,政治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而信任等非制度因素则可视作思想上层建筑。但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来看,新制度学派的理论或强调非正式制度等观点,难免有夸大制度因素之嫌,将理性经济人的分析施加于中国共产党的做法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质属性,更暴露出用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可能会存在水土不服的顽疾。亨廷顿1981年出版的政治学著作《失衡的承诺》,就明确指出美国模式在应用于其他社会的局限性。实际上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在研究中应注意本国的独特性乃至理论用于实践时的排他性。对于中国模式等议题的争论,不仅关涉理论分殊问题,更关涉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中如何确立起自身的话语体系。

以上国内外学者宏观与微观并重的叙述,表明政党建设在制度层面存在规律性,同时也隐含不确定性和未知性。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其中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理论探索,实现了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据此,学界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宏大视野,结合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转型理

论为基础,以微观问题为导向,拓展跨学科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为党的建设明确了新时代与新矛盾两个重大论断,相应的是新发展理念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具体要求,由此引发了理论界的积极探讨。学者们从多维度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征与影响,也相应指出由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对以此思想为指导的内政外交等各领域前景作出乐观预计,主要分为阐释理论和运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这两大思路。如唐任伍的《关于“新时代”的十大创新》,梳理概括新时代战略目标的变化等十个方面具有的创新。张占斌的《正确认识中国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从新的社会矛盾的特点出发,分析新特点之于社会建设、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更多学者结合思想内容分析党建、经济等现实问题,如乔榛的《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思想的理论贡献》,着重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庄德水的《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的战略部署》则依照新时代总要求来探讨当下党的建设与未来发展趋向等问题。综上所述,着眼于国家经济建设,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党的建设结合起来,是党建理论研究的切入点与创新点。

三、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执政党的建设关系

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和成长,始终对国家的建设和成长起着举足轻重的引领作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进一步自我提高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位一体的组成即市场、政府、社会、法治间关系,决定了要处理党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党与政府及市场的关系、党与社会的关系、党与法治的关系。

(一)党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

当代中国,政党与国家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政党不但其职能而且其组织形态,逐渐与国家机器同构。^[2]党的组织与政府组织结构趋同,政党成为国家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居于核心领导地位,其动员和协调职能与国家机制相融合,并通过

设立各工作领导小组和综合性委员会等机构进行国家权力分工。在此背景下,政党内部决议亦上升为国家文件并得以贯彻落实。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为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依据,且内容比后者更为全面,影响也更为深远。党的十九大报告及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是国家发展和政府工作的行动指南。从制度结构上看,中央委员会就国家大事进行政治决策,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上升为国家法律和国家政策。显然,政党已经承担相当部分国家功能,也与国家运行逻辑相吻合。^[3]正如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党政关系既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重要关系,又是党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关系,党政关系规范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长期的国家治理过程中,我们曾遇到过党政关系不顺带来的困惑和矛盾。实践证明,党政关系规范化的关键是党领导下的党政分工。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和最本质特征,明确这一点是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前提。正如邓小平所说:“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放弃这一条,但是党要善于领导。”党政关系中首先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其次才是各有分工。王岐山也指出:“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4]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分工即由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加强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而政府是党执政的重要载体,服从于同级党委领导,并在政令实施过程中贯彻落实党的政治主张。由此,党政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不

是“党政分开”,而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党政分工。

(二)党与政府及市场的关系

经过改革实践,中国市场化已达到较高程度,但还没达到新的制度均衡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党、政府、市场之间利益和权力上的非均衡,三者之间互动模式的不健全。党是制度变革与制度均衡的决策者,党与政府、市场关系是约束、激励和制衡的关系。^[5]事实是经济体制虽然得到较彻底变革,但执政党、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并没有同时发生,即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发展非均衡,由于后者欠缺主动性和能动性,出现了经济改革倒逼政治制度改革的现象。既然党实际上是制度变革与制度均衡的决策者,就应积极谋求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均衡发展,防止因两者改革脱节而造成某些风险。这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集权推动市场体制的形成,国家调控保障市场的有序运行。由于国家集权基于党的执政,意味着执政党须通过主动应对,对市场风险进行防范控制,对市场的优化调整予以引导。如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其中风险防控是第一位的。而后 2018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相应指出: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要分别提出工作思路和具体举措,排出时间表、路线图、优先序,确保风险隐患得到有效控制,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三)党与社会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过程中,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引发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此时,社会新问题、新矛盾集中凸显,要求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体制,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例如面对村级民主选举、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壮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增长等现实挑战,中国共产党应采取吸纳、渗透等调适策略,^[6]以回应社会力量对政党建设的新要求,并重新进行政治定位,进而推动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管理模式

式的调整。在党与社会的关系上,需高度重视社会自治对完善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毛泽东论述群众路线时,强调要鼓励人民的自治团体,让普通人民参与政治生活。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工会等群众政治组织的政治协商,通过制度性改革,促进并保障普通公民和劳动者通过不同方式,参与政治进程,不但有利于公民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且也有利于健康公共生活形成,这是政治改革的一大核心问题。^[7]另一方面,在当前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形势下,要加强党对社会的领导,通过它所追求和倡导的人类崇高理想的吸引力,它的纲领路线所体现的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引导力,它的党员为人民牺牲的精神感召力,来实现党对社会生活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组织领导。

(四)党与法治的关系

如果说经济体制的转变已基本完成,那么,依据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原理,并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加强法治建设,执政党亦须相应改变权力运行方式,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中国现代化治理体制建构的核心问题是使党的领导与法治由相容走向相融,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进程。法治成为党领导人民治国基本方略和主要方式,标志着社会主义政治走向成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如何正确认识党和法的关系问题,在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上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显著优势之一,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具体体现为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其中,首要的是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反映人民意志,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党的政策是国

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法、执法和司法的重要依据。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国法治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的最大区别。所以说,“党大还是法大”是政治陷阱,是个伪命题。

四、结语

按照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的治理经历权力型、管理型和服务型三种模式,“治理依托服务,以服务实现治理”成为现代治理体系的最基本的精神和原则。^[8]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与实践价值。当下要强化服务,防止管理模式下面片面追求政治绩效而出现的脱离群众现象。一方面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在基层党员干部中强化服务意识,将“领导就是服务”落到实处。另一方面从制度上重点构建党的群众服务工作机制,其制度机能主要包括:党员走访调研,信息整合,信息参考,政策落实,信息反馈。^[9]长期以来党的建设实践证明,构建党的群众服务工作机制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与执政地位的重要方式。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82-83.
- [2] 汪晖.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机与“后政党的政治”[J].文化纵横,2013(1).
- [3] 汪晖.中国政治新趋势[J].南风窗,2014(2).
- [4] “王岐山谈党政关系:只有党政分工 没有党政分开”[N].2017-03-07,人民论坛网.
- [5] 咸台灵.中国政党政府与市场[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1.
- [6] 景跃进.转型、吸纳和渗透——挑战环境下执政党组织技术的嬗变及其问题[J].中国非营利评论,2011(1).
- [7] 汪晖.中国政治新趋势[J].南风窗,2014(2).
- [8] 彭穗宁.建设服务型政党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J].政党研究,2014(4).
- [9] 张振等.社会治理视域下党的角色定位研究[J].理论探讨,2016(3).

责任编辑:王天海

浅议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方法

强亦忠 许 红

摘 要:本文首先论述了协商民主方法的含义、重要性及当前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方法研究的现状,指出方法研究是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短板,亟待改进。其次,归纳总结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蕴含的协商民主的要素,即广泛参与,代表性强;平等交流,态度真诚;公开透明,信息通达;包容性强,讨论深入;程序合理,讲究实效。本文重点讨论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六个方面的重要方法:一是协商的程序;二是协商议题的提出和确定;三是调研方法;四是协商会议的开法;五是形成协商成果报告的方法;六是落实协商成果的方法。

关键词: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方法

中图分类号:D6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1-00036-05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把推动人民政协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作为新时代的新方位新使命。汪洋主席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闭幕式上也特别强调,要崇尚创新、勇于创新,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推动政协协商民主制度程序化和运行方式的完善,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都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本文着重从协商民主的方法层面,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发展和完善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协商民主方法的重要性

所谓方法,就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所采用的工具、手段、途径和方式。方法很重要,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史表明,文明的发生和演进,主要靠

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主要靠人类的实践经验、科学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经验和知识所创造的方法。经验和知识一旦转化、上升为方法,就会具有更为强大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成为一切实践活动的推动力和一切发明创造的工具与“杠杆”,以及将理想变为现实的“桥梁”。^[1]因此,历代的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都十分重视方法的研究和运用。毛泽东同志早在1934年一篇文章中就曾强调方法的重要性:“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只是瞎说一顿。”^[2]习近平总书记近来也多次强调方法的问题,他在针对新形势下如何加强统战工作时就曾特别强调方法,并指出: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因此,我们在加强人

收稿日期:2019-09-06

作者简介:强亦忠,苏州大学教授,民进会员;许红,民进苏州市委组织处处长。

民政协工作、发展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方法。

所谓协商民主的方法,是指协商民主运作过程中所使用的技术、工具、制度、方案、程序等。就目前我国协商民主发展态势,包括理论研究、经验总结和方法研究三个方面,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交织、缺一不可的。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协商民主逐渐兴起,引起我国学界的关注以来,从事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的学者不少,成果也多,但从事方法研究的却很少,成果更是罕见。协商民主方法的研究是当前我国协商民主研究领域的短板,即便是很少见的方法学研究成果也鲜见应用于协商民主的实践之中,这是我国政治学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而政协理论研究由于受“二线思维定势”的影响,长期处于边缘化,其方法学研究落后的状况尤甚,亟待改变。^[3]然而,只有使用正确的方法,协商民主的理论才能得以实现,否则就容易陷入空洞;协商民主的理想才能得到落实,否则就会流于形式;协商民主的实践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否则就会流于粗陋。因此,当前发展协商民主的一个关键就是要高度重视方法,努力创新方法,使之尽快地得以丰富和完善。

二、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定纲建国的创举在方法学上的启示

从国家政治制度层面上来看,1949年召开第一届政协会议时,尽管还没有明确提出“协商民主”这个政治术语,但这次会议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和其他著名爱国人士开创了具有协商民主本质内涵的民主政治范式。尽管有许多中外政治学家认为,那次会议属于“民主协商”范畴,还不是现代意义的“协商民主”,但他们也都承认,那次会议已包含了许多协商民主的要素。^[4]因此,我们称那次会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肇始,是名副其实、无可争辩的。由于没有先例,这次会议的很多做法都是在摸索中创造的,实属不易,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财富。下面就围绕协商民主的方法,讨论其值得借鉴之处。

(一)广泛参与,代表性强

广泛性、代表性是协商民主的基础,而第一届政协会议就做到了这一点。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其中第五条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热烈响应,纷纷表示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赞成共产党的主张,并积极响应和主动参与,并对这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事项都坦诚地发表了意见。在当时解放战争还在紧张进行,全国尚未统一,交通与通讯阻隔,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等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党中央想尽办法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社会贤达取得联系,秘密地将他们分批从国统区护送到解放区。经过反复协商讨论,最终确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45个,代表662名,其中有党派代表,解放区和待解放区代表,军队代表,人民团体代表(包括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学生、工商界、科技界、教育界、新闻界、自由职业界、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宗教界等)^[5],其代表性之广,从当时的情况下看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诚恳、广大参与者的热情造就的民主政治的新局面,它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团结。这也为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进而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平等交流,态度真诚

平等交流,这是协商民主的真谛,而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即将彻底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名副其实的缔造者,但她完全抛开了胜利者的姿态,以真诚、谦恭的态度,诚邀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界人士共商国是,这就为政治协商会议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强调:“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坦白地商量

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7]中共中央还就怎样对待民主人士发出指示：“以坦白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中共的政策和主张，与之协商一切重大问题，以争取他们与中共一道前进。”^[8]例如，中共中央在提出党派及团体参加新政协的名单时就明确表示：这个名单只是中共的希望，是完全可协商讨论，进行增减和改动。^[9]在平等尊重的氛围下，民主人士也就坦诚直率地发表意见，如提出增加“上海人民团结联合会”，将“无党派民主人士”单列一个单位以及将“平津教授”、“南洋华侨民主人士”改为“全国教授”、“海外华侨民主人士”等意见，后均被采纳。^[10]

（三）公开透明，信息通达

公开透明、信息通达是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也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特征。在 1948 年至 1949 年这样一个特别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却努力做到了这一点。中共中央把自己的主张和意见通过电报或地下党组织尽量地告知各民主党派和其他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征求他们的意见。中共中央还在 1949 年 1 月 22 日发出“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对政策问题，均予以正面回答，不加回避。除党的秘密和某些策略外，一切可以公开谈的都可以谈。对政策实行的情况，亦应据实相告。同时请他们充分发表并提出批评和意见。”^[11]党中央还组织各种报告会，介绍解放区的政权、土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举办各种座谈会，交流信息，交换意见；组织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观，了解情况；提供他们“党的公开文件和材料”，“解放区的各种法令、条例、指示、决议、章程、大纲以及各种政策文件，以备新政协参考使用。”^[12]

（四）包容性强，讨论深入

包容性是协商民主的最大特色，这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也体现得特别充分。一是体现在参会人员的最大包容性上。1948 年 5 月 1 日毛泽东致李济深、沈钧儒的电文中就曾明确表示：“一切反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新政协。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

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该项会议。”^[13]中共中央在此后的电文中进一步表示：“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中间偏右者，乃至本来与反动派统治阶级有瓜葛，而现在仍可能拥护联合政府的人，以扩大统一战线。”^[14]二是体现在对待讨论中不同意见的包容性上。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对以“新民主主义作为今后建国最高指导原则的问题”上就出现了不同意见：有赞成的，也有主张用“革命的三民主义”、“人民民主主义”的，甚至有人提出就用“民主主义”，不必加“新”字的，但通过深入讨论甚至争论，最终大多数人还是赞成用“新民主主义”，^[15]由此可见一斑。实际上，当时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阶级基础和政治道路，需要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和法律来保障国家的繁荣富强和安定团结，也即要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建国纲领这样一个协商建国的头等大事，不同阶级阶层是有不同诉求的，它不仅涉及无产阶级和工农联盟的利益，也涉及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利益。由于中共中央贯彻了具有协商民主特征的工作方法，特别是包容性的原则，使各种难题和矛盾一一化解，找到最大的共识，完成了制定《共同纲领》的使命，被有些政治学家誉为政协历史上迄今为止完成过的最重要的成就。^[16]

（五）程序合理，讲究实效

程序化是协商民主的重要保障。正当的程序可确保协商民主的合法性，科学的程序可确保协商民主的科学性，合理的程序可确保协商民主的实效性。无论是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单位、代表名额及其代表名单的协商、制定《共同纲领》的协商，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和正式会议的召开，其程序虽无先例可供借鉴，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精诚合作、共同探索，使程序在探索中得以完善，使之科学合理，其结果十分完满。例如，对于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代表名额和代表名单的确定，就经历了反复协商的过程：先是中共提出筹备会的单位和人员名单，诚恳地征求各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

民主人士的意见;然后是筹建筹备会,经过充分协商讨论,对成立政协筹备会及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达成共同的协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参加单位和代表的组成范围和原则;在第一次筹备会议上,经协商一致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法条例》,并决定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六个小组,其中第一小组的任务就是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并在筹备会闭幕之前,就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的文件;然后才是具体名单的协商。由于经过这样严谨、慎重的协商程序,“的确可以说是代表性最完备的一张名单,的确可以说是表示了全国人民力量的大团结。”^[17]

三、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若干重要方法

(一)协商的程序

无论哪种形式的协商民主,其程序都应体现平等参与、多元包容、信息通达、讨论深入、共识充分、讲究实效等原则,由此可归纳出如下基本程序:(1)提出议题,公布议题,征询意见;(2)组建议题协商领导机构,确定议题,并制定协商实施计划;(3)精心选择协商会议的参与者;(4)提供协商议题有关信息和资料给参与者阅读;(5)就有关议题组织调研;(6)确定协商会议议程和主持人;(7)召开协商会议;(8)撰写协商会议成果报告;(9)将成果报告报送有关部门;(10)有关部门对报告进行处理,并将结果进行反馈;(11)对反馈意见作出表态。可根据具体协商议题的不同性质、层次、规模、经费等情况,适当增删程序,但其中核心程序不可变动。

(二)协商议题的提出和确定

人民政协协商议题有两种类型:一是由党政领导部门提出议题,与政协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进行协商;二是政协内部提出议题,与党政领导有关部门进行协商或政协内部协商。对于前者,《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提出了需在决策之前和执行过程中的10项重大决策项目,并规定在年初作出协商计划向政协通报,已经比较规范化和程序化了。只是何谓“重大决策”尚

不够明确具体,有待进一步细化,^[18]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至于政协内部如何提出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考虑:一是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关注民生提出议题;二是从公众普遍关心、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选题;三是议题应从群众中来,多倾听群众的呼声,收集社情民意,有意识地通过网络、广大政协委员所联系的群众或直接面向社会征集议题;四是通过召开座谈会,议政沙龙等形式精选议题;五是利用政协专委会和不同界别对口联系的党政部门选择合适的对口协商议题。待议题提出出来后,再经政协主席会议或秘书长联席会议来最后审议并确定议题。

(三)调研的方法

围绕议题开展调研,这是保证协商质量的重要环节。一是调研之前要充分做好策划和准备工作,拟订详细的调研提纲和实施方案;二是慎重选择调查的具体形式。调查形式有普查、抽查、典型案例调查和个案调查等四种形式,需要根据议题的性质与需要来确定,并按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对象(样本)的选择;三是要亲自到现场实地调查,亲自与调查对象接触、交谈,掌握第一手资料;四是如果要开调研座谈会,则要事先慎重选择参加座谈的人员,务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并让他们能充分发表意见,讲出真情实话。如果要进行问卷调查,则事先要精心设计问卷,科学地选择问卷调查的对象,以保证问卷结果的真实可靠;五是要充分利用第二手资料即间接资料,如报刊文献资料,互联网资料等,以弥补第一手资料的不足。六是对收集到的有关情况和信息资料进行认真研究,最大限度地从中挖掘对协商有参考价值的内容。

(四)协商会议的开法

一是按事先拟定的程序和确定的参会人员召开协商会议;二是应尽量保证涉及协商议题的双方(党政领导部门和政协有关代表)均到会,面对面地进行协商。政协方面应尽量吸纳专业对口的委员参会,还可适当邀请社会上的有关资深专家参会,以保证协商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但为了避免政协“精英民主”的弊端,可采取三方面的举措:一

方面应尽量将调研过程中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在协商会上得到充分反映,另一方面也可以适当吸收群众代表参加协商会议。此外,还可将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社会协商相结合;三是应尽量让参会人员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是不同的意见,开展讨论乃至争论,以便更好地达成共识。为了能让参会者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参会人员较多的协商会,可分小组讨论和大会协商两个阶段。如前不久全国政协召开的“创新驱动发展”专题协商会,参会者达257位委员之多,为此分了小组会和大会两种形式。这样就有近百名两院院士委员参会,其中有79位院士委员分别在大会或分组会上作了发言,形成“百名院士委员议创新”的生动局面,使界别优势、专业性和院士的影响力得到充分展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四是如有可能,可采用公开协商的形式,特别是对于涉及公共政策、群众利益的议题,更应加强协商的公开程度。公开协商可增加群众广泛关注和参与的力量,公众和舆论监督的力量,增强协商主体双方的责任心,有利于提升协商的质量。五是可适当利用互联网和多媒体,开展网上协商和远程协商,以提高协商的效率,降低成本。全国政协和不少地方政协都做了尝试,值得推广。

(五)形成协商成果报告的方法

撰写成果报告不是简单将协商会议上大家的发言和讨论进行汇总,而是要在大家发言、讨论乃至争论的基础上,进行提炼加工,即有一个复杂的运思过程,以高质量地形成资政建言的文本。一方面要认真梳理会议记录和其他材料,从中凝聚共识、提炼观点、形成建议;另一方面要推敲文字,反复修改,精益求精,使最终的成果报告文本具有很强的思辨性、逻辑性和自洽性,有一种说服人、打动人的力量,令人信服。此外,报告也要恰当地反映不同的意见,以供党政领导部门决策时参考。

(六)落实协商成果的方法

协商民主不能止步于写出协商成果报告递交党政有关部门,还必须关注协商成果是否转化为党政有关部门的决策或改进工作的举措,取得实

际成效。要抓好以下三个环节:一是协商成果报告递交环节。在递交时,不是简单地递送报告,而是要与党政有关办理部门充分交流,使他们能进一步了解此议题协商的初衷、重要性和可行性,增加其对议题的了解和对办理的重视程度;二是协商办理环节。要重申协商成果中未被采纳的有关建议和意见的理由,力争被重新采纳;三是协商成果办理结果反馈环节。要实事求是地评估办理的结果,特别是对不被采纳的意见和建议,要重新进行分析和审视,如果仍认为是正确的,要申诉,要坚持,不轻言放弃,这是对协商成果的负责和尊重。现在很多省市都出台协商办理和反馈的具体制度和措施,设置了对需要协商的内容提交决策的先决条件及协商成果办理的时限,并把党政领导部门是否重视协商民主作为考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以上如能加以推广和落实,必将大大推动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李志广主编.方法论全书(Ⅲ).方法论原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1.
- [2][7] 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25、1327.
- [3] 谈火生等.协商民主的技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
- [4] 李昌鉴.政治协商规程制定与人民政协软法实践[J].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0(4):12-19.
- [5][16][18] 谈火生等.协商民主的技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22、135、119、51-114.
- [6][8][9][10][11][12][13][14][15][16][1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记事暨资料选编[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525-538、41、16、32、50、129、3-4、18、20、518、519.
- [19] 朱振中.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的探索与创新[J].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09(4):37-39.
- [20] 何包钢.协商民主:理论、方法和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85-133.
- [21] 强亦忠,许红.对参政党参政议政能力建设的思考[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4):46-51.

责任编辑:王天海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研究

——基于江苏的实证分析

江苏省委统战部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
联合课题组

摘要:“组织起来”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的历史回应,也是新时代壮大共同奋斗力量的现实选择,对于实现“中国之治”具有重要作用。报告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加强研判,厘清推进组织化的方向。同时,较为系统勾勒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的实现路径,为其工作的深入推进提供政策性参考。

关键词:组织化;时代价值;江苏实践;现实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20)01-00041-07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量涌现,这不仅直接催生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范畴、内容以及方式方法的转变,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着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和政策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有一个好办法,就是组织起来,要想法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必须积极探索“组织起来”的途径和方式,将“组织起来”的工作加以提升、整合,不断增强其系统性与有效性,实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的内涵应在于: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通过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元组织体系,充分吸纳、整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引导他们与党同心同

向同行,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课题组以江苏为实证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有效问卷 897 份)及实地考察、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问题开展深入调研,对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实现路径提出系统构想。

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的时代价值和重要意义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具有重要时代价值和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正处于关键转型期,社会阶层分化更加明显,利益结构更加复杂,党执政面临着多方面风险和挑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是党长期执政必须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力量。充分发挥各种组织平台的功能优势,实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高度组织化,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凝聚、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体现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最大的政治”。

(二)有利于实现社会多元利益整合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主体是体制外的“社会人”,流动性强、群体结构趋于离散,缺少有效的组织整合与保护,总体上处于低组织化状态,这致使该群体的利益或因彼此分散、冲突而难以实现,或因个体声音微弱而难以受到党委政府重视。通过发挥各类组织平台的整合协调服务功能,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碎片化的个体利益诉求聚合成群体利益诉求,并通过组织平台渠道,科学转化为公共利益诉求,进而有序输入到政策、法规制定过程中,从而实现社会多元利益的有效表达、整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三)有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格局

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多元主体间的价值冲突和公共服务需求呈现多样化。在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过程中,通过不同类型的组织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效聚合到自觉参与社会治理之中,能够推动多元社会主体之间发生“化学反应”,提升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促进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特别是通过整合社会力量和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公益性、志愿性服务,能有效增强社会发展弹性和调节能力,防止社会问题扩大化,促进国家良政善治。

(四)有利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随着经济、社会地位提升,政治参与意识逐渐增强。但由于其组织化程度较

低,政治参与渠道较少,由此容易产生失落感,导致其政治态度、政治行为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将他们吸纳、整合到各类组织之中,有利于为他们参与多形式的民主协商提供制度化、组织化渠道,使其政治参与由散落无序的自发行为转变为整体有序的自觉行为,提升政治参与获得感、效能感。

(五)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广泛分布在高科技、专业化、网络化等创新性领域,他们在文化创造、知识传播、科技创新及生产发展等方面具有优势,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有利于发挥他们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创新驱动中的集群智慧和力量,增强参与感、集体荣誉感、认同感,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六)有利于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方式及理念创新

随着社会结构和分工的深刻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大众化趋势不断增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多元多变。统一战线面临工作覆盖面与对象总量之间不平衡,引导热度不够;工作影响力与对象需求之间不平衡,工作效度不够;工作的高要求与能力水平之间不平衡,落实深度不够的问题,因此必须从思路、机制、举措等方面进行全面创新,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打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新局面。将统战思维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构想有机融合,将做好社会组织的统战工作与传统做好党外代表人士的统战工作有机融合,通过组织化方式,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更多社会中坚力量转化为统战力量,有利于扩大工作覆盖面、增强包容性、提升引领力,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创新和推进统一战线工作。

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的江苏初步实践

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近 500 万,代表性、成长性强,层次较高。近年来,全省统筹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也呈现出初步轮廓。

(一)加强通盘谋划,依托大统战推进组织化

江苏省委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列为省委常委会重点工作内容,纳入全面深化改革、党建考核重要内容,依托大统战格局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内外互通”的工作机制,省、市、县普遍建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在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方面打下了一定基础。一是实现省、市、县三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全覆盖,并通过实施“1+N”组织方式,层层建立由不同群体为主要对象的联谊会分会组织。积极推进园区、商务区、楼宇、社区联谊组织建设;二是实现重点对象全覆盖。面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重点领域、重点群体,利用大数据平台,拓宽选人用人视野,组建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人物库,省级层面已有860多人;三是实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实践创新基地全覆盖。把建立基地作为组织化的重要方式,通过强化组织领导、服务引导、品牌建设、责任落实、共建共享、总结推广,全面推进全省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实施了13个全国、28个省级、103个市级、366个县级实践创新项目,初步构建了覆盖全省、辐射各类群体的基地矩阵;四是加强跨地域、部门工作联动,集聚工作资源、放大组织化社会效应。省委统战部联合多部门、多地市共同成立“江苏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长江生态文明保护志愿服务联盟”,形成较强社会影响力。江苏昆山、太仓联合上海嘉定、浙江温州共同建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协同创新平台,交流探讨加强组织建设和推进友好合作。

(二)强化主体责任,确保组织化正确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江苏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融入大党建工作,着力发挥各级党组织主体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以“便于组织起来、便于开展活动、便于发挥作用”为目标,打造“结构上相互吻合、功能上相互支撑”的同心圆组织架构,以党建带统战、以统战促党建,在党建高速公路上跑好统战快车。

针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分布在两新组织

中这一实际情况,不断优化党组织设置模式,提升党组织覆盖率,积极建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基层联系点,确保“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哪里,党建工作就覆盖到哪里,统战工作就延伸到哪里”。依照地域相邻、行业相近、规模适当、便于管理的原则,推动楼宇、商圈、园区等领域成立联合党支部。南京市徐庄高新园区党工委、苏宁控股集团党委共同打造党建联盟机制,率先在民营企业党委中设立统战委员,把园区内530家企业,53个两新组织,近5万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紧密联系起来。

(三)突出政治引领,凝聚组织化内在共识

凝聚政治共识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的根本任务。一是扣紧时代脉搏,强化主题教育活动。省委统战部联合各市组织全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开展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活动,全网总点击量突破6亿;开展线上升旗暨社会服务嘉年华活动,极大激发了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二是加强服务帮助,促进思想认同。无锡市委统战部针对自由职业人员因学历、职称及工作成果评定受限这一问题,协调将其纳入“太湖人才计划”,有效激励引导。三是开展联谊交友,增进感情信任。通过登门拜访、座谈交流、举办沙龙等多种途径,扩大统一战线“朋友圈”。四是加强表彰激励,选树推介典型。推荐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为全国、省级“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候选人。大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获得“五一”劳动奖章、“五四”青年奖章、“巾帼建功先进个人”,达到宣传一个、影响一群、表彰一批、带动一片的示范效应。五是加强推荐安排,促进政治参与。探索建立代表人士评价体系,严格标准程序,推荐、安排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进入各级人大政协、人大以及青联、妇联、工会等群团组织,强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增强其组织归属感,发挥一根头发带动一把头发的作用。

(四)打造多元平台,形成组织化多轨并行

按照党中央“用好现有组织、创建工作载体”的要求,着力打造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

为牵引、社会组织为主体、自组织为补充的多元组织平台相互共生、并行发展体系。一是建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提供支持服务,解决“注册难、经费少”等现实问题;坚持开门办会,发挥联谊组织成员的辐射作用,以人带人、以人招人,扩大联系面;引导联谊组织加强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促进其自我学习、自我服务、自我提升。江苏省新联会建立健全议事规则、会长轮值等规章制度,明确多功能、综合性服务职能定位,积极搭建联谊交友、创新创业、社会服务平台,加强对基层联谊组织的指导和支持,不断增强凝聚力、动员力和社会影响力。二是重点依托社会组织,扩大工作覆盖面。通过盘活存量、扩大增量,将统战要素“嵌入”到社会组织发展之中,延伸工作手臂。无锡江阴市依托“香山书屋”这一社会组织平台,以“书”为媒,通过组织公益活动、开展培训交流等形式最大限度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团结起来。目前,该平台拥有志愿者超过 1.2 万人,开展志愿活动 1.4 万余次,累计服务时长超 18 万小时,成为城市文明的传播者。三是将自组织作为新的关注点和发力点,借力发力,探索将其打造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新平台。南京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实践创新基地“小红梅信仰生活空间”,通过优质服务和深度参与逐步培育,引进了以棠棣读书会为代表的 12 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自组织”,累计开展文化社群活动超过 110 场次,近 12000 人次参与。

(五)创新方式方法,增强组织化的内生动力

一是积极运用社会化方式,强化组织化社会支撑。积极整合和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自身资源优势,将统战对象变为统战力量,将社会资源变为统战资源。引导各地新联会会长、副会长、骨干成员等捐资出力,积极参与联谊组织及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带头开展社会服务和公益活动,同时相得益彰,提升自身社会影响和社会价值;二是坚持项目化推进,实现组织化合作共赢。以统战对象需求为导向,将统战目标转化为具体工作项目,通过授权委托、直接资助、政府购买、政策扶持等方式交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及相关社会组织承担,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促进人心凝聚。常州市创立“现代社会组织发展中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委托其对本市社会组织进行孵化和管理,将全市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纳入统战视野。宿迁市泗阳县实施网络统战项目外包,将“新时代泗阳同心说”及“同盾计划”统战品牌项目委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实施,产生了复合性正面社会效应;三是加强网络化服务引导,促进组织化线上线下融通。江苏积极探索推动“互联网+统战”,依托统战大数据云平台建设、统一战线“两微一端”矩阵建设,积极强化统一战线网络教育引导、价值输出、社会服务综合功能,加强线上线下工作结合,不断增强组织化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面临的现实挑战

当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结构的复杂性、异质性日趋明显,相关组织平台还处于成长期,总体上尚不健全完善,这些因素导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面临着多重挑战。

(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特征日益复杂,需要在组织化方面加强统筹整合

一方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边界趋于模糊。在保持流动速度加快、趋向个体化等特征的同时,由于网络赋权 and 多重参与,他们往往表现为多重身份相互叠加;另一方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内部结构圈层化明显。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其内部存在自组织化倾向和多样化特征。通过访谈了解,大多数受访者参与组织的首选因素是基于业缘、地缘和趣缘等,也有的是基于小众文化认同或是特殊意愿表达,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小圈子”,这些“小圈子”虽然内部关系密切,容易达成共识和集体行动,但也易形成新的社会阶层不同类群的圈层区隔。

上述群体特征客观上对传统统战工作分类引导、分类组织的工作思路提出了挑战,其自组织化过程中形成的圈层区隔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之间形成了相互拉扯、影响的结构性张力,如何加以统筹整合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面临的挑战之一。

(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各类组织的动机和诉求表达日益多元,需要在组织化方面加强共识凝聚

大多数调查对象对加入各类组织抱有明确的动机,一般以利他导向为主,兼有利己导向,更多聚焦在个人发展和社会参与层面,亲社会倾向明显,而在政治参与层面的动机相对较弱,只有少数调查对象参加组织是为了“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或者“得到政治安排”(见表1)。

表1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组织的动机调查

推动民主政治建设	8.1%
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18.9%
参与慈善公益	17.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11.8%
得到政治安排	5.8%
获取更大利益	10.3%
扩大社会交往空间	7.9%
提升自己的能力	17.9%
随机参与,没有目的	2.2%
合计	100%

新的社会阶层作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结构的重要部分,其整体的参与意识与批判意识都在不断增强。一方面,他们对党的执政成效和各类公共事务表现出公共关怀,愿意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进行公共利益诉求表达。另一方面,他们也比较注重自身利益诉求及获得,这种承担社会责任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内在张力,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过程中强化核心价值观引领和凝聚共识,形成了一定压力。

(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人均组织数量较少且呈现内卷化倾向,需要在组织化方面加强量质提升

个人所属的团体数目,也可能影响其政治能力,加入的组织数量越多,政治参与的机会相对增加,个人的参与能力也会随之提升。以社会组织为例,江苏省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量约为11.2个,远低于发达国家相应的50个。从调查来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数量增长呈现一定的“内卷化”

(即“没有质量的增长”)。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组织类型单一,以兴趣爱好类和公益慈善类居多,而生活互助类和权益维护类相对不足(见图1);组织功能简单,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爱好或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方式雷同,大都是文艺娱乐、捐款捐物、帮老扶幼等活动,而涉及到社会调查、产业发展、精准脱贫等方面的活动很少,影响力和辐射面有限。如何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促进社会组织的全面健康发展、活力提升、价值体现,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的重要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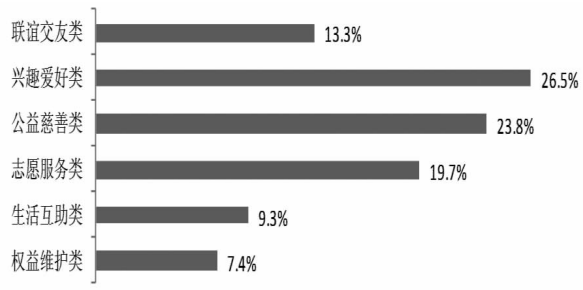


图1 加入社会组织的类型

(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新兴组织平台处于成长期,需要在组织化方面加强科学引导

表2 联谊组织发展面临的问题调查

注册登记难,缺少合法身份	7.8%
职能定位不清楚	6.6%
成员数量有限,人员不固定	13.9%
活动经费不足	20.2%
缺乏固定活动场所	15.9%
负责人能力有限	6.9%
活动数量比较少,形式单一	12.9%
主管部门支持力度不够	8.6%
缺乏信息交流与培训机会	7.2%
合计	100%

组织平台的发育程度是衡量组织化水平的重要方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是推进组织化的重要枢纽和依托,作为近年来形成的重要新兴组织平台,其自身建设亟待科学引导、系统强化。一是其总体上机制、结构、功能不强,自主性、活跃度不够,在成员发展、开展活动等方面对统战

部门存在依赖倾向。二是自身资源相对不足。最突出的问题是“活动经费不足”(占20.2%)(见表2)。当前联谊组织的活动经费来源渠道单一,主要依靠组织负责人捐助或者会员众筹。三是发展总体还不平衡。既体现在不同类型组织之间发展不平衡,也体现在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类群的联谊组织发展不平衡。

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的实现路径

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是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充分依托大统战工作格局,通过新平台、新载体、新方式的创新实践,构建线上线下相互协同,横向纵向相互交错的组织化网络,形成多轨并行、多措并举的组织化格局。一方面,要着力打造由党委领导、统战部门牵头,以党的各级组织为核心,辅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发挥政协和民主党派独特优势的组织化工作格局,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政治引领、核心价值观输入和政治吸纳;另一方面,要促进社会组织、自组织、社区组织共同构建主体性参与、社会化协同的组织化工作网络,调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双向共通共促共建共享共治的工作平台和渠道。

(一)突出党组织核心地位,强化组织化的政治引领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要立足“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以党建带统战”,以党的各级组织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的领导核心和组织依托。秉持“寓统战于服务”的理念,积极找准党的基层工作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自身成长的结合点,促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利益实现、个人成长、事业发展;要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创新、优化党组织设置形式与工作方式,明确统战联络员;发挥广大党员在新的社会阶层群体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吸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优秀人才加入党组织,增强其统战意识、工作能力,促其成为新的社会阶层各群体中的利益代表和价值表率。

(二)把握适度原则,发挥民主党派在组织化

方面的带动功能

根据民主党派各自界别特色,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工作嵌入到民主党派工作中。坚持代表性和进步性原则,探索健全完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综合评价工作机制,在此基础上,在大中城市适度吸纳知识层级高、社会影响力强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加入民主党派,促其积极政治参与;支持和鼓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党派成员在新联会组织中发挥骨干带动作用;发挥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亲善、灵活的统战联结机能和平台作用,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提供有力支撑。

(三)发挥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构建组织化的协同网络

群团组织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中具有组织联系和教育引导属性。要进一步依托群团组织的基层组织建设,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作为群团组织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扩大群团组织的实体覆盖面和工作覆盖面;要创新工作方式,促进群团组织成为广大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联系枢纽,将小而分散的组织整合起来,形成组织间的网状联系渠道;要充分强化群团组织的政治属性,提升其教育引导、价值输出的社会功能,促进群团组织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宣传引导工作;要推动群团组织主动联系、团结、吸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打造符合各自群体特色的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队伍,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提供合理化、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

(四)激发社会组织的创新活力,构筑组织化主体平台

改变传统统战工作单一依赖统战部门推动,工作主体与工作对象双向结合的组织化模式,将全域内各类社会资源整合起来,形成人人皆可参与、人人皆是主体的开放、多元合作局面。要以星级基地创建为抓手,积极支持、引导新联会及其分会组织,以实践创新基地为联谊交友、社会服务、创新创业等实体化功能辐射平台,依托基地的规范化、常态化、特色化建设,以“组织+平台+活动”的联动工作方式,发挥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

化方面的示范引领和重要依托作用;要重点关注和打造具有精英领袖的强影响力、枢纽型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慈善属性、线上线下全覆盖的社会组织,以及具有统战功能的孵化基地,通过统战工作的主动嫁接和粘连,将其转化为统战性社会组织,进而引导其一方面广泛联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并整合新的社会阶层自组织,另一方面向组织化程度更高的组织形式转化,发挥其在统一战线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动员、辐射、指导作用,在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化过程中的吸纳、整合作用;要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他们在提升专业化、职业化水平的同时,不断增强统战意识,在建设统战性社会组织方面作出积极贡献;以项目化和品牌化运作为核心,以多样化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专业优势,促进社会组织实现社会化、效能化、智慧化变革,促进多元治理的社会化参与;促进新的社会阶层群体内的强个体影响、强组织效应与新媒体力量产生叠加效应,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效能与弘扬主流文化、核心价值观形成同频共振,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格局更大、基础更牢、效能更强。

(五)挖掘自组织核心人物,拓展组织化辐射网络

实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自组织的有序发展,是促进其从自发组织化到自觉组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要充分利用自组织与新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天然亲和性,深度挖掘自组织所蕴含的人脉基础,发挥其相互联系、相互引导作用。以自组织的结构雏形为基础,发挥其内生凝聚力,通过激活统战功能,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由“被统战”向“要统战”转变,统战工作形式由“单一投入”变成“有效吸纳”,更好地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黏合”在一起。统战部门要加强对自组织中才能出众的“动员精英”的关注、吸纳和培养、锻炼,促其成长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标志性、枢纽型人物,通过他们以点带面,以个人魅力和社会威望影响带动更多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六)系统构建社区组织网络,延伸组织化工作手臂

要以统战思维和社会治理思维相结合,树立开放合作理念,健全社区统战机制,优化社区组织统战工作网络构建,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延伸“最后一公里”。以项目化、品牌化、社会化为工作思路,在社区联合打造统战组织孵化基地和公益创投项目,促进统战工作与社区组织专业服务相结合,集聚、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基层服务中的正能量;依托社区网格化治理新模式,探索建立社区统战新格局,促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组织由松散型转为紧密型,形成相互联系、覆盖全面、优势互补的基层网格化统战工作新局面,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提供强有力的基层支撑。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在党外、体制外,思想比较活跃,做他们的工作,一般化的方式不太管用”。新时代呼唤新作为,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迫切需要创新统战工作的思路、方式和举措。统一战线要充分发挥法宝优势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利益诉求、个人成长、事业发展作为组织化的内在要求,依托多元组织平台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服务引导和支持,不断增进他们的组织归属感、荣誉感、获得感;要系统构建充满活力、功能齐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体系,形成网络化、扁平化的社会组织网络,形成高密度、广覆盖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平台;要构建线上线下相互协同、横向纵向相互交错的组织化网络,并将之深度嵌入现有的社会治理结构之中,从而激发起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主人翁意识,凝聚起同心奋进的磅礴伟力,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

责任编辑:郭晓东

网络人士思想政治引领 与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

江苏省委统战部 南京师范大学联合课题组

摘 要:网络人士是新时代亟需团结和调动的“积极因素”,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借助网络人士智慧和力量,发挥他们自身特点和优势,以不同方式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核心在于加强对于网络人士的思想政治引领。只有通过对网络人士思想状况、心理动态、价值取向情况的调查研究,把握特点和规律,开展针对性强、精准度高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才能有效团结动员广大网络人士以思想的力量、行动的能力,成为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积极力量。

关键词:网络人士;政治引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1-00048-0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已经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从现状来看,当前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多重挑战:一是互联网普及带来网络思想的多元化,“自由化”“无政府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等多种有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潮在网上泛滥;二是“去中心化”的网络传播模式使得负面意识形态及言论的监管难上加难,政府部门对网络舆情把握与控制常常力不从心、反应迟缓,有时还会适得其反;三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语境过于晦涩,大多数网民不能有切身的体会与形象化的感观,从而很难坚决抵制各种不良思潮的侵蚀。

网络人士是在互联网上有影响力的人,其中

绝大部分是党外人士,主要分布在体制外,可以概括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联网为平台,从事经营管理、生产传播、技术研发、投融资等活动,具有舆论传播能力、内容生产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的人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继续前进,就必须增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不言而喻,网络人士是新时代亟需团结和调动的“积极因素”,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借助网络人士的智慧和力量,发挥他们自身特点和优势,以不同方式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那么如何让网络人士成为可“调动的积极因素”?核心在于加强对于网络人士的思想政治引领。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具方向性、全局性、先导性地

位。只有通过对网络人士思想状况、心理动态、价值取向情况的调查研究,把握特点和规律,开展针对性强、精准度高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才能有效团结动员广大网络人士以思想的力量、行动的能力,成为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积极力量。

一、研究设计

本课题以江苏地区网络人士作为调查对象。江苏拥有近5000万网民,是互联网大省、强省。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江苏在互联网产业发展上也体现出一定的示范性和先进性。因此,基于江苏网络人士的调研,可以为全国网络人士的统战工作提供具有价值的参考。

课题组于2019年6月-9月,先后对江苏省13个省辖市网络人士进行了走访和调研。根据江苏网络人士的分布特点,课题组采用配比抽样的方式,有的放矢地针对苏南(南京和无锡)、苏中(南通)和苏北(连云港、淮安)三个地区五座城市网络人士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751份,回收率为75.1%),访谈和座谈14人,并深入其工作生活的重点场景进行长期参与观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网络人士的基本认识与研判。

二、网络人士的群体画像:90后网生代、高学历网民、金字塔型收入结构、自由的党外人士、依赖网络却不信任网络、偏好社交型网络议政

“网络人士”是一个伴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新兴群体不断涌现、内涵不断扩大的群体。早期,网络人士主要以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人士两类群体为主。目前,网络人士则主要包括:新媒体等新闻资讯平台从业人员;社交生活、文化娱乐、网络技术、网络交易等互联网企业和平台从业人员;网络“大V”、个人网络“大号”、网络社群组织负责人、网络作家、网络主播、视频红人、职业电竞选手等网络名人;以及与网络密切相关的其他企业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

课题组通过对问卷和访谈数据的分析,发现网络人士在年龄结构、教育背景、经济状况、政治面貌、媒体使用等方面具有下列特征。

第一,年龄构成上,“90后”网生代是主力军。“29岁以下”年龄段的网络人士占比高达59.9%。在我国,“90后”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网络在他们身上留下鲜明的时代烙印,也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交流习惯。网络人士以网生代为主,决定了网络人士也将拥有敢于挑战现实、注重自我价值实现等“时代印记”。

第二,教育背景上,本科生为主,属于高学历网民。调查发现,网络人士本科学历占比为51.8%,硕士和博士学历的网络人士占比10.2%。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网络人士合计占比为62%,远高于中国网民的平均学历水平。这一数据表明,网络人士是中国网民中的文化精英人群。

第三,经济状况上,网络人士的收入分布呈金字塔结构,具有“收入越高、数量越少”的特点。问卷数据显示,72.5%的网络人士年收入为“10万元以下”,18.6%的网络人士年收入在“11-20万元”,仅8.8%的网络人士年收入在20万以上。不过,高收入的网络人士虽然是金字塔尖的小众群体,却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群体。

第四,政治面貌上,以党外人士为主。调查发现,41.1%的网络人士的政治面貌是群众,还有33%的网络人士是共青团员。网络人士是中共党员身份的,不足两成(18.5%)。其他民主党派成员身份的网络人士,占比也仅为7.4%。这一数据说明,网络人士比较追求自由,对于加入政治团体的兴趣不浓,在政治上寻求进步的主动性不强。

第五,媒体使用上,高度依赖网络媒体,却更信任传统媒体,有一定的网络参政议政偏好。网络人士在媒介使用上,体现出一种非常显著的矛盾性:他们高度依赖网络(均值为4.58),却对网络的信任程度最低(均值仅为3.06)。网络人士还体现出一定的网络参政议政偏好。具体来看,社交型网络议政是网络人士最为崇尚的政治参与方式:“通过网络与朋友谈论公共事件”均值最高,达3.05;“通过网络向朋友转发公共事件相关信息”均值排第二,为2.92。

三、网络人士的政治思想状况调查发现

(一)总体概况:差异化看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宏观政治认同与微观政治不满并行、参政议政的意愿和能力强

本课题将对网络人士的考察由“经度”和“维度”两个维度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现阶段我国主流价值取向的最大公约数,是凝聚共识、砥砺前行基础,它构成网络人士思想政治状况的“维度”。政治认同感和政治效能感作为政治行动的先导和动力,预测着网络人士的政治行为,构成网络人士思想政治状况的“经度”。

调查发现,网络人士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体表现出一种高度认同(均值为4.34),但对国家层面(均值4.27)、社会层面(均值4.20)和个人层面(均值4.54)的核心价值观,流露出一种显著的差异化看待。整体上,网络人士最认同“爱国”(4.63)、“友善”(4.53)和“敬业”(4.51)三种核心价值观,而对“公正”(4.14)、“民主”(4.16)和“平等”(4.17)三种核心价值观的认可度最低。这样的数据一方面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网络人士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网络人士的思想状况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本课题将网络人士的政治认同设计为制度认同、政党认同和执政认同三个连续变量。调查发现,网络人士的政党认同度最高(均值为4.70),说明他们高度认可党的执政地位;网络人士的制度认同度也比较高(均值为4.53),说明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自信。但网络人士对党执政能力的认可度不高(均值为3.89),他们尤其认为党在食品监管、保障性住房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执政能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政治效能感是个体认为其政治行为对整个政治过程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感觉或者信念,是个体参政议政意愿和能力的反映。调查发现,网络人士具有较高的政治效能感(均值为3.76),他们表现出很高的参政议政意愿,“我非常关心本地政府的各项政策”均值达3.98、“我对政治和公共事务很有兴趣”均值达3.88。同时,网络人士也很认可自我的参政议政能力,认为“包括我在内的每个公民

都可能对政府政策和行为产生影响(均值3.81)”、“我对目前需要政府政策来解决的问题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均值3.78),相信“我有能力对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均值3.61)。”

(二)网络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工作中需要注意问题

本次调查发现,网络人士思想政治状况整体良好。不过,网络人士作为一个来源广泛、新兴群体不断涌现的群体,在调查中也暴露出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具体如下:

1.新媒体等新闻资讯平台从业人员。该类群体中部分人士受西方思想影响比较深,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认识浅薄,存在追求过度自由化倾向。该类受访网络人士解释对民主的理解,就是一人一票的西方选举式民主。而他们表达对自由的追求,实质是在渴望一种不用负任何责任的消极自由。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在工作中,他们为获得经济利益,有时会做出有堵塞正能量、放纵反党反政府言论的行为。

2.网络大号、网络大V等自媒体网络人士。该类群体中部分人士存在表达不理性、主观片面性突出,习惯性质疑、对社会现象极端化、扭曲化解读等问题。该类受访网络人士对“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等持怀疑态度,他们习惯于将网上负面信息全部指向体制问题。这种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网络世界的高人气和现实世界的普通收入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带来他们仇富仇官等病态心理。

3.网络作家。该类群体中部分人士被资本挟裹控制,主动或被动创作各种娱乐化、庸俗化、低俗化和历史虚无主义等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网络作家是自由职业人员,他们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体,许多读者还是正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作为分散个体的网络作家人士,他们蕴藏着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而他们自述远离政治的创作背后实际存在着对主流意识形态侵蚀和冲击的隐患。

4.网络主播/视频红人。该类群体中部分人士

为了吸引眼球流量,泛娱乐化、无下限、无底线问题突出,有时甚至挑战法律“红线”。网络主播/视频红人,是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衍生出的新兴群体。这一群体虽然出现时间不长,但已经吸引了相当规模的用户。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截止2018年6月,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4.25亿,直播趋于普及和大众化。但网络主播/视频红人一直存在不断突破伦理道德底线,迎合网民审丑、娱乐、刺激、偷窥、臆想以及看客等心理的问题。针对网络直播平台传播淫秽色情信息非法牟利现象,2018年2月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对外曝光其中5起典型案例案情,以教育经营者、从业者,警示违法犯罪分子。

(三)网络人士思想引领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是覆盖面不足。在采访中,许多网络人士对统战部门的工作不熟悉、不了解。不少网络人士反映,他们对宣传部和公安部比较熟悉,与这两个部门打交道比较多,但是他们对于统战部不太熟悉,与统战部接触比较少。一些网络人士甚至表示,他们是通过访谈第一次了解统战部的工作内容。这一现象说明,目前网络人士的统战工作还存在很多空白点需要去覆盖。当然,网络人士数量多,规模庞大,类别广泛,对其的统战工作难以做到一一覆盖。因此,就需要统战部门抓重点,以点带面,首先做好网络人士中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引领,然后积极发挥代表人士的代表作用。

二是针对性不够。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目前网络人士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尚未能针对不同需求,做到区别分类、差异化实施、有的放矢地开展。网络人士是一个一致性和多样性并存的群体:“一致性”体现在他们都是网络空间中具有影响力的个体,他们工作生活离不开网络,他们通过网络实现各种利益,他们都希望互联网产业能够持续繁荣发展;“多样性”体现在网络人士从事和涉及的互联网行业领域非常广泛,由此导致他们在收入水平、社会地位、愿望诉求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未来对于网络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工作,需要加深对网络人士的了解,不能简单地强调一致性,用

传统思维去要求他们,而应当提高针对性,做到分类精准施策。

三是网络手段欠缺。在访谈中,网络人士普遍认为目前线上统战工作有待提升。网络人士指出,统战部门线下工作开展比较全面,如联谊会、培训班等等。但线上工作开展不是很多,虽然也开设了一些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却没有充分利用网络传播规律和手段,导致效果并不理想。有些网络人士甚至表示,他们线上和线下的思想和行为会有差异,即“线上线下两张皮”。线下由于有着比较完善的思想教育安排,他们在现实空间的发言活动,会自觉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在线上,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加之缺乏引导,他们的言论行为不够规范。未来统战部门要加强对网络人士网络精神家园的打造。

四、加强网络人士思想政治引领有关对策

(一)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扩大和提升工作覆盖面和针对性

针对当前网络人士统战工作覆盖面和针对性不够的情况,一方面,统战部门应当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收集网络人士各项网络数据,摸清网络人士底数,研判网络人士的发展成长规律、思想形成规律、网络活动规律等,建立网络人士基础信息库、重点人士库、专项研究知识库等。另一方面,统战部门也应当充分利用联席会议的制度优势,联动宣传部、公安部、工信部等部门,多渠道发现网络人士,追踪和关注网络人士中不断涌现的新兴群体。

(二)借鉴互联网思维和工作方式

针对当前统战工作手段不够网络化的情况,统战部门开展网络人士工作可以一定程度地借鉴互联网思维。比如,统战部门在向网络人士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可以换个角度,将网络人士看作“用户”,将工作看作一种“产品”,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针对“用户”的需求,提供他们满意的“产品”。此外,不少互联网企业具有“小、个、专、新”特点,表现在体量小,个性化鲜明、专业性强,工作形式新颖,多数从业人员以年轻人、党外人士为主,办

公方式灵活且多样,因此面向他们的工作方式也需要有一定的弹性。例如,许多互联网企业党员的数量还不够多,单独组建党组织还不够成熟,可以采用联合组建的方式完成党建工作;还可以对传统党建活动进行创造性改造,如用年轻人熟悉喜欢的“快闪”方式开展民主生活会。

(三)建构网络人士的网上精神家园

一是建立网络传播矩阵。网络传播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还是关系的传播。网络宣传平台应当建设成为一个矩阵式的传播平台,一方面拥有自建网络宣传阵地(“两微一端一网站”),另一方面也将宣传内容接入流量平台(如今日头条),以及嵌入用户关系网络(如借助朋友圈转发)等。二是善用网络传播技术手段。广泛使用短视频、长页 H5 网络人士易于接受的网言网语等网络传播技术手段,进行政策宣讲、主题教育、沙龙讨论等。三是让网络人士参与宣传内容的生产制作,给与网络人士展示自我的机会。通过让网络人士从宣传内容的“被动接受者”变为宣传内容的“主动生产者”,让网络人士增进对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提升他们的政治认同感;通过让网络人士展示自我价值和自我成就,培养和提升他们的群体归属感和存在感。

(四)组织网络人士社会服务团

调查显示,网络人士活跃于网络,不少人士对现实世界缺乏充分的认识。同时,他们在网络空间长期处于“原子化”生存的状态,群体内部归属感不强。这些或直接或间接对网络人士的思想 and 行为产生负面影响。统战部门可以组织网络人士社会服务团,让网络人士从网络空间走向现实社会,通过参与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一方面增加对于世情、国情、社情的了解,另一方面在服务社会中,找到自身的存在感和价值归属。

(五)给予网络人士平台载体

网络人士普遍具有较强的参政议政意愿。尤其是一些网络大 V、网络大号,他们往往想通过网络空间来实现自己压抑的政治参与欲望。统战部门可以给予网络人士一定的政治安排,如安排符

合条件的党外网络人士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评审员等,一方面满足他们参政议政的诉求,让他们有序参政、理性参政,发挥资政建言的作用,另一方面让他们在参政议政中增进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等的了解,培养他们的政治认同感。

(六)关心政治与关心生活相结合

思想政治工作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工作。对网络人士的思想引领,不仅要关心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表现,也要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统战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与人社部、网信办、司法部、宣传部等部门的沟通协商机制,经常了解网络人士的实际情况,及时反映他们的合理诉求,推动相关部门在知识产权、职业发展等方面保障网络人士的合法权益,帮助网络人士解决工作中遭遇的困难和后顾之忧,优化他们的发展环境。

五、发挥网络人士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积极作用

2019 年 11 月 28 日,中央统战部、中央网信办在京召开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会议,这是中央两部门首次共同召开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在会议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突出强调,“要加强网络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支持他们在舆论引导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努力把他們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智慧和力量。”因此,发挥网络人士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积极作用,应当从建设网络代表人士队伍入手,优先调动网络人士中代表人士的智慧和力量,利用好他们的示范效应,由点及面,最终带动整个网络人士群体发挥积极作用。本研究认为,下述四类网络人士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一是各类互联网企业和平台出资人。出资人虽然不是网络内容的直接生产者和发布者,但是他们是网络内容的前期规划者和最后审定者。出资人在网络人士中处于金字塔塔尖的位置,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主体意识也较强。对于这部分群体,统战部需要从共容利益出发,让出

资人认识到自身是网络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认识到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是他们事业成长最好的土壤,认识到网络强国建设是他们事业发展最好的保障和动力,从而促使他们自发自愿地发挥作为出资人的幕后调控作用,不断为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作出贡献。

二是新媒体等新闻资讯平台内容采编人员。作为多元信息的第一时间接触者,新媒体等新闻资讯平台内容采编人员对社会的敏感点、风险点、关切点把握精准。对于此类群体,统战部门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委托项目、政企合作等方式,支持他们在舆情把关、社会舆论管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通过与人民网、工信部等合作,把新媒体等新闻资讯平台从业人员纳入到网络舆情分析师的培训中来,鼓励他们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对主流意识形态攻击的信息,锻炼其业务能力。对于表现优秀的网络人士,颁发人保部认证的网络舆情分析师证。

三是网络“大V”、个人网络“大号”、网络社群组织负责人等网络意见领袖群体。网络意见领袖群体往往具有高于常人的思考能力,该群体发表的言论多具有剖析性、预测性的特点,往往会引发网民的高度关注。对于此类群体,统战部门要重视对他们的精神感召和理论滋养,加强与他们的交流沟通和动态追踪,培养他们的信息辨析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支持他们参与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开展网络舆论斗争、壮大主流舆论阵地。

四是网络作家、网络主播、视频红人、网络游戏研发人员等网络文化产品直接生产者。文化产品是核心价值观最好的输出载体。西方价值观在全球的输出,很大程度上凭借的是文化产业的传送带,寓价值观于文化产品之中,在全球化市场网络中,推送其价值观。对于网络作家、网络主播、视

频红人、网络游戏研发人员等网络文化产品直接生产者,统战部门需要积极引导他们将文化产品的创造生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传播有机结合,让网络文化的产业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齐头并进。在充分尊重网络人士创作自主和规律的前提下,有意识地鼓励他们运用多样化的语言、符号和介质,创作一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让这些文化精品在网络空间形成一种新时代风尚。通过这些文化精品,培养网民对核心价值观的感性认识,并在不断的文化消费中,进一步深化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条件许可和成熟的地区,统战部门还可以进一步联合宣传部等部门,共同孵化一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文化文艺作品,包括网络文学作品、网络乐曲、网络视频、网络电影、网络电视剧、网络文化文艺活动等等。

六、结语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志同则心同,心同则力同。发挥网络人士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积极作用,核心在于加强网络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关键是要把广大网络人士的心凝聚起来,涵养家国情怀,激发使命担当,让广大网络人士更加自觉爱党爱国,更加坚定跟党走。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成为社会信息集合平台,亿万网民在上面获得信息、交流信息,这会对他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会对他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工作、对人生的看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加强网络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发挥网络人士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积极作用,无疑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

责任编辑:郭晓东

外来宗教中国化比较研究初探

——以佛教中国化和伊斯兰教中国化为例

王彦明

摘要:本文通过对佛教中国化和伊斯兰教中国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二者不同的历史轨迹和规律,系统梳理了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为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宗教中国化;佛教;伊斯兰教

中图分类号:D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20)01-00054-05

近年来,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成为宗教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的重大课题。我国有五大宗教,除道教是本土宗教之外,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是外来宗教,传入以来逐渐适应中国社会,在实现中国化的方向上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在开展外来宗教中国化比较研究中,学术界往往把佛教和基督教进行比较,认为佛教是外来宗教中国化很成功的宗教,而基督教在神学思想和社会实践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海内外专家学者大多认为,佛教早已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伊斯兰教也早已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相比之下,‘基督教中国化’却依然显得任重道远。”^[1]事实上,伊斯兰教中国化也是一个重要命题。开展佛教中国化和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比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试图对佛教中国化和伊斯兰教中国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二者不同的历史轨

迹和规律,以便更好地研究外来宗教中国化的经验和路径。为了便于研讨的展开,仅就同处于儒家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环境中的汉传佛教和回族伊斯兰教进行研究。

一、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在我国历史上,曾经传入过很多种外来宗教,但是大部分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中华大地上生存和发展下来的外来宗教,正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果。外来宗教传入我国的时代和方式不同,不是一下子就融入中国社会,而是经过长期的适应和调整,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形成了不同于外国宗教的鲜明特征,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要系统梳理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以期为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提供借鉴。

中国基督教思想家赵紫宸先生曾将佛教中国

收稿日期:2019-12-20

作者简介:王彦明,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博士研究生。

化与基督教中国化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中国人需要宗教的话必须自己去求,认为“求”有三端:“求诸行”“求诸经”“求诸文”,分别代表的是“要做到身体力行”“要到发源地求经求教”“要自己翻译经典”。张志刚先生进一步研究指出,“从‘求诸经’‘求诸文’再到‘求诸行’”,“或许更合乎逻辑思维”^[2]。他指出,“从外来宗教中国化的比较研究来看,假如前述‘三求’的说法是有学术启发的,而对于任何一种外来宗教来说,‘求诸经’与‘求诸文’又可以看作两个不可或缺本土化前提或步骤,即只有‘取到真经’并‘译出真义’,才有可能在另一种不同的文化氛围与社会处境之下‘求诸行’——‘践行真谛’、‘得以认可’并‘传播开来’,那么,我们不妨把这‘三求’比作外来宗教得以扎根、开花与结果的‘三乐章’”^[3]。因此,任何外来宗教要在中国传播和发展,都必须面对如何翻译经典、如何处理与境外发源地的关系、如何调适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如何适应统治者的管理等问题。归根结底,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就是要正确处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传统的关系,进而实现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和传播开来。

二、佛教中国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路径

(一)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一般认为,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西汉到西晋时期,佛教传播以佛经翻译为主,东汉末年不少古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到汉地,译出大量佛教典籍。“此时的佛教首先是在宫廷中流行,并且被看做祠祀的一种,混同于黄老之学。”^[4]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东晋慧远作《沙门不敬王者论》,调和儒家和佛教的矛盾,在理论上解决了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文化在以儒家思想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佛教的传播逐渐由上层社会扩大到民间,佛刹遍及大江南北。隋唐时期,形成了中国佛教八大宗派,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基本完成。与此同时,“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佛、道思想为辅的思想

文化格局逐渐形成。”^[5]五代十国到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佛教被宋明理学吸收、改铸而渐失光环,满足社会各方面需要的理学已难以容纳佛教繁盛的局面,佛教再也难以占据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之列。”^[6]明清时期,佛教由诸宗并弘逐渐演化为诸宗融通,最终形成了各派融合,儒、释、道合流成为趋势。

(二)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

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后传播至世界各地,成为世界性宗教。7世纪中后期伴随阿拉伯、波斯商人的商贸活动传入中国(一般认为,唐高宗永徽二年即公元651年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之一)。唐宋时期,外来穆斯林侨居中国,伊斯兰教是外来侨民信仰的宗教。元朝,伊斯兰教成为与佛教、道教并列的政府认可的宗教。明朝,统治者实行“不许本类自相嫁娶”和禁止“胡服、胡语、胡姓”政策,穆斯林与汉文化群体的心理和文化距离在逐步拉近。明代中叶实行海禁,“这样切断了唐宋元三朝以来,中外伊斯兰文化自然交流的通道,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面临着在汉文化的大海中孤舟独行的局面。”^[7]明末至清中期,穆斯林学者开启了“以儒诠经”活动,“通过吸收、改造儒家传统中的思想资料来阐释伊斯兰教的内涵,并回答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掀起了一个影响深广的伊斯兰文化复兴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伊斯兰教‘孤芳自赏’的保守状态。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清代咸丰、同治年间。”^[8]清朝中后期,伊斯兰世界复兴思潮也开始影响中国的穆斯林,中国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儒诠经”活动逐渐陷入沉寂。

三、佛教中国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之比较

开展外来宗教中国化的比较研究,应该从经典翻译、与统治者的关系、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与境外发源地的关系、与所处时代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讨论。

(一)经典翻译

外来宗教传入一个新的地区,宗教经典是否

翻译为当地文字,对其本土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佛教认为只要坚持基本教义思想,对佛经翻译为其他文字持开放支持的态度。佛教创立初期就使用两种不同文字进行传播,北传佛教主要依据梵语经典(雅语),南传佛教主要依据巴利文经典(大众语言)。佛教一传入中国就开始将大量佛经翻译成中文,最早由外来僧人主持译经,现存最早的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相传为东汉时期天竺高僧译出。随着中国僧人西行求法,求法与译经并行,三国时期僧之行、东晋法显、唐代玄奘、义净前往古印度取经后回国译经、弘法。译经活动一直持续到宋代,随着佛教在印度湮灭而结束。大量佛经的译出,使得中国社会逐步认识和了解佛教理念。

伊斯兰教创立初期,关于《古兰经》是否翻译为外国语文的问题上存在着激烈争论。正统神学家认为《古兰经》是真主的语言,为绝对维护原貌,反对翻译成任何一种文字。随着伊斯兰教向外传播和发展,就出现了《古兰经》翻译版本,16 世纪拉丁文《古兰经》正式出版,这个时期大致相当于我国明代中后期。也就是说,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近一千年之后,明末清初中国穆斯林学者开始对《古兰经》进行摘译,迟至 20 世纪才出现《古兰经》中文全译本。按照阿拉伯世界的传统,《古兰经》标准文本为阿文和中文对照。因此,中国主流社会和伊斯兰教外人士长期无法了解伊斯兰教的真义。

(二)与统治者的关系

佛教传入之初,首先是在宫廷和贵族中流行,有的封建帝王本身就是虔诚的佛教徒。东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是最早信仰佛教的人,汉桓帝成为东汉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梁武帝崇信佛教,要求王公贵戚乃至平民百姓都信奉佛教,作《断酒肉文》劝导和命令僧徒遵守,改变了汉传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僧徒的肉食习惯。总体来看,除“三武一宗”灭佛之外,大部分封建王朝对佛教持宽容、支持态度。

对伊斯兰教来说,中央政权把伊斯兰教作为外来民族的信仰看待,伊斯兰教从未获得最高统治者的信奉。唐宋时期,穆斯林作为侨民、生活在

“蕃坊”之内。元代,穆斯林作为色目人在社会等级体系中地位仅次于蒙古人。明代,中央政权重新回归汉族政权,穆斯林失去了特权地位,最高统治者对伊斯兰教进行褒扬,同时又把穆斯林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阻止穆斯林自相嫁娶,在内地禁止“胡服、胡语、胡姓”。清代,雍正元年、雍正八年,地方官员两次奏请朝廷严禁回教,革除回俗,雍正皇帝予以驳回,同时认为“回教原一无所取”。清朝后期穆斯林与清政府冲突过程中,有的穆斯林打出伊斯兰教旗号,有的阿訇成为实际召集人,清政府对伊斯兰教采取了高压政策。

(三)与主流文化的关系

佛教进入中国后,通过与儒、道接触、融合以及佛道辩经、佛儒论战,逐渐获得统治者和主流社会的认同。东晋慧远指出“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调和佛教与儒家思想的矛盾,为佛教的发展获得了更广阔的空间。儒家和道教也深受佛教的影响,宋明理学的发展和全真道的形成都受到佛教思想的启发。“至于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华严宗、禅宗理论的刺激和影响而产生的。在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研究佛学成为一时的风气。”^[9]随着唐宋以后儒、释、道合流,佛教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以前,伊斯兰教与中国主流传统文化保持距离,不注重对教外人士宣传和解释教理教义,主流社会无法了解伊斯兰教的内涵。明末清初出现了穆斯林信仰淡化、伊斯兰教衰落的问题,穆斯林学者开创了以儒诠经活动,在伊斯兰教与主流文化关系上迈出重要一步。清代穆斯林学者蓝煦在《天方正学》中说:“东方孔子仲尼,西方穆罕默德,心同理同,道无不同”“知回、儒两教,道本同原,初无二理。”穆斯林学者以当时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的架构来阐述伊斯兰教义的体系,主动把程朱理学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与伊斯兰教哲学和教义教规结合起来,在保留最根本信仰不变的同时,使伊斯兰教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现实需要。需要指出的是,“以儒诠经”活动主要是用

宋明理学的理论体系来解释伊斯兰教,反过来伊斯兰教对宋明理学和主流文化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也被有的学者称为伊斯兰教儒学化进程,这与佛教与儒、道相互影响并走向合流殊为不同。

(四)与境外发源地的关系

从两汉至隋唐,中国与古印度、西域诸国联系紧密,境外僧人来到中国译经、弘法,中国僧人前往古印度取经活动从未间断,中国佛教深受印度佛教思想的影响。隋代,“在与外国佛教的关系方面,从总体上说,隋代佛教已经脱离了对印度佛教的依附,逐步走向独立和创新。”^[10]中国佛教形成了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宗派,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宋太宗时建立国家译经院,正值印度国内密教全盛时期,由于密教与儒家伦理相抵触,译出后即被焚毁。13世纪印度本土佛教湮灭,中国与印度佛教联系几乎中断。中国佛教延续下来并处于不断发展中,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

明代以前,中国伊斯兰教与伊斯兰世界保持经常性联系,宗教职业者靠外来的伊斯兰教学者及其后代充任,没有形成中国的培养宗教人才的制度。“明代中叶实行海禁以后,来华的伊斯兰教学者越来越少,各地清真寺普遍出现有宗教知识素养的掌教阿訇后继乏人的现象。”^[11]明末清初,中国伊斯兰教通过经堂教育培养教职人员,通过“以儒诠经”活动开启中国化进程,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的结合程度进一步加深。清朝前期,河西走廊连接中亚和中东的丝绸之路再度恢复,伊斯兰世界各种思潮源源不断传入中国,给中国穆斯林社会和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带来了重大影响。清朝后期,穆斯林与清政府爆发了多次冲突,“刚刚起步的伊斯兰教儒学化进程就此中断”^[12]。

(五)与所处时代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认为,宗教意识形态总是与特定的国家形式、社会形式相联系的,并由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所决定。“要把宗教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要用历史来说明宗教”^[13]。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所处社会历史条件密不可分。

对佛教来说,两汉之际(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彼时中国封建社会正处于快速上升期,主流文化正在孕育形成之中,儒家、道家思想也在发展之中尚未定型,此时距公元前134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树立儒家“大一统”思想不过一百余年,公元142年张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正一盟威之道,道教方始形成,这又比佛教传入晚了一百余年。因此,佛教虽然是一种外来宗教,与儒家、道家思想共同伴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佛教、道教展开竞争,儒、释、道竞相争辉,取长补短。自隋至唐,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达到顶峰,国力强盛,善交友邦,兼容并蓄,呈现出政治昌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盛唐气象”。中华文明更加发达和自信,对于外来文化持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外来文化不但不会对中华文化带来冲击,反而还会受到中华文化的吸引和影响。佛教与中华文化的结合进一步向前推进,形成了中国化的八大佛教宗派。

唐代中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时,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儒、释、道涵盖了宇宙、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儒治世,道治身,佛治心”的局面。伊斯兰教没有赶上与儒家、道家思想共同成长并展开竞争的历史时代,唐宋时期几乎没有给其他外来文化得以跻身于主流文化地位的空间。“唐代中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至此,中国社会由上升期逐渐进入了下降期。”^[14]进入宋代以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更加强固,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指导思想。至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更加封闭、保守,不复盛唐时期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心态和气度。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开始探索中国化的时候,这时的社会思想条件与隋唐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完全不同。清朝后期,伊斯兰世界复兴思潮与中国封建王朝的保守之间发生冲突,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遭遇挫折。

四、对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历史启示

国际学术界在研究外来宗教本土化时强调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社会认同。“‘宗教中国化’主要内含三重义理,即真正融入‘中华文化、中华民

族和中国社会’。”^[15]佛教中国化和伊斯兰教中国化历史轨迹不同,但是在探索中国化的道路上,在实现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社会认同上都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也是共同的历史启示。

(一)实现文化认同。对佛教来说,佛教在与儒家、道教相遇、碰撞和竞争中,彼此丰富,也使得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走向儒、释、道合流的趋势,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伊斯兰教来说,通过论证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道本同原”,主动靠近主流文化,把伊斯兰思想与占主流地位的程朱理学紧密结合起来,从哲学思想到伦理道德,从基本概念到专用术语,进行全面吸收和改造,解决了穆斯林对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问题。

(二)实现民族认同。东晋时期发生了“沙门不敬王者之争”,也就是儒家名教和佛教教义的矛盾。东晋慧远作《沙门不敬王者论》,指出既认同于儒家的道德观念、服从于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封建国家礼制,又保持佛教自身的特点、发挥儒家思想所不足甚至没有的独特作用,儒家和佛教出发点和作用范围不同,最后的目的和归宿是一致的。对伊斯兰教来说,王岱舆《正教真诠》说:“人生住世,有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认为忠于真主和忠于君王是一致的,提出了“二元忠诚”思想,解决了教权与王权相统一的问题,对于伊斯兰教在中华大地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实现社会认同。针对儒家认为佛教舍弃家庭、否定现世、无君无父的指责,东晋慧远认为沙门“不违其孝”“不失其敬”,佛教道德与儒家伦理纲常是一致的。东晋居士孙绰提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的命题,强调佛教的持修与儒家孝道的统一性。“佛教这种与儒家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倾向,构成了中国佛教道德的根本特点。”^[16]清初刘智将伊斯兰教中念、礼、斋、课、朝五项功课称为“五功”,把伊斯兰教体系中关于“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个伦理关系内容称为“五典”。刘智《天方典礼》说:“圣教立五功,以尽天道,又立五典,以

尽人道者,天道人道,原相表里,而非二也。”将中国传统社会“三纲五常”与穆斯林的“五功”、“五典”联系起来,构建了中国伊斯兰教伦理道德思想体系。

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外来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要在中华文化传统的土壤上落地生根,核心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传统的关系。在新时代研究和推进宗教中国化,要引导我国宗教界坚持爱国爱教方向,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的关系,绝不照搬照抄外国宗教模式,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要深入推进经典阐释,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我国宗教,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我国宗教,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要总结历史经验,继承优良传统,适应时代要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参考文献:

- [1][2][3] 张志刚. 文化回馈: 人类文明交流的新境界——以“佛教中国化”为例[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3):34-35.
- [4][5][6][10] 方立天, 华方田. 中国佛教简史[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
- [7] 高占福. 从外来侨民到本土国民——回族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历程[J]. 世界宗教研究, 2013(3):168.
- [8] 马明良.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与“以儒诠经”[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9(9):56.
- [9] 赵朴初. 佛教与中国文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8.
- [11] 余振贵. 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6: 137.
- [12] 菅志翔. 简论共和国以前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演变[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5):108.
- [13] 张志刚. 再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方法论意义[A].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辑刊[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307.
- [14][16] 方熔. 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路径[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3(12): 40.
- [15] 张志刚. “宗教中国化”义理沉思[J]. 世界宗教研究, 2016(3):21.

责任编辑:徐晓婷

推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创新探索

——以青岛为例

姜丽华

摘 要: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的民族性因素特征明显,它既是城市治理问题,也是具有一定敏感性的政治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市治理和城市少数民族工作面临着新课题、新情况。近年来,青岛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统领,综合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服务与管理,多管齐下,多措并举,进一步推动青岛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创新。

关键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20)01-00059-05

伴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加速,各种资源向发达城市聚集,引发大规模少数民族人口跨省流动,青岛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早已超过世居少数民族人口,在给城市发展带来新元素的同时,也挑战和考验着城市的管理水平。近年来,青岛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统领,针对城市治理和城市少数民族工作面临的新课题、新情况,综合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服务与管理,进一步推动青岛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精细化、精准化,努力实现在青岛的各民族群众“进得

来、留得住、融得进、过得好”的目标,为青岛建设“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凝聚磅礴的民族智慧和力量。

一、创新青岛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践土壤

(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传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面临新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判断依据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收稿日期:2019-12-20

作者简介:姜丽华,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政治学和统一战线方针政策。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青岛统一战线智库课题《推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创新探索》(课题编号A1902)阶段性成果。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三个不适应”,即“进城的少数民族群众对城市的生活和管理方式、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某些生活和行为方式以及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机制等都不能很好适应。”^[1]一方面是各少数民族群众对美好生活各种要素的需求不断提高,各族群众在公平正义、民主法制和维权意识领域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是进一步提高城市民族事务治理水平现代化。民族工作部门人员数量少、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一些地方的民族工作机构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进行调整,或与统战部等部门“合署办公”或纳入统战部门,责权划分还未完全到位。加之城市民族工作具有敏感性、辐射性、连锁反应性等特点,因此出现了“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机制等都不能很好适应”的现象,这些都对青岛市委市政府民族事务的治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二)顶层推进:多主体参与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造新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和中央第一次城市民族工作会议上,对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背景下,更好地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提出根本方向和基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城市民族工作,提出“加速法制化进程、加快信息化建设、构建合力化格局”的城市民族工作创新对策。^[2]同时对参与城市民族治理工作的干部队伍的能力和水平提出要求。从以上会议精神可以看出,面对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形势和阶段性特征,国家顶层设计不断发展和完善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顶层设计打破了原有的单位制、单一形式推进城市民族工作的传统思维,为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民族事务治理谱写了一个新篇章。

(三)探索与创新:青岛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精细化

青岛市委市政府为了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青岛,多个城市公共服务领域围绕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精细化,进行建设性

的探索和创新。2014年,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超过百人的29个社区建立“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室”。在民政局的支持下,各区在民宗局、民族宗教事务科、统侨科等相关部门为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专门设立城市少数民族社会工作专业岗位。2015年依托市民族团结进步协会成立了“青岛市少数民族医疗工作服务队”,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免费医疗咨询和义诊服务。市南区将社会工作引入民族宗教领域,设立全市首个民族团结服务站社工岗位,探索符合少数民族特色的工作方式服务少数民族群众。2016年,青岛市民宗局和司法局联合社团组建“青岛市少数民族法律援助工作服务队”。由于这些开创性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工作,青岛市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取得的成绩受到了国家民委的高度肯定。2016年被确定为全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示范城市,2018年被确定为全国深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二十个试点城市之一。青岛市逐步形成党委集中统一领导,政府部门相互联动、政府与社会协同的城市少数民族人口管理和 Service 创新的新格局,各项工作朝着更加精细、精准的方向稳步推进。

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课题组于2019年6-7月深入青岛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多的南区高邮湖社区、李沧区虎山路街道百通馨苑社区、城阳区流亭街道杨埠寨社区和即墨通济区硕丰苑社区四个社区,选取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代表和基层统战民宗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发放调查问卷200份,涉及近30指标的问卷调查,集中反映的问题如下。

(一)各职能部门之间主观响应与实际参与存在差距

进入青岛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整体上看,具有流动性较强、收入偏低、技能较差、治安意识偏弱、维权意识强弱不均等特点,也是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的的重要内容。事实证明,这些方面的工作单靠统战部门无法完全实现,统

战部门是第一责任主体,还需要公安、综治、教育、医疗及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的大力配合。大部分区市的职能部门主观上响应都很积极,但在具体协调中,囿于各种复杂因素的限制,参与民族工作中出现“放任自流”和“推卸责任”等状况。部分区市服务管理的工作定位不清晰,有的偏重于管理,有的偏重于服务。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集的社区建设仍然存在短板

社区是提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的基本单位,也是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及真正融入城市的重要载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社区治理组织架构还需进一步优化。在实际工作中,社区承接着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如分管民委、宗教、民政和公安等部门,但是它们之间互相间信息沟通不畅、工作衔接协调不足,致使社区工作出现政令多头,交叉重复,任务繁重的状况。从调查的情况看,社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最需要的,针对少数民族群众开展的就业培训、教育卫生和社会救助等方面培训不足、开展有针对性的民族特色服务及民族文化活动,还有较明显的差距。

(三)针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地方性政策法规缺乏

在与相关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人的访谈中了解到,目前缺乏专门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地方性政策法规。目前适用的法规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颁布的《山东省民族工作条例》,因此,缺乏针对性和地方性特色。政策的缺乏容易导致少数民族群众用在流出地享受的“优惠照顾权”替代平等的“公民权”。假如青岛市政府缺乏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关优惠性政策,他们在青岛市无法享有优惠照顾,就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这也成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群体性事件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城市民族干部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待提高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是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的基础,但是基层党员干部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是做好这一工作的“不二法门”。尽管如此,部分城市民族工作者中仍然存在对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不够精通、不懂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了解文化、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况且青岛正在打造上合示范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将来到青岛生活学习的外国族裔将越来越多。因此,针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工作队伍国际化、工作能力现代化还存在一定差距。

三、推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创新

新时代,为更好地满足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青岛市需要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民族事务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取得进一步成绩,使得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的体制机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按照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要求,各方面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构建起精细化和精准化的服务管理创新的新模式。

(一)建立党委集中统一领导的城市民族事务治理顶格协调工作机制

实践证明,城市民族事务治理要在党委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工作机制,才是解决当前服务管理中的短板和弱项的根本出路。一是成立由党委、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统战、司法、民政等部门组成的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民族事务关系协调联席会议制度和突发事件情况通报制度,定期共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遇到的特殊困难和问题。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集中居住的社区建立隐患矛盾化解排查机制,涉及统战、综治、公安、信访、街道等多个部门共同参与。二是健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治理体系。政府要切实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履行社区民族事务治理主导职责,在制定相关政策、保障物力财力和指导干部能力提升中发挥重要作用。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等方面统一管理,为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提供优质高效的社会公共服务。各职能部门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三是落实“两头对接”制度。加强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出地各级政府的合作,在已经建立的定期与青海的化隆和循化民族自治县联系制度之外,在青海、甘肃、新疆等地继续扩大联系范围,以便于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工作对接,在应急事件处理、信息收集及人员管理等工作中建立区域联动、齐抓共管和信息互通协作机制。

(二)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健全民族团结进步浸润式宣传教育机制

普遍开展丰富多彩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活动、并在增进时效性上下功夫。一是将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与少数民族重要节日等庆典相衔接,在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和文艺活动中,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渠道,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创新各民族一家亲宣传教育的方式和载体,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技术,探索“互联网+民族宗教法治宣传”模式,多搞“滴灌”,推动建立健全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组织开展慰问演出活动,不断推动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二是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宣传教育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相融合。比如,将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作为助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有力抓手,寓教育于活动之中;建设特色鲜明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中开展特定形式的创建活动,将创建活动“六进”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主阵地与主渠道,探索完善各种形式的创建路径。三是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社会教育、国民教育、干部教育全过程,构建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齐头并进的教育平台。突出党员领导干部和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这个“关键少数”,在党校、行政学院和社会主义学院等干部培训学校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政策法规

和民族常识教育,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到每一个党员干部心中。

(三)围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建立健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合法权益无缝隙政策保障机制

青岛市委市政府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成果落到实处,在公共服务均等化做了大量工作,使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一是构建民族工作大格局的思路。近期,中央决定在青岛建立全国首个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青岛要充分发挥在“一带一路”的双点城市优势和地方经贸合作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届时到青岛经商、务工的国内外各少数民族群众将与日俱增,政府各相关部门在编制发展规划时,要把少数民族的发展提前纳入到科教文卫各项事业中去。二是市委、市政府逐步建立完善相关社保政策及各项配套措施。在就业问题上,通过政府的统筹安排,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培训,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等不得实施就业歧视,并适当照顾。对暂时居住的从事个体服务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按灵活就业人员办理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对取得青岛市居住证的外来少数民族群众,享受与户籍人口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三是要强化政府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利保障的职能和责任。其中,有效回应少数民族群众合理诉求,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保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把为少数民族群众排忧解难纳入到整个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中去,成为创建活动的重要抓手。对有特殊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源头上严格把关清真食品的全过程并进行有效监督管理,切实维护少数民族群众的合理要求和合法权益。

(四)围绕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立体化社区治理长效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中在社会治理制度中,明确提出“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3],构建“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

水平”^[4]四项机制,以优化配置和合理统筹各项资源,力求实现服务管理精准化、精细化。一是建立健全智能化服务机制。目前,青岛市政府借助“数字政府”平台积极打造多层次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网络,为构建社区网络服务与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和信息化保障,已基本实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机制。现代信息技术还在完善为少数民族居民搭建交流、对话和协商的机制建设,使各族群众的不同利益诉求能畅通表达,社区做出及时、高效、准确的回应,实现理顺情绪、化解矛盾。二是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机制。青岛市通过探索多种形式,形成互联网+社工、社区、社团、社会“四社联动”机制,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及专业社工队伍的积极性,发挥社区、工、青、团、妇、残等社区群团组织力量,探索出一条“再组织、再教育、再服务”的道路,用专业的理念和方法来解决社区遇到的民族事务的决策、管理及监督,提高社区服务各族群众的能力。三是建立健全专业化服务机制。青岛市按照“政府支持、社会运营、项目合作、专业发展”的思路培育社区专业化力量,扩大企业支持力度,在少数民族居住较集中的餐饮饭店建

立联系交友站,成立有专业知识的少数民族成员的法律服务队和医疗咨询队,为民品企业搭建政商沟通机制,让他们积极参与到城市民族事务的治理实践之中。四是建立健全法治化服务机制。青岛市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法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把服务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在社区向各族群众宣传和讲解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礼仪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民族知识、民族工作服务事项,加快培养双语少数民族法律干部。

参考文献:

- [1] 王正伟. 做好新时期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J].求实,2014(20).
- [2] 郑信哲. 试析我国当前城市民族工作发展的理论与实践[J].兰州学刊,2016(5).
- [3]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9:22.
-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9.

责任编辑:徐晓婷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以南京市为例

华 静

摘 要:当前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面临诸多困难以及前所未有的挑战,亟需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推动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对南京市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和座谈,分析当前民营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调查与思考

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20)01-00064-07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南京市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茁壮成长、蓬勃发展,涌现出“苏宁”等一批世界级优秀企业,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多次就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做出重要指示。南京市围绕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较为有效的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但当前民营企业在发展中也面临诸多困难以及前所未有的挑战,亟需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推动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南京市委统战部组成课题组,对南京市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和座谈,并重点发放问卷调查

1133 份,旨在全面了解南京市民营经济总体发展情况,分析当前民营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一、南京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绩和现状

(一)企业政策不断完善,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环境

近年来,南京市围绕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出台《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 100 条》从开办企业、不动产登记、建设项目审批等十一个方面,推动打造良好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更好地服务企业发展,激发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出台《关于进一步激发民间有

收稿日期:2019-11-04

作者简介:华静,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

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重点领域定期梳理一批投资效益高的优质项目，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通过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租赁等途径进入，让民营企业切实通过投资获得相应回报。此外，出台的《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从6个方面30项举措，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政策都彰显了南京市委市政府坚决打好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强决心。

(二)企业主体地位不断凸显,为高质量发展打造更强高地

一是民营市场主体规模持续扩大。2019年上半年南京市实有市场主体134.64万户,比2018年底增长5.13%。规上民营工业企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市1776家(数量占全市的70.9%)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完成总产值1583.65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26.5%。二是民营企业发展速度迅速。十八大以来,南京市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以2.55%的速度快速增长。2018年全市民营经济增加值为3168.28亿元,占比为46.4%,比2012年提高了6.5个百分点。三是民营企业发展质量不断攀升。2019年,南京市共有9家民营企业登榜“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6025亿营收位居第三位。2019年,南京有11家进入“江苏民营企业100强”,上榜企业2018年度营业收入总和达到1.277万亿元,占百强榜营收总额24.2%。

(三)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一是企业创新平台建设力度不断加强。2018年,民营企业新获认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家,省级17家,市级以上民营企业技术中心达到493家,占全市的77.5%,数量是2012年的2倍之多。二是高新技术和科技型企业发展迅速。2018年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净增1282家,增长70%,总数达3118家,其中80%以上为民营企业。民营科技

型企业约14000家,约为2012年的2.8倍。30家科技型龙头企业中有26家为民营企业。三是企业创新产出不断增多。2018年,南京市累计拥有江苏名牌企业229家、产品288个,其中民营企业189家、产品231个,民营企业数及其产品数占比分别为82.5%和80.2%。累计拥有南京名牌企业537家、产品617个,其中民营企业483家、产品552个,民营企业数及其产品数占比分别为90.0%和89.5%。2018年,南京市国内有效注册商标16.3万件,其中大部分为民营企业申请。拥有驰名商标企业99家,其中民营企业42家。

(四)企业活力不断激发,为高质量发展形成更大合力

一是资本市场融资能力进一步增强。2018年新增境内A股民营上市公司3家,全市上市公司总数达109家,其中民营企业72家(2012年仅为36家),占66%。新三板挂牌企业中,绝大部分为民营企业,基本形成多层次、活力强的资本市场“南京民营板块”。二是民间投资进一步活跃。2019年上半年全市民间投资1332.05亿元,同比增长18.7%,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1.3个百分点。三是新经济发展势头较好。根据《2019胡润全球独角兽榜》最新发布,中国共有206家独角兽企业上榜,数量排名全球第一。其中,南京共有12家入围,数量排名全国城市第五、全球城市第七。

(五)企业社会贡献不断提高,为高质量发展承担更大责任

一是民营企业税收贡献稳步增长。十八大以来,南京市民营企业税收收入占比以5.5%的速度增长。2018年南京市民营企业共实现税款1374.7亿元,达全部税收收入的50.4%,比2012年的36.8%提高了13.6%。2019年1-9月全市民营经济贡献税收1303.43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61.58%,撑起南京经济“半壁江山”。二是民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更加积极主动。如民营经济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许多民营企业积极把企业发展成果回报社会。2018年共计1334家民营企业参与精准帮扶,到位帮扶资金4978.4万元,

帮助困难群众 9536 人次,树立了南京民营企业良好社会形象,增强了南京民营企业家社会信誉。

(六)企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活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国家的鼓励与扶持下,民营经济积极参与到开放型经济建设中来,逐渐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顺应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民营企业积极开展海外投资、海外研发、境外工程建设,成立海外生产基地和产业园区,在境外商务服务业、制造业、金融业和互联网产业方面颇有建树。当前民营企业出口已经超过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独占出口贸易鳌头,涌现了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2018 年,南京市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项目 101 个,比 2017 年多 26 个,涉及中方协议投资额 16.8 亿美元,占全市的 80%,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占比达到 63.7%,主要为批发零售业、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及专业技术服务业。

二、南京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南京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南京民营经济想要实现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进而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仍然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

(一)国内外发展形势对南京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挑战

从外部看,南京民营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所带来的挑战。当前,受贸易壁垒增加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长被削弱,刚出现复苏的世界经济再次面临下行的压力。2019 年 10 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其对 2019 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了 0.2 个百分点至 3%,对发达国家以及美国、欧元区国家的增长预期均有所下调,这也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全球经济增长的疲软势必拖累国内的经济增长,给

南京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诸多的外部不确定性。

二是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所带来的挑战。受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国内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多种发展矛盾爆发的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2019 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2%,从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 6.4%,二季度增长 6.2%,三季度增长 6.0%,增长速度不断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减少南京民营经济的市场需求,降低投资热情,给南京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

三是新时期民营企业转型发展所带来的挑战。近些年,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我国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经济安全、产品质量、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改革力度,但也因此对民营企业提出了转型发展的新要求,使不少企业面临较大的发展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新“三座大山”。在这一背景下,南京的民营经济同样存在着如何跨越“三座大山”,加快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实现转型发展、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巨大挑战。

(二)南京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龙头企业缺乏,新经济增长点有待进一步培育。一是从规上企业数量看,根据 2018 年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南京 2017 年规上民营工业企业数量仅为 1791 家,远低于苏州 5717 家、深圳 5498 家和杭州 4671 家。从规上民营企业资产总计来看,南京为 7660.9 亿元,与深圳、上海相差三倍之多。二是从民营企业实力看,2018 年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南京仅有 11 家上榜,与杭州(26 家)、上海(29 家)、深圳(26 家)差距较大,也排名苏州之后(19 家)。而在最新的 2019 年榜单中,南京入“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的企业数减少至 9 家。在 2019 江苏民营企业 100 强看,无锡、苏州、南通的数量分别为 26 家、25 家和 17 家,高于南京市的 11 家。三是从新经济发展看,独角兽作为新经济的先锋,是创新型科技企业中的“皇冠”和“明星”。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9 胡润大中华区独角兽指数》

报告,南京虽然排名全国第五,但与独角兽企业排名榜首的北京(82家)、排名第二的上海(47家)相差较大,也少于杭州(19家)和深圳(16家)的数量。

2. 技术创新滞后,科技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在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目前,南京市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一是企业核心技术缺乏。调研结果显示,拥有“40件以上发明专利数量”的企业仅占5.61%,而“拥有发明专利数量小于5件”的企业占69.12%,省级以上著名商标数量存在“零件”的企业占68.42%。与我国先进城市民营企业创新情况相比,南京存在较大差距。以深圳华为为例,仅2018年其专利申请数就达5405件,累计获得授权专利87805件。深圳的努比亚、比亚迪、中兴、大族激光等企业均拥有大量的发明专利,南京目前还缺乏类似的科技型民营企业。二是创新投入不足。南京科技型民营企业研发经费的投入强度不能满足民营企业创业创新需求,不利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从问卷调查来看,2019年度民营企业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小于1%、介于1%-5%之间的企业分别占25.96%和41.05%,只有8.77%的企业研发费用占比超过15%。三是从创新竞争力不强。调研发现,企业推出的各种新产品的新颖度属于“国际市场新”的仅占17.92%,科技竞争力不强。

3. 要素供给不足,政策精准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要素供给不足,主要从人才、资本和土地供给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劳动用工”和“高端人才”双头难问题。问卷结果显示,企业的发展压力排名前两位的分别为“劳动用工”和“人才”,分别占67.02%和59.65%。随着各地纷纷出台人才引进计划,人才竞争呈现白热化趋势,企业不仅引进高素质人才的成本越来越高,而且出现比较严重的研发人员、技术人才流失情况。二是融资难融资贵是老大难问题。调研发现,企业普遍反映由于金融机构存在“所有制偏好”和“规模偏好”,金融机构在放贷政策上存在国企、民企两个体系,民营企业在

融资渠道和融资规模上受限,而量大面广的中小微民营企业,特别是初创型科技企业、农业类、装备制造类融资尤为困难,而即便贷到款的企业,贷款利率上浮较大,导致企业融资成本较高。此外,还存在民营企业贷款审批程序比较复杂,部分银行办理贷款流程长、速度慢等问题。三是用地难问题。由于企业自身实力有限、有关指标不够等问题,很难在市里获取用地指标。在调研中,很多民营企业呼吁在用地、供地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其他”项中)。

4. 营商环境仍需优化,多部门政策衔接有待进一步加强。一是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在调研中,民营企业近期最强烈、最盼望的还是公平平等的营商环境和法治环境,希望能够一视同仁在市场竞争中发展。首先是市场准入难。不少民营企业遭遇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政府在产业准入方面尤其是新兴产业方面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国有企业偏好”,一些民营企业很难通过资金投入和技术创新对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其次是投资领域不一致。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政府重大项目建设的力度还不足,企业参与投资的渠道和途径还不够充分,投资准入门槛仍然偏高。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合作还存在不少实际困难,很难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再次是贷款标准不一致。很多企业反映在对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在贷款发放、债权投资等方面并未一视同仁。最后是其他领域。反映在知识产权保护、地方保护主义和去产能、去杠杆的执行标准、政策采购、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存在不公平竞争的分别占20.35%、18.6%、18.25%、16.14%及4.91%。二是政府服务效能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方面,部门间的协作有待进一步加强。调研中一些企业提出“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提高跨部门业务办理效率”。如在“当地有关部门在开展跨部门联合抽查时,对同一市场主体的多个检查事项处理情况”中,有42.11%的企业反映存在多次检查,对其经营和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另一方面,政府自身改革活力还有待进一步释放。调研中,只有15.09%的企业认为政府部门在

处理企业难题时能够完全解决。究其原因,主要存在如下三大问题:工作人员对政策的了解程度有待进一步增强(占 51.23%)、工作人员自身工作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29.82%)、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有待进一步改善(25.61%)。此外,也有企业反映有关部门在问题的处理上不够及时,一些企业直接表明“基层办事人员要提高效率,不能微笑着拖沓,严格规定企业办事时间”。三是政府执行方式有待进一步转变。在关于“有关政府在执行政策时,如安监、环保等领域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化、一刀切等问题”,调查问卷中只有 37.19%认为“不存在”,有 8.07%认为“存在较多”。在政策兑现方面,虽然仅 5.26%的企业经历过不兑现情况,但仍然反映出“退税、关停并转补偿”不兑现等问题依然存在。

三、促进南京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当前南京民营经济正面临着我国倡导和主导的“一带一路”为核心的第四轮全球化新“走出去引进来”国际发展环境,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区域协同的联动发展机遇,江北新区的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建设带来的制度创新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赋能创新带来的产业变革新窗口。我们一定要抢抓机遇、聚焦目标、乘势而上,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更优的环境,全力促进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照江苏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目标,同时依据目前南京市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况,在此提出南京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到 2022 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50%;营业收入超千亿大型民营企业数量达到 3 家;民营工业对全市工业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50%以上;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 500 强数量 12 家;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达到 55%左右。

(一)推动民营经济转型发展,实现“效率赋能”

一是促进民营经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大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力度,设立民营经济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专项资金,对民营经济传统产业设置

技改清单目录,引导民营经济传统产业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推动传统制造业产业链的延伸发展,大力发展基于价值体验、技术咨询、售后服务等方面的产业链环节,实现传统产业在价值链上的功能攀升。鼓励民营企业传统服务业转型发展,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互联网+”为手段,创新服务业发展模式,提高服务效率和能力。

二是拓展民营经济发展领域。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新经济步伐,推动我市民营经济向新经济领域发展。重点扶持新型电子信息、区块链、绿色智能汽车、高端智能装备、生物医药与节能环保新材料等现代制造业的民营企业做大做强,重点扶持软件和信息服务、金融和科技服务、文旅健康、现代物流与高端商务商贸等现代服务业的民营企业做强做优。引导民营经济向人工智能、未来网络、增材制造,以及前沿新材料、生命健康等新发展领域进军。

三是提高民营经济信息化应用水平。组织开展中小企业上云诊断和信息化专业技术普及,引导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打造“南京云网”融合产品,为我市中小企业提供“1+N”的个性化信息服务,即:1 根优质接入宽带,N 项“云应用”,助力中小企业一站式上云,实现中小企业云网融合,提升中小企业运用信息技术能力。

(二)加快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实现“科技赋能”

一是加强民营企业原始创新。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础研究源头平台建设,依托政府搭建平台渠道,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由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引导,组织民营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基础研究团队进行对接,让更多民营企业有机会参与高校、科研院所基础研究,培育一批民营经济产业技术创新示范联盟,通过科技计划支持联盟牵头承担计划项目,突破关键共性技术。

二是加快民营经济创新载体建设。提升孵化科创载体企业服务能力、完善孵化载体质量管理,支持龙头骨干企业建设专业孵化平台,引导载体提高服务质量,围绕产业链延伸、配套需求,孵化

相关科技型企业。充分借力“新型研发机构”提升成果转化能力,依托“硅巷”融合创新资源,打造民营经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

三是加大民营企业资金支持。加大研发资金支持力度。对轻资产的科技型民营企业,由政府出面担保,增加企业授信额度,解决其研发经营的资金压力。鼓励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按照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比上年增长比例,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补助,对参与市重大科技攻关专项的民营企业,按照项目实际研发投入,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支持。设立民营企业专项研发扶持基金,由政府、民营机构、高校、科研院所按一定比例共同出资,选择第三方投资机构进行管理,选择优质项目进行投资。全面落实国家对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政策,实现民营企业对税收政策应享尽享。

四是营造民营经济创新生态系统。引导企业瞄准需求进行技术和产品创新,推动创新创业企业集聚发展。构建更加紧密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培育具有强创新力、强带动力的龙头企业,赋能产业链各类大中小企业,形成以龙头企业带动小企业的格局体系。进一步营造解放思想、敢于创新、勇于竞争和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培育新时期创新文化。

(三)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实现“实力赋能”

一是建立龙头骨干民营企业服务平台。按照“全国500强”“省100强”“市10强”“区5强”等不同层面进行对接服务,用足用好政策措施,形成南京民营企业梯度发展之势。同时,围绕4+4+1产业体系,对接服务民营经济各领域行业细分龙头骨干前5强企业,打造南京民营企业龙头骨干发展新优势,最终形成民营经济龙头骨干企业多层次、多领域、多梯度发展新格局。

二是加快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建立和实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计划,对入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项目库的企业进行重点项目情况跟踪,出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的“一企

一策”精准化配套政策,帮助入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项目库的企业享受各类扶持政策,尤其是对入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产品),各级政府给予奖励,在政府采购中,对其产品可给予适当技术加分,加快形成一批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高、专注于细分市场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三是培育一批高成长性的独角兽企业。加大对“单项冠军”“隐形冠军”“独角兽”“瞪羚”和“创新优秀”民营企业的培育力度,从融资、土地、技术研发、市场销售等环节给予政策倾斜。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独角兽企业实施精准施策,对种子企业重点支持其开展技术创新,对准独角兽企业重点支持其开拓外地市场,而对独角兽企业则重点支持其走上资本市场。

四是实施民营企业名牌培育战略。从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高度对南京民营企业品牌的整体发展策略进行探索,推进实施南京民营企业品牌计划,提高南京企业品牌和产品的知名度。定期举办“中小企业品牌论坛”,实施品牌策划培训、交流等项目,培育企业家创品牌意识,扶植中小企业创立品牌。定期进行产品展览等推广活动,邀请企业参加国内和海外的展览和推广活动,为南京民营企业的品牌推广搭建平台,提升民营品牌的市场影响力。

(四)完善民营经济要素供给,实现“资源赋能”

一是建立多层次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保障体系。建议对认定的境外高端和紧缺人才,他们在南京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已纳税额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15%部分给予财政补贴,吸引高端人才在南京集聚。按照“企业愿意高薪聘请的就是人才”的理念,对民营企业聘请的高薪职员按照人才引进方式建立奖励机制。建议以财政专项资金的形式对全市民营企业职工发放稳岗补贴,对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全市民营企业发放岗位补贴、社保补贴。加大实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力度,对我市积极发展订单式职业教育的高职院校及学生本人进行生活补贴发放。

二是采用组合拳破解融资难问题。建议设立小微企业贷款扶持基金,对符合南京 4+4+1 产业发展方向的优质小微企业贷款实行贴息补贴,并逐年增加贴息力度,以缓解企业融资贵问题。建议由市金融局牵头,与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和一些知名科技企业共同搭建我市创业创新金融服务平台,通过平台整合数据,汇集金融资源与惠企政策,为小微民营企业提供资金需求撮合和多元化融资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打通融资贷款壁垒,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建设全市统一的民营企业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平台,建立民营企业征信数据库,把对民营企业诚信审查数据共享给贷款银行,银行根据民营企业诚信情况,实施多种套餐简化民营企业办理贷款审批程序,缩短银行办理贷款流程、提升银行放贷速度。

三是多管齐下保障民营企业用地。进一步加大民营企业项目用地计划保障力度,支持将民营企业投资重大项目纳入市级重点推进的项目清单,所需年度用地计划在市预留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中按规定予以保障。实施工业用地弹性供应改革,推行弹性年期出让、租赁、先租后让等灵活多样的套餐式供地方式。鼓励民营企业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对集约节约用地的民营企业将给予政策支持。鼓励工业企业利用存量土地新建工业厂房或增加原厂房层数,对新增的工业厂房不再增收土地价款。在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民营工业企业在现有工业用地上新建或改造原有厂房、增加容积率,不增收土地出让价款。彻底清理各种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用地规定,进一步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土地市场环境,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资本有序进入土地市场。

(五)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实现“制度赋能”

一是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保障民间资本平等进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外所有行业和领域,不得对民间资本单独设置附加条件、歧视性条款和准入门槛。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新兴产业发展,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家或省市重大建设项目,着力打破“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的阻隔,支持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二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建立市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与企业家面对面协商、民营企业调研机制;制定出台“南京市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企业活动正面清单”,鼓励相关人员参与企业的正常活动;对重点企业实行“企业管家”、对中小企业实行“服务专员”制度,“一对一”跟踪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困难。

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组建市区级专项法律服务团,协助民营企业开展内部风险防控,切实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涉民营企业的犯罪案件,依法快速处理,对重大经济犯罪案件挂案督办。

四是提高政府服务效能。加强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完善企业意见诉求受理处置程序,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把“用户思维、客户体验”理念融入政府行政审批和服务全链条,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提高跨部门业务办理效率。全面公开涉企服务事项及办事流程,编制发布办事指南,全面推行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标准化,为非公有制企业办事提供明确指引,扩大政府服务领域。

责任编辑:王芳

当前营商环境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以徐州市鼓楼区为例

毕凤霞 杨 潇 秦继民

摘 要: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粗放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是比金子还宝贵的软实力。政府部门主动变身为“店小二”,把企业、群众办事的痛点、堵点、难点作为自己工作的着力点,积极放下身段、俯下身子,扩大“放管服”改革,优化提升服务水平。就目前徐州市的营商环境而言,政策法规配套不健全、市场机制发挥不充分、“放管服”改革落地不扎实等问题已明显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亟待突破解决。完善和改进营商环境,不仅需要充分认识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意义,也要做到“亲”、“清”一个都不能偏废、一个也不能少,需要在建设服务型政府、依法行政和法律制度落实等方面做出更多坚实努力。

关键词:法治化营商环境;民营企业;政商关系

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20)01-00071-06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积极开展合作交流、参与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依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被认为是投资的风向标,依据该报告,优良的营商环境,可以促进投资0.3%的年增长率,促使GDP0.36%的年增长率。《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表明,我国营商环境相比2008年提升了32位,位列全球第46名,第一次进入前50名。《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我国连续第二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经济体排名前十,位列190个经济体中的第31位。在我国经济发展走向高质量发展

的过程中,提升营商环境,显得尤为重要。

一、当前优化营商环境的时代背景

营商环境,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就是伴随企业活动全过程,包括在建设许可、获得电力和信贷、财产登记、执行合同、知识产权保护、跨境贸易、经营活动、纳税、关闭合约及执行等方面遵循的政策法规所需的时间和成本的总和。具体而言,包括影响企业活动的社会要素、经济要素、政治要素和法律要素等诸方面。优化营商环境,已经成为解放生产力、提高综合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软实力。

收稿日期:2019-12-16

作者简介:毕凤霞,徐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法制科长、民革鼓楼支部副主委;杨潇,江苏彭隆律师事务所律师、民进鼓楼支部会员;秦继民,徐州市鼓楼区统战部办公室主任。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2018年国务院首次常务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就是进一步部署优化营商环境。近期,全国各地又纷纷出台系列政策举措,聚焦改善营商环境,以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其中河北省人大专门为优化营商环境立法,表决通过了《河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山东省领导牵头挂帅,强力推进优化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等十大专项行动;湖北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敞开市场大门;江苏省在2018年出台了《聚焦企业关切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

为什么现阶段我国如此重视营商环境的优化营造?

首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客观要求。从40年改革开放大背景来看,优化营商环境就是政府的自我改革、自我革命,是执政能力、执政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无论是转变政府职能,还是‘放管服’改革,亦或建设服务型政府,都需要一个实打实的抓手,从目前的情况看,营商环境的优化改革便是这个有力的抓手。”

其次,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一方面,部分新的企业、新的业态、新的模式要成长起来,自然需要新的市场规则,也就是为市场准入提供更加便利的环境。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尤其是僵尸企业也要退出市场,要有合理的退出机制。产业转型升级,一进一出,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上与营商环境优化有非常高的契合度。

第三,是政府转变管理模式的现实需要。目前,我国形成了超过1亿的市场主体规模,如何营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从而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大局,决定了对高质量监管的行政管理模式需求,而最可行、最便捷的途径便是营商环境改革。以往,政府治理绩效如何,GDP说了算,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评价方式。而营商环境好不好,关键看市场便利度和公众获得感,这是来自政府之外自下而上的评估。因此,营商环境的好坏已成为建设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试金石”。

二、当前徐州市营商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表现

营商环境到底怎么样,民营企业最有发言权。目前全国市场主体中民营企业占已90%以上,徐州市民营企业比重也接近这一比例。它们既是营商环境的受益者,同时也是营商环境的塑造者。“春江水暖鸭先知”,民营经济无处不在的分布特点,使得它们对营商环境的感触最直接、最真切,也最全面。在一定意义上,民营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阻碍是对当前营商环境最客观的诉求和反映。

(一)公平竞争市场机制没有完全形成,民营企业期盼更好的获得感

一是政策不透明。利好性的政策没有预兆性,主管部门也没有主动公开,导致企业既无法知晓,也无从查起,等按照上级要求准备好材料,政策往往已经过期,享受不到利好性政策带来的好处。少部分跟政府人员关系密切,导致了寻租现象。如根据《徐州市名校优生引进计划实施办法》,徐州市对引进名优毕业生的企业进行补贴,但具体申报需要各引进企业主动完成。根据调研,引进有博士、硕士的部分民营企业,对该政策不够了解,人社部门也未能对企业进行政策宣导,很多企业未能按时、按程序申报,而政策相对公开后,但又变为大学生招引,且申报系统至今尚未完全设计上线,企业申报程序等也发生了变化。如在徐州公共建设工程领域,不少招投标项目设置投标期较短,且公示范围狭窄,加上程序繁琐、申请困难,一些有实力的中小企业因为时间、渠道等原因,造成知晓度不高,未能及时参与形成公平竞争。

二是政策不开放。调研表明,一些垄断行业开放度不足,“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依然存在,使企业不能享有平等的存在感和话语权,很难争取到应有的权益。如特种设备检验行业的开放度极低,民营企业进入该行业难度很大,夹缝中求生存现象普遍。在行政审批、工程建设、土地开发、公共项目招投标、财政资金补贴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也同样存在诸多难题,托人情、打招呼等现

象仍然存在,这种隐形变异的官商交往也助长了以权谋私现象发生。

三是政策不协调。各个职能部门下发的政策文件不统一,形成了多、碎、散现象,客观上造成了条线分割、各自发令,前后不衔接、部门不协同、相关不相融的状况。例如企业市场准入机制放开后,工商登记的灵活性使市场主体迅猛增加,但因环境建设、无标准的环保一刀切政策,导致市场主体不得不停滞,大量企业因此停业停产甚至关闭。如国家税制改革及出台的企业税制优惠政策,旨在促进企业积极性,大力发展生产力,然而具体到实际操作中,税务部门对企业发票每月限量发放,到月底更是“一票难求”,导致企业因为没有发票而丧失订单,严重影响发展经营。

(二)“放管服”改革要求落实不到位,民营企业期盼更优的服务感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来,民营企业成长环境趋于健康;一系列简政放权的措施,激活了市场,便捷了市场主体。在鼓楼区市场监管局注册登记大厅,“放管服”改革成效尤为显著,电子屏上滚动的企业名称和办事信息直观清晰,使前来办理注册登记的企业几乎不需要排队,基本都在5分钟内办完业务,相比之前更加简化高效,但仍有相当问题需要重视。

一是不想放。不少民营企业反映,基层仍然把中央的“放管服”改革当作权力使用,多头监管、重复监管没有根除,监管不公、滥管过度现象依然存在,让企业疲于应付;一些“放管服”改革单位存在“人进事不进、事进权不进”的现象,部门窗口仅有“收发室”、“中转站”功能,只能咨询不能办事。有的部门电子政务水平不高、员工操作能力偏弱,在线办理事项极为有限。落实到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上,又是照搬上级政策文件,针对性、自主性、灵活性措施较少。很多时候看到政策,无法享受;看到空间,不能进入;看到机会,难以把握,不能做到“非管即放”。

二是放不开。一些核心事项改革推进力度缓慢,政府部门间数据库不共享、不互通,职能部门

可能出于财政压力、规避风险、权责压力等考虑,客观上还设有门槛。有些审批权下放后,由于基层设备、人员、技术和场地空间欠缺,承接能力不足,致使下放的审批事项时间拖得更长。如新成立的徐州市综合性服务平台,集中了行政审批权,但授权不充分、运行不规范、放权不开明。

三是不敢放。上面放了权,怕下面乱作为、或被问责,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时不敢放、不敢服。如一些中小民营企业频繁专项检查,少数执法人员态度生硬、方法死板,极易激化矛盾,导致企业不理解、难配合,执法人员也易被问责。如某局以防范岗位风险为由层层设障,办理一项事宜,却要求企业提供劳动合同、劳动者职称、劳动资质证书等非法定职责范围内不相关的材料,企业敢怒不敢言。又如某企业仅生产检查,就接受7家单位近15次的检查;非公数据的调研,就接受了8家单位的先后摸底,令企业疲惫不堪、怨声载道,这和“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服务机制背道而驰。

(三)政策法规缺乏配套规定,民营企业期待更大的安全感

行政法律法规设立本意,倾向于保护公众利益最大化。但具体实施过程中情况千变万化,很多法条缺少可操作性,在执法过程中出现了执法尺度不一、量罚困难等现象。如对违反《食品安全法》的罚款额度,很多违法行为起点罚为五万元。一方面,根据“四个最严”要求,市场监管局往往对经营困难或经营额较小主体处五万元的从轻底线罚,在减轻处罚情节不具备的情况下不适用减轻处罚。另一方面,法院多从营商环境、社会纠纷解决角度出发,裁量尺度和考虑因素明显不一致,多个案件出现减轻处罚的改判。鉴于法条对减轻和从轻的具体情形规定并不明确,省级部门制定具体裁量标准在执行中表现不一,致使该类罚款面临尺度混乱、执行困难、法条威慑性不足的问题,导致法律不接地气和执行的尴尬性。

最高法、最高检对服务和保障民营企业发展,营造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的精神明确,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缺少灵活性。对于刚成立

的小公司、新公司,通过寻找法律空白和不规范来降低成本。对一些情节轻微的不规范行为,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进行处理,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往往更能体现“两高”文件精神。

(四)国际化趋势对规范运营需求与企业缺乏规范性的矛盾突出,民营企业期待更实的存在感

未来政商关系的趋势,只会更加公平开放、清澈透明;企业间的竞争与发展,日趋回归核心竞争力,“靠产品”“靠管理”和“靠创新”必将取代“靠规则”“靠政府”。营商环境国际化,要求建设竞争、高效、规范的市场秩序,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营商规则、行业标准,但目前现状并不能适应“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大战略。例如,市场主体行为规范化缺失,导致“被法人”“被高管”现象明显增多,长期无实际运营或吊销状态的僵尸企业仍然存在,严重影响市场信用度。

企业法务战略是企业生存发展的职能战略,现代社会,企业经营领域涉及问题越复杂、越高端,越需要健全的法治体系。由于大量中小企业没有专门法律顾问或法务部门,缺乏对应的风险防范和规范的运营管理机制。仅以2018年为例,徐州市与企业有关的纠纷案件律师代理率仅为44.74%,充分表明当前中小企业对于法务重要性的忽视。

三、徐州市营商环境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及分析

(一)体制因素: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未完全理顺

市场信息是市场参与者决策的主要依据。调研表明,越是行政干预多、改革滞后的领域,市场信息越容易被掩盖和滞后,政商关系就越容易被扭曲。一些部门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决策部署不到位,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理不顺、走不直、渗不透,职能权限界定不清晰有很大的关系。

市场相关政策信息传达不完全、不均衡、不对称,大多部门对上级政策、文件直接转发,不了解不理解,如很多应该减免的税收和审批项目,你不问他不问,你不细问他不细说,如果企业不主动提

出来,有的部门在本已知道应该减免的情况下,还会继续收费和审批,遇到企业咨询就踢皮球。非公企业市场准入以及获取各类生产要素等方面更渴望平等待遇,以充分享受生产要素配置,把握市场发展方向,这是市场的基本功能。政府应当明确与市场主体的关系,根据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方向,鼓励、指导、引导企业经营方向。作为一线服务于企业的政府职能部门,对中央及上级部门的战略方针及政策指导,应当研究透彻,及时传递,制定适应市场规律的“实战实用”的策略,确保政策落地,绝不让政策躺在“抽屉”里。

(二)传统习惯:部分领导干部不作为思维根深蒂固

调研发现,目前部分领导干部在和民营企业打交道时,存在三类相对突出的问题。一是不愿为,有的认为只要和民营企业打交道就有被围猎的风险,帮民营企业办事就会有嫌疑,不愿和企业多交往;有的认为廉政风险好把握,行政风险不好把握,一旦出问题就要受处分、被追责,宁愿少干事,不愿被问责。二是不作为,有些人迫于反腐高压态势,想着既然帮企业办事没有好处可拿了,不能腐了,也就不敢腐了、不想腐了,那还不如不干;有些人则认为干得越多风险越大、犯错几率越高,存在着被问责追究的可能,就想办法推卸责任、消极作为。三是不会为,有些人不是不想“亲”,而是不会“亲”,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软办法不敢用,不知道边界划定在哪里、服务提供在哪里、权力运用在哪里,陷入了思想僵化、知识老化、本领退化的窘境。

(三)思维方式:依法行政在政府部门尚未深入人心

“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当前,公平透明的市场秩序还没建立起来,重要原因是依法行政的理念没有树立起来、依法行政的要求没有落实到位,导致法治规则被潜规则所替代,法律的尊严和制度的权威在潜规则面前变得软弱无力。但在实际生活中,不少部门对政策落实不好、效果不彰,变“放管服”为抓权。有的部门仍然一口遮天、

吃拿卡要、拖阻梗塞。有些基层执法部门对大政方针认识不到位,执行有偏差。有时新政策出台后,各基层部门在实践中为求快而忽视影响,也偏离了初衷。在政策制定方面,前期调研不够,没有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对政策实际影响考虑不周,没有给企业留出必要的适应期。有些政策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导致一些初衷向好的政策产生了抵消作用。面对权力的制约,市场准入机制仍需进一步开放,既要对外开放,更要对内开放,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构建公平统一、权责明确、透明高效的市场监管制度。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监督,可以借鉴吸收企业管理中的考核机制,按照“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的要求,请企业家和广大服务对象进行打分考核,将其评价结果作为工作考核的衡量标准之一。

(四)市场环境:稳定诚信的市场环境尚未形成

市场环境也是企业经营面临的一道大坎。稳定的市场环境,是企业期盼的定心丸,但多变的政策、新官不理旧账等因素,仍是限制企业长期稳定规范经营的重要因素。如企业厂址的屡次搬迁、政策的朝令夕改等因素,扼杀了“百年老店”、“百年名企”的形成。

失信也是导致企业家对营商环境信心不足的重要因素。在许多民企与政府合作的项目中,一旦政府出现欠款,企业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要债不易,甚至有的企业因政府欠款导致资金回流困难而被拖垮。虽然各级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出,政府要带头讲诚信守契约,决不能“新官不理旧账”,然而仍有很多部门拖欠账款。在政府公信力遭遇挑战和影响的同时,部分企业家甚至陷入“走一步看一步”的迷茫,或者打铤而走险的擦边球,导致企业生不定根、居无定所、信心不足。

四、优化提升徐州市营商环境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厘清政商边界

营商环境的优化,关键和核心在于“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所谓“清”,本质是廉洁,就

是对政商往来中“权力寻租、吃拿卡要”和“为官不为”等问题,列出“负面清单”,划定红线。所谓“亲”,本质是服务,就是政府要尊重企业的主体地位,按照市场的原则去服务企业,打造出亲商、重商、扶商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心无旁骛谋发展;政府人员要坦荡真诚地与民营企业交往,做解难救急的服务员,通过系列“放管服改革”,真正为企业“松绑解枷”送温暖。“政”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让诚信服务理念深入人心,带头做到言必行、行必果,做出的承诺和政策及时兑现。政与商,既要加强合作,又要坚守原则;既不畏首畏尾,也不触碰红线、边界。

(二)健全营商法律和政策配套体系,夯实安商基础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通过法律制度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权益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条件和显著特点。健全营商环境法律制度、以法治方式推进保障营商环境的建设进程,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最佳选择。国务院审议通过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将近年来“放管服”改革的有效经验做法上升到法规层面,并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制度保障。从即将出台的优化营商环境专门行政法规开始,结合徐州实际,制定具有明确标准及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真正将全国的改革经验借鉴落实到徐州,从而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保障。

一是形成体系化、梯度化营商环境标准体系。优化营商环境,不宜只突出一个标准,宜包容各市区各行业的营商环境差别,既要考虑到国际化规则,也要考虑民营企业自身的感受,更要避免沦为新一轮自上而下的目标责任考核,层层加码最后致基层不堪重负。例如,环境治理中,为降低环境污染指数,未先分析各地区导致严重污染的原因,未确定各类企业环境检测标准,为完成行政业绩考核各地区全部一刀切,以罚单的多少作为考核标准,使税收和发展顾此失彼,企业更是苦不堪言。

二是以法治协同引导城市打造营商高地。在我国营商环境建设迈上法治化新台阶之际,恰好也

是世界银行增加中国新样本城市之时,徐州更应当借助区位优势把握机会,积极向全国龙头城市学习,以法引导发展方向,制定政策举措。

三是建立科学合理的立法规划和立法评价机制。针对目前一些领域立法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创新实践需要,要达到优化营商环境的目的,亟需立法前做充分调研,立法时法条列举考虑充分,配套规章和政策辅以完善,立法后做好立法效果评价和评估,切实实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通过营商环境法律体系的建设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积累可行的立法经验。例如设立政策法规建议网上平台,收集企业或群众在实践中对立法缺失或落后的情况反馈,充分征集意见,使立法行之有效。

(三)努力打造高效服务型政府,营造重商氛围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必备前提是提升政府服务意识,加大服务举措。应牢固树立“企业就是发展、政府就是服务”的理念,探索为企业服务制度化、常态化工作机制,主动帮商、安商、富商。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一站式受理”、“最多跑一趟”进程,学习并引入一流城市的政府服务技能,充分利用“互联网+”概念,将网络与政府服务充分融合,占领网络服务高地,实现从“一站式服务”到“一网通办理”的智慧政府转变。提高企业享受政策的便利性和快捷性,提高市场主体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打造领先的营商环境。

我国正在加快建立以信用承诺、信息公示为特点的新型监管机制,构建公共联合征信系统。在此环境下,应注重企业信用建设及引导,建立统一的企业、个人信用信息公共数据,积极推进政务诚信、电子商务诚信、个人诚信等重点领域诚信建设,将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与个人征信系统进行数据对接,实现对守信和失信行为的联奖联惩。对失信企业信息通过平台及时推送,并通过便捷的信用查询渠道,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交易风险,靠“软环境”抵消“硬成本”,使本地区企业获得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四)多措并举降低企业成本,疏通富商通道

深入探索企业税费的可降低空间。充分考虑经济周期和环保要求,分类、分步实施降税措施,妥善解决“营改增”所致实际税负增加问题,清理取消不合理行政性收费,推出制度性、见实效的降费举措。

大幅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开展金融服务民营企业 and 关注中小微企业行动,银保监会和商业银行同向推动民企贷款政策落实,着力解决对民营企业抽贷、压贷、断贷和高息过桥等突出问题,针对性扩大信贷投放。

完善保障企业人才需求的激励措施。将民营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纳入政府人才规划,通过组建管理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培养交流平台,积极为民营企业中的科技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引导企业建立有利于激发潜能、自主创新的评价和奖励机制,有效缓解结构性用工矛盾,降低用工成本。例如针对企业高新技术人才的优惠政策,关键在于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强监督,避免滋生腐败。

(五)加大民营企业政策倾斜保护力度,培育亲商土壤

全面清理各种规范性文件不符合产权平等保护、企业平等保护的各项规定,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实施“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源头追溯、实时监测、在线识别等,提高执法保护效率,对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做出正确引导。

建立政府与民企的常态化沟通制度机制,及时了解和掌握民营企业诉求,提高服务的精准性和及时性;及时查处并公布一批行政垄断案件,坚决纠正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加强对企业家的正面宣传,对优秀企业家给予适当的社会荣誉激励,使他们有一定的成就获得感,提高企业家社会地位和责任担当;建立企业维权机制,组建民营企业投诉中心,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保障其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通过民营企业政策落实和政策倾斜,必将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创新创业热潮,实现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蒋建忠

融媒体时代大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机制研究

刘小杰

摘要:融媒体时代,如何充分发挥大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已经成为摆在高校党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工作,也是新形势下利用新媒体的传播加强高校大学生党员先进性教育紧迫而重要的课题。本文探索在融媒体时代如何发挥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方法和途径,提出了大学生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机制建设。

关键词:融媒体时代;大学生党员;模范作用;机制研究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1-00077-0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融媒体建设,曾在多个场合发表过重要讲话和重要论述,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专门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召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会,他强调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高瞻远瞩,立意深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融媒体时代高校做好大学生党员教育、充分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重要指南。当代大学生党员是青年大学生中的先进代表,是最具有理想和担当的一代,他们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不仅直接影响着广大青年大学生的未来发展,也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迫切需要。所以,继续开展对大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客观的现实意义。尤其在融媒体时代,各类媒体快速发展对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的大背景下,开展对当代大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的重要性,还具有时效的迫切性;其本身还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学生自身的成长成才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融媒体是传统

收稿日期:2019-12-20

作者简介:刘小杰,宿迁学院招生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

基金项目:本文系宿迁市2019年社科类研究课题“融媒体时代大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机制研究”(19SYC-01),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研究课题“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帮扶路径研究”(JCKT-B-2019602),2019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大数据视角下高校智慧学工建设路径探索”(19SZC-003)研究成果之一。

媒体和新媒体的有机融合和优势互补,融媒体时代,如何充分发挥大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关系到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和战略前途,已经成为摆在高校党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工作。

一、融媒体时代大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融媒体已成为现代媒体的新名词,它区别于传统媒体和其它独立媒体,而是涵盖现代所有媒体的统称。具体地讲,就是充分利用媒介载体,把广播、电视、报纸等既有共同点又存在互补性的不同媒体,在人力、内容、宣传等方面进行全面整合,实现“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的新型媒体。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就媒体发展又一次提出: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就融媒体的发展再次提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讲话深刻阐明当前媒体传播的多样化给社会管理、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带来了复杂性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强调:“我们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讲话为我们如何利用融媒体做好高校党建工作和大学生党员先进性的引导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但就目前高校学生党员管理而言,由于高校媒体融合度不够,引导大学生党员保持先进性的手段单一,加上融媒体时代媒体传播方式多样化,使大学生党员思想呈多元化特征,先锋模范作用受到冲击。一是融媒体时代给高校党组织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高校媒体普遍存在媒体设

备投入不足,技术力量不够,传播手段单一的问题,校园媒体还限于校园广播、校内电视、板报宣传栏、校园网络等常规性传播平台;大学生党员入党后利用媒体对学生党员教育管理、培训引导力度不够,部分大学生党员对党组织的归属感、认同感不够强,组织观念、集体观念淡薄;学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还不够突出,缺乏党员发挥作用的平台与载体;党员培养质量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生党建工作队伍的现状与实际工作需要还有一定的差距。二是融媒体时代对大学党员先进性的发挥产生较大冲击。由于现代媒体的高度融合,每一个大学生都拥有手机和电脑,既是媒体的传播者,又是媒体的被传播者,受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较大;有的大学生党员入党动机不够端正,仅满足于组织上入党,不求思想上入党,入党带有一定的个人目的和功利色彩;在工作方法问题上,有的学生党员缺乏团队协作的精神。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如果不迅速加以重视,将对高校党组织的建设和大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掌握主流媒体,弘扬主旋律,做好融媒体时代高校学生党员先进性的教育工作是每一位高校党建领导者、工作者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二、融媒体时代大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关键体现

大学生党员是青年学生中的优秀代表,是创建和谐校园活动中的主力军。毋庸置疑,在构建和谐校园进程中,如何发挥这些大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怎样发挥他们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及能否建立起和谐校园的长效机制,是直接影响到创建和谐校园成败的关键所在。现代大学生多数都是“90后”,他们个性特征更加鲜明,视野更加开阔,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逐步增强,成长和发展的这种愿望也更加强烈。大学生党员作为未来社会责任的肩负者,将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中流砥柱。因此我们要结合时代特征,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他们在政治上、学习上、工作上和日常生活上发挥先进模范作用,成为

普通大学生学习的榜样。

(一)做政治上的标兵。高校学生党员作为共产党员的一份子,理应成为高校学生中的政治标兵,起到带头表率的作用。高校学生党员有着学习党的执政思想、政治理论、治党纲领等方面的先天优势,相较普通同学而言,对于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有着更为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高校学生党员要起到带动高校学生向党看齐、向党靠拢的带头示范作用,为塑造高校良好的政治学习环境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做学习上的表率。高校学生党员还应成为普通学生的学习表率。高校学生党员应深刻认识到专业学习对于将来回报社会、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并通过自身的努力、坚持、开拓、严谨成为普通高校学生的学习表率。高校学生党员应扎实学好专业知识、努力掌握专业技能、积极开拓创新思维、勤奋探索前沿领域,除此之外,在实现自身专业能力飞跃的同时还应将自己的学习方法、学习心得无私分享给身边的同学,营造出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进而实现整个校园的良好学术氛围营造。

(三)做工作上的典范。大学生党员基本上都是学生干部,要在创建和谐校园过程中发挥学生干部的示范作用,做教师和同学的桥梁纽带,积极配合学校教师的各项工作,当好班主任和辅导员的得力助手。同时要搞好与普通学生的关系,对工作要有责任感,认真做好教师交给的每一项工作。另一方面,大学生党员在学生群体一般具有较高的威信和感召力。要充分利用各种平台加强对广大学生的宣传工作,通过学生社团激发其他学生参与和谐校园建设的热情。

(四)做生活中的榜样。大学生党员在生活中发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用,在创建和谐校园过程中,大学生党员要做好为广大学生服务,在日常生活中要以身作则,平时要严于律己,给同学起表率作用。要竭尽全力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同学,为他们排忧解难,当好同学们心目中的服务生。要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搞好校园卫生,特别

是学生寝室卫生工作,让大家有个优美的学习生活环境。

三、融媒体时代大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机制探讨与建议

大学生党员作为高素质知识人群的代表,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在融媒体时代的背景下,如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大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已成为当前高校学生党建工作面临的重点和难点课题。为此,本人根据分析大学生党员目前的思想现状和行为表现,结合存在的问题就融媒体时代大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有效机制问题作如下探讨和建议。

(一)加强校园媒体管理,建立完善校园媒体监督机制。现代媒体,传播形式全覆盖、多样化。为了防止媒体给大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党员带来不良影响,建议对校园媒体加强管理,建立长效的监督机制。要加强对大学生党员的监督,建立全方位的监督约束体系,保持大学生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在大学生党员入党前要首先充分征求群众意见,把群众的意见作为监督大学生党员的重要依据,使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提高。要把校园的监督机制建立到普通大学生群众当中,成立培养一批媒体监督员队伍,营造人人都是媒体人,人人也是监督人的氛围。

(二)加强对高校媒体设备的更新投入,提升教职人员对媒体的使用技能。校园媒体是引领大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重要传播工具,要重视加大对校园媒体设备的更新与投入,使校园媒体与现代媒体同步对接,用现代媒体手段配合校园其它媒体及时宣传学生党员中的典型。可通过培训建立起一支以学生党员为主体的网络技术人员和宣传员队伍,通过短期培训,有效提高管理团队驾驭新媒体平台的政治素养、技术水平和综合素质。要加强思政管理者和教师运用现代媒体的技术培训,提高他们掌握和使用现代媒体工具的能力。要利用现代媒体创建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的大学生党员思想引领平台,引导党员规范地使用

媒体,提高党员运用新媒体的能力;要将日常党员思想引领内容放置于新媒体中共享,同时利用网络深入探讨,扩展思想引领内容,提高思想引领效力。

(三)创新媒体互动平台,构建媒体思想引领新优势。创新媒体互动平台,有利于教师与大学生零距离互动交流,师生之间可以即问即答,有利于学生党员对思政教育内容的理解。要以构建高校党建微信、微博自媒体平台为重点,培育一支学生党员信息员队伍,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大学生党员的媒介素养,引导他们学会信息、微博发布与信息接收,注重培养他们的信息判断能力,引领大学生在融媒体环境下能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传播舆情控制、危机预警机制中发挥相应的作用。除此之外,建议思政教师把多媒体融入到教材内容中,针对每位大学生党员的不同个性特征和经历,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沟通,让教学活动跟现实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四)借助融媒体建立学生党员网上培训机制。学生党员作用发挥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与入党后教育与学习的松紧程度密切相关。因此,要利用现代媒体对学生党员进行入党后的教育培训工作,这是切实增强学生党员先锋模范意识、保持其先进性的基础工程。首先是抓媒体网络教育培训制度,办好新党员培训班,开设学生党员网络专题党课,建立党员网络之家,使大学生党员随时能够接受教育。其次是抓媒体网络教育培训内容,要注重从以传统理论为主转向时代精神为主,大力增强时代内涵和实际应用性,引导学生党员认真学习党章,加强党性修养,强化使命感和责任感教育。再次是抓媒体网络教育培训方式,要建立多层次的教育体系,用活媒体网络,建立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关的调研网络和信息网络,凭借校园网络互动平台,实现专兼职党务工作者与学生党员之间的平等交流,答疑解惑,积极引导,保持教育活动的鲜活性。

(五)建立网络考评机制,完善考评体系。大学

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能否得到真正发挥,关键在于考评制度的落实。建立网络考评机制,目的是约束大学生党员永葆党员的先进性。因此,设立网络考评一定要向群众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在考评内容上,要注重结合具体情况、学生党员的自身特点和党员作用平台的岗位职责制定量化指标,明确学生党员在思想作风、组织生活、理论学习、业务学习、班级管理、宿舍建设、联系人工作、岗位职责履行、各种活动参与、遵章守纪等方面表现情况的具体标准。在考评方式上,要注重将党员评议与学生评议相结合、党员自评与组织评定相结合。

参考文献:

- [1] 张志刚. 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6(14).
- [2] 黄金艳. 媒体融合态势下当代大学生思想行为研究[D]. 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兰州: 兰州大学, 2017.
- [3] 金福尧. 大学生党员作用发挥的对策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4(16).
- [4] 习近平.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N]. 人民日报, 2019-01-26(01).
- [5] 陈锡敏. 思想政治理论与大学生国家认同[J]. 教学与研究, 2017(03).
- [6] 杨晓阳. 新媒体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M]. 延边: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7.
- [7] 罗敏. 论大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来自乐山师范学院的调查报告[J]. 大学教育, 2014(91-95).
- [8] 叶晓莉. 新时期发挥大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路径和对策研究[J]. 科学文汇[中旬刊], 2014(11).
- [9] 钱金华. 浅谈如何发挥大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J]. 职业时空, 2011(10).
- [10] 房广顺, 李鸿凯. 推进以立德树人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J]. 思想教育研究, 2017(2).
- [11] 黄武南, 蒋韬. 高校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现状及改善对策[J]. 思想教育研究, 2013(6).
- [12] 罗鑫. 什么是“全媒体”[J]. 中国记者, 2010(3).

责任编辑:王芳